

范文瀾著

中國近代史

(編上)

第一分冊

(下冊)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印

62
53
:1

范文瀾著

中國近代史

(上編·第一分冊·下冊)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翻印



3 0471 5262 8

中國近代史

版權所有

著者 范文瀾

出版者 新華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上編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 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至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第一分册 目錄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形成及中國人民舊式的反抗運動

——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

第五章 洋務派的「自強」與第一次割地狂潮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

第一節 緒言	一七五
第二節 所謂「自強」的新政	一七八
(A) 新政第一期	一七八
(B) 新政第二期	一八一
第三節 「新政」第一次破產	一八五
(A) 李鴻章的外交政策——一八五〇年	一八五
(B) 喪失琉球	一八六
(C) 馬關條約	一八七

(D) 伊犁交涉 一八九

(E) 中法戰爭 一九〇

(F) 喪失緬甸 一九八

(G) 北洋海軍的擴充 一九八

第六章 甲午戰爭及第二次割地狂潮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

第一節 中日朝鮮交涉 二〇〇

第二節 戰無不攻的海陸軍 二〇五

第三節 和戰兩派的爭極及主和派得勝 二一六

第四節 馬關條約的締結 二二二

第五節 台灣的兩種抵抗——官紳的虛糜抵抗與台灣人民的英勇抵抗 二二四

第六節 三國干涉下滿清廢還遼東半島及大借外債 二三一

第七節 大買辦李鴻章游說歐美的賣國活動 二三五

第八節 割地狂潮 二三六

第七章 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

第一節 緒言 二三九

第二節 甲午戰前改良思想的醞釀 二四〇

第三節 甲午戰後發達運動高漲 二四二

第四節 參加維新運動的派別 二四八

第五節 百日維新 二五七

第六節 康梁維新派墮落成反動集團 二六三

第七節 自立軍起義 二六五

第八章 對抗瓜分運動的義和團運動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七年）——

第一節 緒言 二六九

第二節 從義和拳到義和團 二七八

第三節 義和團的志願與紀律 二九一

第四節 西太后政府對義和團的聽取 二九五

第五節 外國的壓迫與義和團的反抗 三〇一

第六節 人民的繼續反抗 三一二

第七節 英帝國主義指使下的分裂運動 三一三

第八節 帝國主義間的爭鬥 三一四

第九節 辛五條的續索三行交涉 三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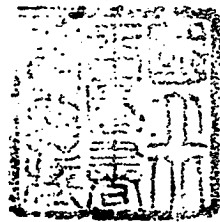
第十節 帝國主義者認識了中國人民 三一六

附錄：黃打銅子手黃德勝的一生 三一七

二種思想的又一馬

第五章 洋務派的「自強」與第一次割地狂潮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



第一節 緒言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完全確定了。在這個新形势下，統治階級分成頑固、洋務兩大派。

頑固派是純封建性的政治集團，有滿洲貴族、官僚、紳士、地主、八股士人及落後民衆作基礎，尊頌西太后，掌握政權，在政治上擁有極大勢力。這一派人盲目排外，幻想閉關時代的回來。同治五年，奕詝開設天文算學館，請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倭仁上疏反對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拒絕一切新文化的輸入，是這一派人思想的一面。郭於霖描寫另一方面說「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烟，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民生，無一人引爲疚心。鋪張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偏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建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歡迎外國消費品來滿足自己的享樂，是這一派人思想的又一面。

并國體者破壞中國政治的經濟絕對建國，造成頑固派的對外心理，同時又加強了侵略者的破壞。威，怨仇愈深，這種矛盾在頑固派與侵略者中間是不會消除的。但在政治上（如共同黨革命）、經濟上（如開發及借款）、生活（如消費外國貨物）他們俱有緊密的聯繫，最要造成頑固派的對外心理；作為與洋務派合作的基礎，並逼洋務派，而派派趨於侵略者。

洋務派是天津條約的產物，是外國侵略者改造封建軍閥，使它適合於鎮壓太平革命之用。的軍閥。因此，洋務派的基本成分，軍閥、買辦、官僚一不可。當時被侵略者選中的曾左李三大軍閥，各據有龐大的封建集團。左宗棠與李鴻章：「李鴻章一門，則錢既高，依附者衆。當時隨從立功，身兼富貴者又各有其親友，遂展轉依附，聲勢有徒」。李鴻章說曾左集團：「左宗棠、曾國荃兩族十載（兩江總督），湘楚舊部視如家鄉（南京），而隨宗棠者猶多且久」。這封建集團加入買辦成份愈多，自然與外國侵略者關係愈深，政治上地位也愈高。李鴻章與曾國荃成爲洋務派最負責任，即因就在李氏集團加入極大的買辦成份。

頑固派、洋務派、外國侵略者在壓迫中國人民的時候是妥協合作的。在互相關係上，頑固派據有中央政府，洋務派據有許多省區的地方政府及本系軍隊指揮權，李鴻章從同治九年，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二十餘年，包辦外交，天津成事處土政府之權力最大。這使兩派不得不互相依賴，保持滿清政府的統一形式，但形式的統一並不能阻止實際的分裂。湘系軍閥（曾左兩系）佔南粵及福建建甌閩地盤，淮系軍閥佔北洋及上海招商局地盤，彼此暗地敵意。滿清政府利用兩派不和，想對李鴻章與曾最甚。西太后善於玩弄手段，放在頑固派與洋務派之間，把兩派都當作「清議」與「公論」來牽制李鴻章，不讓李氏集團過大的發展，李鴻章與郭嵩燾說：「都中黨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需外重爲慮，欲收將帥罷吏之權」，又與友人書說：「清議之禍，與明季同出一轍，果孰爲之耶？」他在覆魏源原書

襄，直截表示對西太后不諱，說：「深宮地祺，樞廷猶舊質廢，遇事多下部議，揚天下政體仍舊舊矣，非外臣所能功爭也。但竊因循敷衍十餘年，以待嗣皇（光緒帝）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額爾派與李鴻章關係惡劣，幾乎到兩不相容的地步，陰毒的西太后不敢貶斥李鴻章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不僅擁有強大軍隊，更主要的是以外國侵略者選擇他充當最順從的代理人。

李鴻章守定會國書的衣鉢，比其他軍閥更能取得侵略者的信任。曾國藩主張對外不抵抗，忠實服從屈辱條約，說：「道光庚子（二十年）以後辦理夷務，多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強如故，惟願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千年無事」（同治九年覆陳津案各情摺）。這樣絕對服從的外交方針正與頑固派盲目排外同樣禍國以至於亡國，李鴻章是這個方針堅決執行人。在侵略者不允「中外相安」的時候，例如英俄掠奪新疆，曾國藩主張督案關外（玉門關）專清關內（屏殺陝甘回民），李鴻章稱為「老成謀國之見」，要求清政府放棄新疆。左宗棠出兵西征，李鴻章竭力阻止，說：「左倡率一廛營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即要西路調度，不過爾爾，把握何在」。後來西征成功，湘淮兩系仇怨加深，南洋大臣劉坤一斥責李鴻章說：「合肥自趁平後，所部分屯南北，每年餉幾千萬，而機器輪船炮不在此數，似此養精蓄銳，倘遇敵而不能一決，家為買平章亦不可得矣」（同治七年復李若農書）。湘系軍閥不會承襲曾國藩說全部遺教，對侵略者還不能絕對服從，因之湘系軍閥政治上地位落後於淮系。

李鴻章發揮曾國藩的洋務精神，外交上極端退讓，軍事上購買船炮洋槍，培養充足的對內武力。他辦洋務非常自負，說：「今日客談洋務，乃望之時。人人怕談屢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動不誤國。公等可不驚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復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強，此豈一人一事之咎。就此已往，能自強者儘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他把辦洋務說成中國自強自立的途徑，凡關

於洋務的設施，都稱爲「新政」，這詞法保存全無舊改，洋務減產增加新政，人民負担有增無減，中國愈貧愈弱，以之求自強自立必然得相反的結果。李鴻章抱着「理之時」的自奮力，非辦新政，支配軍事外交內政三十年，經中法戰爭破產了大部份，經中日戰爭全部破產了。

第二節 所謂「自強」的新政

A、新政第一期（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八二年）（光緒七年）

本朝新政以自強爲中心，所謂「強」，乃是總操，甲洋軍器。同治元年，滿清政府令都司以下武弁，學習外國兵法。李鴻章派一部份兵丁隨英法五國學習炸炮，一部份隨德國兵頭學習洋槍。這方面會國語比較保守，奏稱「如果步伐槍炮一一習熟，臣當面商李鴻章派員隨教習軍」，實際是拒絕洋操。後來海軍演習爲清末北洋新軍，洋操是個重要的原因。用洋軍器是海軍一致的要求，但船砲槍主要從英國購入，自己設局製造只是補助性質，既辦不久就露官條條弊病累穴，結果很顯然，洋務派求自強是求本集團自強而不是求中國自強。

同治元年會國語在安慶設軍械所，「全用漢人，不用洋匠，造成一小輪船，行於江上，不甚得力」。

同年李鴻章在上海設製炮局，「募外國匠人，自香港購辦一切器具，鑄造花炮，以資攻剿，盡爲得力」。

三年。李鴻章在蘇州設西洋炮局，「機器價值萬餘金，不全之器甚多」。

四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得「洋人機器廠一座，能鑄造大小輪船及開花砲洋槍各件，實爲洋運器外邊最奇之最大者。價銀四萬兩」。收買後改稱江南製造總局，先造槍砲。

兩年 會同蘇州英商船塢（價值八萬八千兩）遷到上海，併入製造總局。六年，開始建造輪船。

局內設汽爐廠、機噐廠、熟鐵廠、洋槍廠、木工廠、鑄鐵廠、火箭廠（砲彈）。造船設備，僅在船塢一座，兵商船隻仍領入即裝船塢（同治元年英人開辦）修理。附設翻譯館，聘英美人講出汽機噐

製、汽機開答、選規約指、泰西探煤圖說等書。選聰穎子弟入館學習，造就機噐工程師。

五年 左宗棠在福州設船政局，開辦費三十餘萬兩，每月經費約五六萬。機噐及材料從法國買來

，正副監督工程師都是法國人。局中工匠二三千人，雜工八九百人，多是湘軍弁兵，工廠等於兵營。

又設前後兩學堂，前學堂學法文及造船學，後學堂學英文及駕駛術。共造大小輪船十五隻，艦成南洋水

師。

六年 張厚在天津設機局。

同年 李鴻章在南京設金陵機噐局。

九年 李鴻章在天津設機噐局，分設四廠。

光緒三年 丁寶楨在成都設四川機噐局。

四年 左宗棠在蘭州設機噐總局，聘德國人為技師，製造軍用品及普通衣料。

七年 吳大澂在吉林設機噐局。

上述各局全屬軍事性質，每年經費巨大款項，雖然口頭上也說「強侮」、「自強」，實際是重在防內，並無對外的意圖。任事官僅營私舞弊，各向貪婪，等於添設許多衙門。福州，上海兩船廠較有成效，也止能購買外國材料仿造舊式船隻。這種局面陸續出現，不是說明中國有了「自強」的基礎，而是說明洋務派勢力在不斷擴大。

李鴻章辦新政最多，從籌款困難，感到富是強的根本，在對丁寶楨信裏說「中國積弱由於患貧，

國洋方千里數百里之國，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無非取諸於絲織五金之國，鐵路諸信局工役等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資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受其故者。他處需求強而求富，試看其求富何結果。

同治十一年 李鴻章在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

光緒四年 李鴻章在天津設開平礦務局。資本二十七萬兩，光緒八年增資本一百二十萬兩。

六年 李鴻章設電報局，奏請修築鐵路。

七年 開平礦務局遷鐵路二十里，又延長六十里。

英人享條約特權，設太古，怡和等輪船公司，往來各商埠，中國長江外海的運輸事業，全被洋人輪船，夾板占盡。股實華商，一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華人股份居其大半。李鴻章接受容闈的建議，設立招商局，招回華商股本，政府特許運糧米，免船稅等權利。從三隻輪船開始，到光緒三年，已有輪船十二隻，又收買旗昌洋行，得船十八隻。太古等公司大跌裝貨噸銀，排擠招商局。李鴻章令各省撥借官本二百萬兩，維持營業。光緒七年，準備開拓海外航線，運華貨到外國直接貿易，派美富輪試航新加坡、小呂宋、檀香山一帶。又派和衆輪試航美國，被美海關無故扣留，大遭虧折，從此華船不敢出航遠海。外需被略者歸意中國辦運糧、軍火等處，因為那些官僚攔阻，決不妨礙外國利益。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招商局，一開始就遭受外國的排擠，因為一個招商局成功，將會產生更多的招商局。馬關條約以前，外人還不能在中國設立合法的工廠，中國資本家有利用工價低廉的勞力，如果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固然對外國不利。再看中外貿易。

輪 入

輪 出

同治三年 五、二九三(千兩)

五、〇〇六(千兩)

同治九年

六九、二九〇

六一、六八二

光緒二年

七九、二九三

七八、八八三

輸入額中除去每年平均七萬箱（每箱約值銀五百兩）的鴉片價，外國正當商品銷路有礙，中國新工業僅有發展的餘地。招商局招股，商人踴躍投資，光緒七年，粵商擬組織輪船公司，直接運貨到英國貿易（被李鴻章阻止）。但是資本主義終於不會應時興起的，固由於外國侵略者的壓迫，同時也由於封建勢力的摧殘。例如李鴻章就是招商局的扶助者兼操縱者，他規定「官督商辦」的制度，說「由官總其大綱，舉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業商」。事實全完由官紳包辦，不許各商自行經理。「關道薦人」，「每遇誠實遭擯時，各省轉薦員紳」，「官商關係，官紳掛名應差支領薪水」，「委任各員，任意開銷，浪費侵蝕，私囊日充，公款日虧」，等等弊端，被人告發，李鴻章一概護護，不肯整頓。有力官紳「視為利藪，羣思鑽營，徒成一供差場所，門前冠蓋如市，而有股份之商人，望之逡巡不敢前」。商人無權過問，還負「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的義務，當然不敢添股擴充。電報局同樣官督商辦，規定官報免稅，收發電報，先官後商，結果官報日多，商報日少，電報局賠累不堪。官督商辦是封建勢力束縛資本主義的發展，招商局、電報局股東起初都對官府提出抗議和要求，後來却失望消極，讓官府任意侵蝕。

B 新政第二期（一八八二年——光緒六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

本期新政重心轉到求富，工業範圍擴大。因洋布，洋紗輸入額逐年漸加，光緒八年，李鴻章曾請設立紡織局，謀著染漏卮。此後紡織工業逐漸增加，成中國產業界重要部門。各工業分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商辦四種，官辦佔絕對多數。

光緒八年李鴻章在上海奏設機器織布局，十六年成立，資本銀一萬兩。出品止完海關正稅一項，

總免深說。十九年道火災燒毀。官辦。

九年 商人說大棉在上海創辦源昌機器五金廠，資本五十萬元。造各種機器。商辦。

十二年 張之洞在廣州設廣東蠶絲局。官辦。

十三年 張之洞在廣州設機器制錢局及銀元局。官辦。

同年前 李鴻章在天津設寶津局，用機器造幣。官辦。

十四年 貴州青縣設貴州錢鐵廠。官商合辦。

同年前 李鴻章聘英國技師造津浦鐵路，長一百七十五里，招集商股並借俄洋債及官款。官督商辦。

辦。

十五年 張之洞在廣州設廣東織布局。官辦。

同年前 張之洞在廣州設廣東製鐵廠。官辦。

十六年 李鴻章在上海設紡織新局。官商合辦。

十七年 張之洞在漢陽設漢陽鐵政局及槍炮廠。開採大冶鐵礦及萍鄉煤礦。官辦。

同年前 上海道唐松岩在上海設機器紡紗局。官商合辦。

十九年 張之洞在武昌設織布、紡紗、製糖、絲綢四局。官辦。

二十年 大寶齋盛宣懷在上海設華盛紗廠。商辦。

同年前 湖北設榮昌、盛昌火柴公司。官商合辦。

光緒十三年起，設籌備局。經次增刻，於海關邊境。

十四年 三九八、四〇七海關兩

十六年 四一〇、三四八

十七年 九〇〇、五〇〇
 十九年 九三〇、六五一
 二十年 一、一一九、七七七
 工業顯然是有進步中。這種微小的進步，是受外國經濟侵略的刺激而產生的。光緒十二年以前，進口貨和差額，平均入超總不出一千萬兩，除去大量鴉片，土貨出口仍佔優勢。十三年以後，差額大增，進口貨轉佔優勢。試看下表（單位千海關兩）

年份	出口	進口
十三年	八五、八六〇	一〇二、二六三
十六年	八七、一四四	一二七、〇九三
十七年	一〇〇、九四七	一三四、〇〇三
十八年	一〇一、五八三	一三五、一〇一
十九年	一一六、六三二	一五一、三六二
二十年	一二八、一〇四	一六二、一〇二

以十八年為例，是年主要進口貨如下（單位萬海關兩）：

鴉片	二、七四一	洋布洋紗	五、二七〇
毛織品	四七九	鋼鐵等金屬	七二三
米	五八二	煤、煤油	七〇〇
自來火	一四二		

一向為進口第一位的鴉片，被棉毛織物代替，幾佔進口總額的半數，鴉片約佔四分之一，米、煤、油

布大量輸入，顯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的社會經濟受市場的破壞，對於城市手工業的破壞，對於中國統治者（洋務派及某些開明派）不得不採用近代生產方法，但他們的動機性又決定他們新事業的失敗。

官辦工業有虧無盈，是一種消耗機關。官督商辦，官掌大權，商認虧損。純粹商辦，政治上無依靠，難得存立。因此，官最喜官督商辦，商希望「官爲保護，商自經營」。妥協辦法是官商合辦。上海方面商人勢力較大，所謂商辦，多是接近李鴻章的官僚，官紳。官辦，依政治力量，取得官商合辦或商辦的權利。有意投資的普通商人，仍多被官排斥。例如湖北紡紗局，原議官商股本各半，張之洞派一個候補道當督辦，一門候補知府當總辦，變成官僚機關。商認請減少官權，張之洞認爲商有「成見」，取消商股，改爲官辦。開辦以後，「局面大，耗費多」，營業虧損。張之洞奏稱「湖北織布廠一開，而江漢漢口之洋布已廢少千餘萬匹」？官辦工業成績就是這樣的紙上誇張。陝西集股創辦機器織布說時代表當時普通投資人怕官心裏，它非第一條要說「擬官紳商合力，商管銀錢販運買賣，紳管學藝機器製造，官主保護而不侵利權。即有事涉衙門，有紳承當，不累商民，無可變價」。不侵利權的官與不向衙門的紳事實上多少存在，因之商辦工業也絕難成立。

官辦必取督辦獨裁制，得任意弄權，官辦必取股東民主制，不容許貪污。洋務派樂於官辦，反對商辦的真實原因在此。官辦工業前後三十三年，有些什麼成就呢？「凡百施爲，類皆虛僞。工料之盈給，十每不得五，價值之浮盈，一或不及三」。（光緒七年劉鴻藻奏）比着著名的福建船政局爲例「所造輪船，舉不堪用。美使暨日本人屢及，有責洋務行日意格（法人）之無良，有爲日意格原諱其變者，蓋方今所願製造若此其不見特也」（劉鴻藻奏）。這是官辦工業的通病，各省設立廠局並無例

「每年動用正款以數百萬計，而所成之物，若經由外洋購買，或由洋匠承包，實可減半。官廠每製成一器，價比外洋尤昂，而復草率不精，形模徒異，往往取笑洋人，旋生抑侮。如此雖百年，終無生色」（光緒三十一年鍾天紳「擴充商務十條」）。官辦工業的腐敗與政治腐敗是一致的，它是人民的一種負擔，也是商辦工業的一個障礙。鍾天紳主張「令民間多開私廠，或即以官廠租給商人，每年收取租息。聽其爲民製造機器輪船，及一切開闢挖河抽兌磨紗織布各機器」。這種主張，符合當時新興工業的要求，但決不能獲得官僚資本的允許。

商辦工業受壓制，自然產生微弱的民主思想。例如陳虬批評「新政」說「愚以爲泰西富強之道，在省議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世皆其末（創設議院以通下情論）。許象原著議院利害若何論，斷言議院「有利無害」。君主立憲思想的發生，反映商辦工業對官辦工業的不滿，同時也對政治不滿，以上海新學界爲中心，在思想上開始準備着戊戌變法運動。

第三節 新政第一次破產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

（A）李鴻章的外交策略——一意主降

天津北京條約以後，英法俄準備割奪中國領土，先從邊境入手。同治五年英刺威安瑪呈遞「新議略論」，向滿清提出瓜分警告，說「英國早得領甸一分，法國已在安南，俄國分在西藏，新羅」朝鮮之外。或問三國誠有必占內地之心乎，此理始無深論。要在英國已在疆甸，雖雲南不遠，法國已在安南，雖廣西不遠，俄國不必再論。可慮者不在各國有無侵占之心，而在各處有易侵占之勢」。侵略者

公使表示領土野心，滿清政府還看作「危詞恫嚇，傲慢之談」。

頑固派以不察洋務爲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鄭觀應盛世言）。對外交事件動輒宣戰，寧願戰取求和。聲言下葬派（頑固派首領，光緒帝生父，西太后親信人）所謂「不能向彼不來，要雖來而不懼；不能向彼欲戰，要在雖戰而不畏。然後再講和約，可免別生枝節」（同治九年論天津教案奏）。這種不可理解的語言，正代表頑固派的思想。非李鴻章系的洋務派多附和頑固派先戰後和論。

李鴻章系洋務派以北洋爲地盤，辦理新政，特別注重北洋水師，購買大批外國船炮，實力超過南洋水師。南洋屬湘軍系地盤，水師屬福州，上海船廠自造船，外國船極少。北洋水師多用外國船炮，薩軍全用外國後膛槍，頑固派及清流洋務派又羨又忌，要北洋出兵一戰。李鴻章以爲「中國兵輪開辦未久，斷難戰敵西洋」，堅持「今宜籌款，徐圖自強」，就是說，兵力不敵，必需講和。他那樣辦新器，永遠不會有自強的一天，因之他永遠是投降主義者。

英法俄及後起的日本要分割東方的土地，頑固派要先戰後和，李鴻章要和而不戰，交織成瓜分的第二步。

李鴻章說：「中國兵船開辦未久，斷難戰敵西洋」，但喪失藩屬給外國，恰恰從對同樣「開辦未久」的日本開始，琉球事件是洋務派行政改革的第一次宣言。

（B）喪失琉球（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

一八六六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變法維新，開始對華侵略。同治十二年，日本政府稱口琉球船隻碰到台灣？該生船員被殺十人，向清政府交涉。清政府稱「二島俱屬我土，土人相殺，戮決斷在我，何預貴國事？」日使無言可對，編引答辭中有「生番化外，我政府未便窮治」這句話，

商解爲台灣番地不屬中國版圖。十三年，出兵三千人進攻台灣。日本當時還是弱小國，它敢於輕舉動武，是首先取得英美法三國的援助。美國李仙舟得日本當謀主，參贊軍事，英美輪船每日運糧，英法海軍伴同日本兵艦到台灣。廈門，奪它社艦。這顯然是西洋侵略者自己將要掠奪，讓日本首先侵入台灣，試探清廷的態度。日本政社社，被番民們阻擊，退守龜山，設都督府及病院，修橋築路，意圖在臺灣鑄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登海陸軍到台，兵力遠勝日本。英美公使出面調停，代日本要求兵費三百萬兩。沈葆楨奏稱「倭備雖增，倭計漸怯，我但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又通知李鴻章，「不必急於行成」。李鴻章也明知「日艦非中國新船之敵」，「中國兵將之衆，固不畏彼三四千人」，「但英美各伺野心，美國軍事上經常的助日，英使威公瑪口頭上贊成的惻憐，迫使李鴻章決計屈服，令守台軍不准「開仗擊敵」。訂立條約，承認「台灣生番將日本國屬民殺害」，日本出兵是「保民養羣，中國不指以爲不是」，把五百年來忠實的臺灣琉球含糊塗掉，又以償日本兵費五十萬兩。疏載事件開了割地賠款的惡例，此後李鴻章忙著辦割地外交。

(C) 馬嘉理案（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

滿清對外交的傳統方法：一種是「非委而隨從，則舍總空應，畏夷如虎，視民如草」（咸豐八年奕訢對英對奕務）。一種是「凡外國要辦一事，必要多方推阻，及至他國恃強舉行，亦不得問」（威公瑪與李鴻章論總理衙門辦事）。兩種方法都從先戰後和論產生，先戰所以多方推阻，後和所以委曲順從，結果是「衆出之初，小者細者未允，後則充其大者，仍不能結」（李鴻章致總理衙門書）。李鴻章另有一種方法，是「彼雖無禮在先，我索便失體在後，姑且忍氣暫煩，實爲保全和局」（與奕公使談日本佔台灣）。這是有求必應的方法，最得外國侵略者稱許。駐北京外交官熟悉情形，辦理交涉「一言不合，動輒拍案叫罵，以下旗騙交，調派開戰作外交手段，儼然有居殖民地主地位。例如英

使威妥瑪與馬嘉理談，對李鴻章痛斥總理衙門，說「中國所辦之事，辦成不是，說像一個小孩子活五六歲變成一歲了。總理衙門辦事大臣非先換幾個人不可」。李鴻章被他那種「憤激不平之氣，狂妄無理之言」，嚇得「殊深感佩」。更感信自己行求必應是「了百了」的好方法。

英因要開闢滇緬交通，同治十三年，軍官何郎帶兵從緬出發，北京英使威爾遜譯馬嘉理從雲南入緬迎接。光緒元年，馬嘉理回雲南，傳說英兵隨後將攻防地城。雲南巡撫岑毓英殺馬嘉理，調兵守邊境。威妥瑪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三條，總署屢斥不准。威妥瑪與俄公使密商，英向雲南，俄由伊犁進兵，迫清清屈服。威妥瑪再派，對李鴻章表示敬意。清政府開始恐慌，同派李鴻章保和局的建議。威妥瑪提出六條，又另提七條，要求範圍愈愈擴大，總署接受條件比李鴻章少，交涉停頓。威妥瑪更變態，說「中國不照辦，是自取大禍」，提出更廣泛的要求六條，又改成八條。總署根據新要求前赴。威妥瑪堅持撤回何郎事件，春場及一部份官員出京，表示洪受。李鴻章留在天津商議，威妥瑪派兵護送，說「願令我已灰心了」，要雲南再交與印度總督辦理，各海口交與水師提督辦理，英商稅餉概不交完納。他不交李鴻章挽留，非上海戰事在準備開戰。這是威妥瑪，足夠地嚇倒清政府，總署不再想如何推阻而是想如何真得任何條件了。威妥瑪對各國說，要清政府派定全權大臣，才肯商談。自然，非李鴻章不可。光緒二年，李、威在越南訂原古條約，允許（一）印度總督派人到雲南調查五年，報告後再訂滇緬通商及通商章程。（二）英使伯爾派入滇黔甘肅青海一帶，又由四川等處入西藏，前往印度，探訪鐵路。（三）英國派使來使在土法設立承審公堂，中國在租界設立審公堂，擴大領事裁判權。（四）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商埠。（五）規定鴉片稅及其他洋貨捐。

威妥瑪與李鴻章的郵金、意見、這款等款在條約裏是不重要的，英國借題發揮，目的在取得極大的額外利益，消滅清廷的自主權，英法有條約訂制總界，等於滿清承認英國佔有緬甸全勢。

(D) 伊犁交涉 (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

新疆回民受滿清特別殘酷的統治，比內地回民苦痛更甚。同治三年，起兵反滿。五年，浩罕酋長阿古柏自中亞細亞侵入天山南路，立國稱王，得英、俄、土耳其承認。天山北路回民攻陷伊犁，殘殺漢民，秩序混亂。十年，俄兵佔據伊犁，拒絕交還中國。十一年，左宗棠攻並闕內回民反滿軍，準備進取新疆。當時清准兩系軍閥因琉球事件發生嚴重的爭論。李鴻章立主放棄新島，以准其自設部落，如雲貴粵蜀之苗苗土司，緩南朝鮮之降奉正朔，集中財力一作海防之餉。同治十三年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左宗棠亦主復修舊，認為「關外一撤藩籬，雖欲閉關自守，勢有未能」。左宗棠覆陳海防摺及關外情形摺。清政府支持左宗棠主張，准其借貸外債充軍餉。左軍出關是先攻北路，轉取南路，節節勝利，英國原想利用阿古柏，委德委件南路歸印度，該沙俄取北路，平分新疆。龔公使勸李鴻章阻止滿清用兵，謂俄洋務派曾領奉外國人命命，對西太后、左宗棠表示極大的怨恨。光緒四年，左宗棠收復新疆西北兩路，索與伊犁的交涉開始。

光緒四年，清政府派崇厚往俄索回伊犁。崇厚是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當事人之一，會到過法蘭西，其在滿人中算是外交家了，清政府特給「全權大臣便宜行事」頭銜，希望他人去地回，折漢人尤其是李鴻章的銳氣。不料崇厚到俄京，索得伊犁一個城池，却簽訂割讓大塊土地、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合銀二百八十萬兩、新疆都漢口陸路通商、松花江航權等十八條款，喪失巨大權利，消息傳來，輿論大譁，要求改約。左宗棠主張「先之以諭諭（交涉），決之以戰陣」，這種和戰並用法，得清政府及湘系軍閥的贊同。李鴻章發揮他的投降主義說：崇厚所定俄約，行之雖有後患，若不允許，後患更甚，又說「此次崇厚使，係奉旨給與全權便宜行事權，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後翻，其害亦甚。自古交鄰之道，先論曲直，曲在我而悔必自招，引兵之指亦論曲直，曲我在而師必不壯」。

(李鴻章譯文收作「軍事實據」)。環顧所謂海直，正是俄國俄國的一種藉口，企圖侵俄日，當晚日本利用和戰之爭伊犁，正式滅琉球國，改爲沖繩縣。全球使臣察其保護，李鴻章以爲「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於中國而過於日本」，決計放棄。他怕日本得美國支持，不可力敵，要求履行和約，換取俄國的援助，防日本侵犯台灣、朝鮮，奏稱「倭人與俄如虎，與其多謀於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備倭」。他始終玩弄「借夷制夷」政策，向雙方出讓權利，誘起強國互爭，最後向更強者提出報酬，自己得保存本來國勢力。湘系軍閥看破他的用意發起反對，兩系勢成「水火」(劉坤一向李鴻章書)。別一派派首領張之洞斥資淮系說「李鴻章廢險數百萬金錢以製機器而登淮軍，必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這樣的改約空氣，迫使清政府違反李鴻章的主張，專用湘系中人對俄交涉。

光緒六年，派駐英公使曾紀澤爲出使俄國欽差大臣，交涉改約，俄海軍到中國海面示威，清廷調會同茶守山海關，迫起俄北京，劉坤一守長江，湘系湘軍舊將。派派淮軍抵任津沽一路，以示決心一戰。俄國新領土賦，欲事休息，乃於光緒七年重訂中俄條約，中國多少收回一些土地和權利。

(C) 中法戰爭(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

同治元年，法國攻安南下李陞(兩圻)迫訂西貢條約，割西貢東埔案等地。法明原想借涓公河、瀾滄江直插雲南，後來發現「水不能通船，改歸東京(北圻)」，想從富良江(紅河)入雲南。十二年，法兵攻陷河內，不久退出。十三年，訂法越和親條約，法國承認越南爲獨立國，實際成了法國的保護國。光緒五年，越南派質使向清政府乞援，廣西巡撫劉長佑(湘系軍閥)示意越南使稱「願助戰」。劉才驅是太平軍將領，天國滅亡，率部逃入潯城邊境，開闢山林，聚眾耕牧，成一獨立小部落，號辦黑旗軍。劉長佑這一表示，對劉永福算是解除敵意，對越南算是予以援助。越南招劉永福爲三宣副

縱擊，營宜光、興化、山西三省，扼守富良江兩岸。

法兵攻河內，謀開通鐵路，黑旗軍勇敢善戰，又得雲貴總督岑毓英暗助軍火。屢敗法兵，法不得已退。

光緒七年，曾紀澤向法外交官交涉，聲明安南是中國屬國，中國政府不能承認「法越前訂之約」。李鴻章向法公使聲明「越南屬中國已久，貴國如欲吞滅，中國斷不能置之不問」。法外交部答詞強硬，法公使答詞含糊。會不認法越私立條約，李默認條約，但求保持朝貢體面，二人方針不同，引起湘淮兩系大爭鬥。

光緒八年，曾紀澤向清政府建議七條辦法。按當時中法越三方情勢，曾氏所提七條，應該說是外交上比較妥當的途徑。李鴻章逐條駁斥，又不提自己的辦法，牽強矛盾，毫無理由，純屬派系間鬧意見。清政府昏愚無知，不採會以建議，信任李鴻章，進行盲目的被動的錯誤外交，遭受大失敗。安南事件中，李鴻章充分表現了賣國的罪惡。

下面簡述曾李二人意見：

(一)會：令越南派遣大員居住北京，傳達中越雙方情況。

李：照定制，陪臣不得住京師。

(二)會：令越南派員到中國駐法使館，作為使館隨員，傳達中法交涉情況。

李：法越新約第二條，法認越南有自主權，越可遣使駐法，未必肯作中國使館隨員。且法政府

聞知必有責言，轉增疑冢。

(三)會：通知越南切不可再與法人議立新約。

李：法越新約，雖免議立新約。

(四) 曾：勸越南開放紅江，宣稱「保護中國之命，將紅江而設商埠，尤與經濟利益」，各國見俄國越南，皆不歸國，可省無敵窺伺之心。

李：中國不認法越之約，似未便明勸越南於紅江開埠商。若動之，至認此約矣。

(五) 曾：法人常以紅江冬冬之言，無論證之真偽，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於中國。

李：紅江上海若果多盜，正可阻彼通商之氣。

(六) 曾：法越條約西洋各國並未認之。

李：無各國不認之證。

(七) 曾：勸越南殺東士民，勿與法人以口實。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

李：越境竊他教堂，殺人焚屋等事在所難免；但在臨時對法若何。

李鴻章完全抹殺事理，任意亂駁，是什麼用心呢？第一，會紀澤修改條約成功，聲望大增，他濟怕洲亦有人奪取他的外交上地位。第二，他把藩屬國看作可有可無，不值得爲越南開罪法國。歸根究柢，除了保持北洋地盤及淮系權利，其他一切都可退讓，是李鴻章的宗旨。

法國要開通紅河，劉永福誓死不肯退讓，法兵攻陷沿海城市，但無法消滅內地黑旗軍。八年，法公使要求清政府令中國軍隊後退，讓法國進兵圍逐黑旗軍。清政府反對「我退而彼求進」，主張中退法不退。李鴻章致書羅署，法公使竭力辯說，說「細察該使用意，並無我退而彼將來進之心，恐其譁漢口促，文義不甚分明耳」。又說「彼實力願和好」。他把侵略者說成那樣「和好」，總署同意他和法公使在天津議定的三條原則：(一) 中國放兵，法國聲明無侵略土地及割取主權之意，(二) 安南開放保勝(黑旗軍根據地)。(三) 二國分界(紅江中間之地劃界)，但讓安南割取外邊。第一條是中國放棄安南，第二條是承認進攻黑旗軍爲合法行動，第三條中國取得邊外一些土地，防黑旗軍破

，勸總署調會紀澤爲駐英公使，派進法津人員李鳳苞爲駐法公使。法國與李鴻章在天津講和，清政府提出四個條件：（一）維持通商關係。（二）杜絕雲南通商。（三）保全劉永福。（四）不賠兵費。李鴻章不向總署商議，私自訂定天津簡明條約：（一）中國退兵；不開法越條約；（二）許雲南邊境通商；（三）法保護越南，不侵佔中國邊境；（四）不索兵費。簽押後，合詞奏請批准。清政府要保全劉永福，還多少有些公道，李鴻章却認爲「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爲仇，實爲邊境後患」。又說「劉永福黑旗一軍，前後乘法兵單寡之時，屢侵法將，法人恨之切齒，必欲復報」，建議「撤法軍，法內閣當然滿意，外長給他電報說『中堂所見兩國公共利益並未來之專，意與我輩相同，顯有證據，下境身察欣幸。』李鴻章復電說『彼此爲難之際，衷衷，兩地心照，切盼』。似乎買賣越南不納一利，表示感激。他這樣對合法國，以爲可以了事，但緊要形勢，反因密秘訂約更趨惡化。

李鴻章的計劃是一面欺清政府，一面秘密通知進法軍調兩廣總督張樹聲、廣西巡撫潘鼎新自動撤兵，使雲貴總督岑毓英勢孤不得不退。預料法軍消滅黑旗軍，清政府也就承認既成事實，履行天津簡明條約，決不敢出面抗法。他給張樹聲電「法必欲逐劉，雲非與岑爲難。岑素機變，臨時當自審進止。法亦斷不過我界，乞密致岑督」。「潘鼎新也。法國根據李鴻章的口頭約定，派兵進邊境。當時潘鼎新還沒有接到張樹聲電，說法軍行動，顯與條約相反，主張「一意與戰，較易著手」。清政府發覺李鴻章欺騙，請問「法使與該督所談邊境及疆土割讓各節，何以不早上聞，豫爲籌劃」？給他「傳旨申飭」的處分。李鴻章無話可對，暫時沉默，清政府傾向主戰論，佈置對法戰爭。

清政府主戰論者張之洞爲前線總督。今岑潘駐越境「按兵不動，如彼賊竟來撲犯，惟有與之接仗」。今岑毓英「派岑督劉永福一軍，便爲我用」。令李鴻章照會法國：「德法兵來犯我營，則釁自

俄期，即不能保全和局」。令主戰論者服膺徐爲會辦海軍事務，助艦政大臣何如璋督同海軍長官籌畫。五月，中法海陸戰爭開始。

（陸路戰爭第一期（光緒十年五月至十二月））

粵總統助劉永福作戰，態度是堅定的。潘鼎新從李鴻章指示，要求退回環境，清政府嚴斥「該撫上次情信，亦有一意主戰，較易著手之語。目前法人有意議款，何以該撫又有議款不至，求銀款等語，豈欲以此爲對法地步耶？」又通令各軍不准自退示弱，違令者按軍法，潘鼎新被斥責，不得不戰，但戰意漸弛，不願主動出擊。法軍若重向潘軍攻擊，擬給不管「和與不和，三日必要請山」。潘鼎新被迫回擊，法軍戰敗退三十里，戰後向李鴻章解釋說「若非併力掣掣，則全軍皆爲所乘，非我往攻法營也」。李鴻章「堅固不佳，勝亦從此多事」的指示，使潘軍不敢「一意與戰」。法內閣密電質問：「閣下（李鴻章）允西曆六月六日即申曆五月十三日讓山退兵，何故並未照行。」李鴻章被法內閣質問，急欲改變清政府的主戰態度。孤拔帶兵北上，清政府也起恐慌，同意李鴻章的主張，表示「尊意即是穩意」，要他出而講條件，前敵更成和戰混亂的狀態。法海陸軍進攻福州，留陝南法軍兵力微弱，但潘鼎新軍並不出擊。

海上戰爭

（十年六月至十二月）

北洋大臣李鴻章管北洋水師，南洋大臣曾國荃管南洋水師，船政大臣何如璋管福建水師，各有船十餘艘。南北洋大臣地位均等，不相統轄，福建水師半附屬於南洋，但不歸南洋指揮。南洋、福建水師成立較早，暮氣最深，兵船週送官員，拖船載勇，從不操練。六月孤拔率兵船十三隻北上，攻毀台灣基隆炮台，法兵四百攜炮四尊登陸，巡撫劉銘傳（淮系軍閥）擊退法兵，殺傷數十人，李鴻章急。法艦開入馬尾，船政大臣何如璋恐妨礙和議，不敢阻止。距法兩國兵船同泊一處，華船

被禁止移動，何如璋等仍不令海陸軍備戰。七月，法通知何如璋定期開仗，何如璋堅守秘密，對部將說：「昨得李相電，尚言和議大有進步，所云必係謠言」。到時法船大炮齊發，意圖合擊拔營開戰，但戰機全失，船隻相繼被擊沉。福建水師陣亡將士七百六十八人，他們在投降主義者統率下，就是這樣被死了。法艦炮擊船廠後，退出馬尾，被炮台擊傷兩艘。李鴻章奉法軍之戰勝利，謂法艦「一聞船不遇敵刻」，證明高懸與敵。他拒絕法艦佔領台灣，要南洋軍負負責，又拒絕助南洋軍火，以為「無須費助北洋」。南洋也同樣不肯實力援助台灣，劉銘傳要求李鴻章轉「南北洋輪船知肯用戰，法艦不難隨逐出境，尙求統顧全局為盼」。清政府調兵左宗棠：「當此時機緊迫，仍有湘淮皖城之見，不能和衷協力，妥籌援剿，致台北孤危（基隆、淡水失守），防禦大局，實惟左宗棠是問」。事實上左宗棠無力援救，李鴻章有力不援，實左不肯李，李嫌湘淮的不平。如果當時湘淮海上合力，黃桂陸路同心，中法戰爭失敗者不一定是中國。

十二月，法海軍攻浙江鎮海縣海口，約台守將歐陽利見（滄系）輕鎧孤拔，法海軍退去。

六月初——馬尼戰前，法艦駛入馬尼，與華艦口泊一月，不見表態僅戰形跡，法內閣報告議會，說「中國萬不敢戰，四千人可毀七省」。法自准許政府用兵恫嚇（李鳳荷致李鴻章電）。李鳳荷建議「福德兵五十人赴華，法人知之必疑爲尋相暗助」，這種可恥的奴才謀略，大得李鴻章讚許，余李鳳苞被給川資送「來北洋差遣」。馬尼戰後，李鴻章忽得「德相畢士馬赴巴黎結法同盟」的消息，大膽恐慌，認爲「大局將不可收拾」，求和更急。越南方面番照新軍，受李鴻章指示，戰勝不追，戰敗則棄，士氣非常低落，去軍專政新軍，諒山守將蔡元春棄城退向邊區。

陸路戰爭特

二期(十一
年正月至二
月)

潘耀軍退走，四路界線兵，劉永福兩年攻勢猛烈，精力支持感疲弱。

張之洞請出七十歲馮廷選任總將馮子材率粵軍援桂，駐鎮南關。二月，法大軍分三路進關，馮子材率總兵王德榜死力抵抗，雖元春能授，各軍「悉力分剿，大獲勝仗，追賊出關，劉取首級一百餘，傷賊一千餘人」，潘鼎新電稱「自饒中用兵未有如此大捷者」，請驗各軍呈請首級，「皆係精壯洋人」。馮、王、薛都是級營兵，武器極舊，甚至還用刀矛柄鋒。潘軍不是沒有戰鬥經驗，又用新式毛瑟槍，節節收退，完全是接受李鴻章失敗主義的影響。馮粵兩軍「將士一心，願效死力，傷亡雖多，士氣復振」，分路攻肇法軍，每戰必勝，法公使急請和議，願退出基隆，不索兵費(會要求八千萬佛郎)，但求批准天津簡明條約。馮子材率兵進攻，大破法軍，克服諒山，法統帥賴克列牙受重傷，收殘兵敗逃。馮軍追逐，不戰取得文淵城。馮子材、王德榜約會西路法軍，乘勝進攻北黎河內兩省，西貢內應也已約定，準備調法軍出越南。法議會大譁，內閣辭職。李鴻章電總署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運矣」，二月十九日，中法在巴黎簽訂議和草約，根據法方所提條款不加討論，也不讓台紀澤與閱，簽押後一日，才通知他。這在李鴻章說來，惟恐在外交上戰勝了湘系。

草約訂定，上述各路軍三月一日停戰，十一日撤兵。張之洞希望停戰前攻下北軍，李鴻章傳旨斥責說「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能全局以壞，且恐孤軍深入，戰事愈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越非我有，著該督遵旨所電各營，如期停戰撤兵。稍遲遲誤，惟該督自問」。馮子材、王德榜亦得放棄收復的城池，率軍撤回，在三月初一日子刻，即停戰開始一刻給張之洞一個電報：「去歲上諭諭和者諱，請上稍錄錄和之人，士氣可奮，法可除，皆可復，戰事可免。」作為前敵將士被迫停戰時向張的獻策。

張之洞希望停戰前攻下北軍，李鴻章傳旨斥責說「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能全局以壞，且恐孤軍深入，戰事愈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越非我有，著該督遵旨所電各營，如期停戰撤兵。稍遲遲誤，惟該督自問」。馮子材、王德榜亦得放棄收復的城池，率軍撤回，在三月初一日子刻，即停戰開始一刻給張之洞一個電報：「去歲上諭諭和者諱，請上稍錄錄和之人，士氣可奮，法可除，皆可復，戰事可免。」作為前敵將士被迫停戰時向張的獻策。

出悲憤的抗議。

(F) 喪失緬甸(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

英國侵略緬甸，咸豐年間已勦取南部各地。中法戰後英軍乘機攻滅不緬，清政府毫無遠抗地訂約承認吞併的事實。連安南緬甸間老撾(南掌)地區人民反抗激烈，英人自願退還中國，清政府也不敢接受，老撾歸入暹羅。

(G) 北洋海軍的擴充(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至一八八九年——光緒二十年)

海軍是當時新政的中心，外交上每一次失敗，李鴻章總是說：水師還未練成，船艦尚須添置，不得不「含忍籌款」。他搜括大量金錢，向外國購置兵船槍砲，認為是唯一的自強之策。至於中國官僚政治所產生的，船廠制度的腐敗，海軍操練的鬆懈，海軍將弁任用非才，幕氣日深，購械官員的貪污(例如李鳳苞購買鐵甲船勾串外國流氓，貪污至百萬兩，被人告發，奉旨革職查辦)，他都不以為意，止知用高價買外國廢船舊炮，裝飾門面，鞏固淮系軍閥的權勢。他在光緒六年奏議(放棄)琉球案奏摺裏說「數年之後，船械齊集，水師練成，聲威既壯，日本震懼之氣當為之稍平，即各國輕侮之端或亦可以漸弭」。事實證明他所謂「數年之後」是遙遠無期的，也永不會有「聲威既壯」的一天。

中法戰爭，湖淮畛域太顯著了，清政府乘機收回海軍，企圖統一指揮權。十一年九月，設立海軍衙門，派醇親王奕訢為總理海軍事宜，庶郡王奕劻、李鴻章為會辦，善慶、會紀澤為幫辦。五人中滿洲貴族佔多數，但實際權力仍在李鴻章。北洋利用海軍衙門遙為海防的名義，新添不少外國船，別處敗好船隻都接到北洋來。從十一年到十七年，李鴻章的新政達最高點，北洋有新舊大小船艦二十五艘，他第一次發出滿意的聲明說，「綜合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跟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總

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拔之勢」（李鴻章校閱海軍情形摺）。在清政府對日漢人擁有強大武力的猶忌下，戶部尚書翁同龢藉口等餉，停止南北洋購買外國槍炮，船隻，機器撥款，將所有價銀解戶部充餉。海軍經費原定每年四百萬兩，亦經希望西太后歸政給他的兒子（光緒帝），贊成西太后修頤和園，移海軍經費管進。李鴻章爲了結交西太后和奕訢，以鞏固權勢，不但自己同意撥款，更力勸南洋大臣曾國荃同意。光緒十四年以後，停止添船，十七年以後又停辦軍火。國上所費銀約三千萬兩。清雖然應以西太后爲首惡，但李鴻章實罪大罪究，他却無恥地推諉軍火戰械責任，歸罪於移款修園，軍力不充。實際上船砲不及日本只是次要因素，他的技降戰略指導才是主要原因所在。

自同治元年開始辦「新政」，到甲法戰役，已歷二十四年，新政的成績，在「自強」上是下地。戰，在政治上是造成湘淮軍閥割據對立，在外交上是割地喪權。總之「新政」在中法戰爭中表現了始破產。不過洋務派是不能也不願覺悟的，仍繼續其「新政」，等待更大破產的到來。

從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是著名的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張之洞開辦各種工廠尤稱出色，但絲毫見「富強」的實效，重要原因就在軍閥官僚把持機器，規定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阻止機器與民間資本結合。洋務派愈「富強」，必然是人民愈貧。國家愈弱，把洋務派創辦新工業，看作中國富強的基礎，那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也就招至甲午中日戰爭時的慘敗，「新政」受到徹底的破產。

第六章 甲午戰爭及第一次割地狂潮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

第一節 中日朝鮮交涉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至一八九五年）

——光緒二十年）

明治的維新變法，資本主義在日本迅速發展起來。它和封建經濟結合着，表現出特別強烈的侵略性，明治時代就奠定了大陸政策，企圖從俄國圍攻至世界。照田中義一奏摺所說，「明治大帝之遺策」是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洲，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日本在英美法美主要是美國的援助下，開始侵略台灣，結果割取了琉球。南境政策獲得初步成功以後，仍在英美援助下，向朝鮮侵入。美國要開放朝鮮市場，英國要阻止沙俄南下，日本要奪取波濤洲的樞紐，沙俄要維持其在朝鮮，國際鬥爭集中在海軍一角上，應付這個危局的是滿清政府和李鴻章，外交逐步失敗，最後發生甲午戰爭上大失敗。

朝鮮交涉經三朝時期：第一朝爭奪主權，第二朝引發甲午，第三朝特戰拒約。

爭宗主權。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

光緒元年，日本軍艦到朝鮮江華島測量港口，日艦延被倭人領水。

聯合開徵示警。日艦被毀後，倭陸軍殺兵民無算。日政府作爲賠償的藉口，派軍逼迫韓政府訂立江華條約，認「朝鮮爲自主之邦」。韓政府並不正式對日抗議，僅由李鴻章密勸韓政府「用以敵制敵之策，與泰西各國訂約，藉以牽制日本」。李鴻章對朝鮮交涉，主張聯日拒俄，以正日本「與英人暗結密援，其勢日強，其志不小」，可以「與中國萬里併力拒俄」。對同一時候的伊犁交涉，則主張「結盟與俄以取償於日本」。這似乎是矛盾，但從他的投降主義說來，却是一貫的宗旨。因爲「聯日」「拒俄」是其主張，「拒俄」是欺入的辭令。光緒三年，日本內亂，李鴻章私贈日政府後援金十萬鎊，說是「救災卹鄰，以示收睦」。中法戰爭，他拒絕給南洋任何援助，對侵略琉球台灣朝鮮的日本，他而着清政府接濟軍火，這誠一個排內媚外的外交支持者，朝鮮的前途可想而知了。

日本扶植朝鮮失意官僚，組織所謂「開化黨」反對把持國政的「事大黨」。光緒七年，「開化黨」得勢。八年，「事大黨」利用兵變，閉日本公使館。中日兩國各派海陸軍到朝鮮，成對立的形勢。朝鮮國王接近「開化黨」，企圖脫離滿清，實行「獨立」。十年，中法開戰，「開化黨」乘機作亂，勾結日兵入王宮奪取政權。清軍得朝鮮人民援助，擊敗日兵，亂黨逃往日本。十一年，中日談判朝鮮問題，李鴻章要求雙方同時撤兵，又允許兩國對朝鮮有同等派兵權，事實上承認中日共同保護朝鮮。十一年，中法戰爭結束，日本軍閥主張三年內與中國一戰，奪取朝鮮，理由是「中國自戰法以後，於海陸各軍，力求整頓，若至三年後，我國（日本）勢必不敵」。這種相爭的問題，說明日軍閥對中國情況完全無知。發達階級代表伊藤博文反對軍閥的擴張論，說「預云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

慮。雖此時外而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論。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密發有爲，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試如西洋人所說，中國又睡覺矣。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而充實，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中國駐日使館密探朝比奈報告）。這種觀察是深刻的，日政府採用伊藤的建議，專力向朝鮮伸張勢力。

引俄制日
光緒十一年
至二十年

「開化黨」政變失敗，日韓關係緊張。中國以擊破日兵，救護韓王，勢力一時擴大起來。當時代表滿清駐韓的官員，一個是袁世凱，一個是德國人羅麟德，袁世凱在中日撤兵前，經羅麟德與駐韓准軍吳長慶部前敵營務處，顯出辦事才幹。吳軍撤回，李鴻章給他「總辦」名義，留韓監督政治。他向清個人建立功名的野心，曾企圖滅韓國，廢韓王，對韓政府態度傲慢，遇事積極干涉，惹起韓人的反感，暗中謀脫離對滿清的宗屬關係。穆麟德受李鴻章委任，替朝鮮對外交事務。他抱有另一種野心，誘韓政府與沙俄訂制地密約，使沙俄與日英美三國對立。德國與俄助戰，分奪權利。袁世凱一人，一個引韓離華，一個引韓投俄，在日本看來是很不利的。它要中俄關係惡化，將使韓說「中國近有廢朝鮮為郡縣之意，俄國何不先發制人」。對中國說「俄有佔領朝鮮之意，中國宜先下手」。唆使兩國相爭，以冀從中取利。競爭的朝鮮，先受沙俄引誘，後受美國煽惑，厭惡滿清，船「俄素長洋，我派使結洋，消必畏我」，一心尋求新主人。十一年英佔其文島起，各國爭奪朝鮮感演愈烈，主要爭奪者是中日兩國。

十一年三月，英俄因爭阿爾汗特起戰爭。俄兵佔領海參崴，其國境長佔朝鮮其文島，防俄艦南侵香港。韓政府提抗議，要求「撤去此島」。李鴻章謂「英曾與俄訂約，上朝鮮中國皆無異議，對英政府表示「自願亦無抗拒之意」。在倫敦訂立承認佔領朝鮮的約，實則使上條首領士德行為。

俄國認爲有佔領其他島嶼或朝鮮半島一部之危險。一面與俄國議定，簽訂關於滿洲、準備派兵編隊守朝鮮各海口以助威威。朝鮮不俄國援助下，企圖「與華平行」，低價清政府改節制，減低國的計議及重慶國的關係干涉。日六看，朝鮮「引俄國」，威脅本身既得之利益，向李鴻章要求「得美國之有才考一人，令朝鮮政府委任以代穆德」，李鴻章也以爲美國人可信任，派一個所謂「宅心公正，毫無隱面聲名」的美國人德尼 (John N. Deane) 代穆德德德。中日美英各方面壓迫政府「取消新約」，俄國誘誘，願訂約聲明「決不侵佔朝鮮領土」。李鴻章主張引俄制日，以爲「韓難可慮，有俄在旁，日斷不逞生心。我當一意聯絡俄人，使不侵佔韓地，則日亦必縮手（致總理衙書）。允許日後朝鮮如有大事變，中俄六國商定辦法，實際是承認俄國參加保護權。清政府認爲「被俄牽制」，不允訂約，俄國口頭聲明對韓無領土野心。十二年，英俄阿富汗事件和緩，英德退出巨文島，英俄兩國交涉暫告結束。

德尼受中國政府委任，但助美日反清，唆使朝鮮「結洋獨立」。十三年，朝鮮私派全權駐美公使，清政府力阻無效，朝鮮使臣有全權名義，地位在清使臣上，表示外交「自主」。德尼及日政府推薦李仙舟充稅司，借美債二百萬元，以海關作担保。李仙舟是引日兵攻台灣的著名流氓，清政府設法阻止，韓政府却授李仙舟二品銜，辦理外交。表示政治「自主」。十六年，美兵船調兵五十名駐膠州漢城，同時「日兵先奪濟南海城約有四五千人」。清政府向美抗議，美日兵陸續退出。韓政府親美態度愈發執清態度，滿清依俄國虛與援助，日本得美國實力支持，中日鬥爭愈益緊張，韓政府親美態度愈益顯者。

滿清在韓地位陷於孤立，不謀挽救的策，反增加了政府內部的派別爭鬥。吳長庚軍主要策策

著「朝鮮善後六策」，請李鴻章改郡縣、置監國、駐重兵，實際上吞滅朝鮮。李鴻章當然不敢聽，這就不負責任的狂謔，但對年少氣盛的袁世凱及一般清廷派即有極大影響。光緒帝頗倚翁同龢，翁同龢「清議」，有意製造擁帝黨，張謇的主眼點都到政府方面。李鴻章一向憎惡清議，也一向被清議派斥責，他原來希望「湖皇親政」，太后退休，政治上傾向擁帝黨。翁同龢接近清議派，與李鴻章對立，李鴻章失望，轉向太后黨，附和奕訢的私意，移接海軍經費，這又正合滿洲統治者削弱漢人兵力的顯策，朝鮮形勢危急，李鴻章向定奪購船械，原因就在翁李不和，借朝鮮交涉進行內爭。

待俄拒日（光緒二十年三月）

至六月

朝鮮外患交迫，內政腐敗，光緒二十年三月，全羅、忠清兩道人民響應東學黨起兵，揭「逐滅夷倭、盡滅權貴」旗號，與政府軍交戰，政府軍大敗。東學黨又稱東學道，是民間反政府的秘密結社，日俄府陰謀出兵朝鮮，派遣浪人、軍人組織所謂「天佑俠團」，助東學黨作戰。韓政府請求李鴻章派兵援助，日本訪李鴻章出兵干涉朝鮮，表示「貴政府何不速代韓賊亂，我政府必無他意」。李鴻章以韓拒韓請求，有失「上國體面」，既得日政府「必無他意」的保證，五月，派張志超率陸軍二千五百人到朝鮮代平內亂，日政府見陰謀得售，立即派兵入韓，李鴻章初意止在保持「上國體面」，決無備戰的決心，日軍陸續增至萬二千五百人，張謇不能增援。韓政府見賊兵勢弱，改變態度，刻日乞和，李鴻章進退失據，完全落入日本預設的陷阱中。

李鴻章專心盼望外國調停，並不惜敵自敵。他一面函英公使電英勸阻日本違兵，又請俄公使「據俄外部儲備駐日使臣切勒日與我約期同時撤兵」，以為「突俄夾攻，或易就範」。後來發現「英人據俄擬奪主事，外和無議，殊難信」，但俄公使表示願助，自是有所藉。俄公使說「俄艦近臨

「李鴻章日軍行于頃」，又稱「俄皇已電諭日俄兩國取長志，對台島以爲兩國之長志，如日本不聽，必須用壓服之法」。李鴻章獲得這些口頭援助，對日態度轉趨強硬，諒袁世凱亦持此日同時說：「此外如有別項要求，任他多方恫嚇，當據理駁辯，勿勿勿」。日軍陸續增援，袁世凱、葉志超請派援軍，李鴻章持有俄援，令袁葉「領勿勿勿動」，說「俄在日語正緊，略忍耐必有風虎」。日陸軍萬人，分守漢城四路各要隘，海軍全部出動，戰機成熟。六月初，袁世凱電告「日決無和意，我應妥籌」。海陸軍將領多請先佔重要地區，「早立脚步，免爲日族先得」。李鴻章仍令切勿多事，說各國正在勸和。或有辦法。葉軍駐牙山，已居絕地可危，葉志超提出三策：上策增援備戰，中策自動撤兵，下策坐守死地。當時俄公使通知「俄只能以友誼力勸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強勒日人」。李鴻章大驚，但仍希望力勸有效，軍事上採取下策，等待俄英法德義等國調停。他在訓令葉志超電文裏說「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仍望靜守勿動」。又說「日雖竭力豫備戰守，我不先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短，切記勿忘，勿性急」。他始終幻想俄國會武力援助，英俄「必有辦法」，日本先開戰，「將來各國開戰之罪必問日」。半殖民地國家統治階級的奴才思想，李鴻章在朝鮮交涉中，創造了最極端的實例。他的繼承者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這個實例，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李鴻章思想發展達最高點，人民所受的災禍也比甲午戰爭不知大若干倍，中國人民要爭取解放，必需反對李鴻章思想繼續支配政治。

第二節 戰無不敗的海陸軍

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李鴻章電令葉志超「切認萬國公例」，二十日，又電總理衙門說：「奕劻宜請將各國議調停之罪必問日」。他正在說這些夢話，二十一日，日軍入王宮謁朝鮮王，頒令

中日戰爭遂步出華軍，戰爭正式開始。李鴻章奏稱沙俄將派兵護日，中國軍可隨時「會剿」。總理衙門認為「我軍會剿一節：殊未妥協」，令李鴻章「一軍主戰，斷不可意存畏葸」。這個慣於投降的洋務派官員被情勢所迫，不得不勉強應戰。他不信自己可能戰勝，而堅信外國（主要希望沙俄）一定會出面干涉，始終採取「處處後退」的軍事佈置，等待外國干涉的到來。整個甲午戰爭，就在這樣可恥的失敗主義指導下，海陸軍全部被殲滅。

牙山潰敗

（光緒廿年六月）

葉志超率駐牙山，孤立無援，中日戰爭開端，李鴻章臨時派兵二千人渡海往救，他總要帶一些外國關係才敢行動，用重價僱英國商輪高麗等三船運兵，中國兵船濟遠等三艘護送。天津電報生出賣開船消息給日本，日艦集牙山口外，聞炮聲沉商輪一艘，兵船兩艘，溺死千餘人。濟遠艦管帶方的謙見敵艦開炮，躲入船內裝甲最厚處，向旅順飛逃，自稱擊斃日海軍總統。海軍提督丁汝昌，僅得濟遠大破獲，賞銀二千兩，「論全軍，以為奇勳」。李鴻章明知「中西人傳為笑談」，仍用「竭力拒敵，苦戰支持」等語報告清政府。高麗精流海，他認為「上掛英旗，日敢無故擊沉，英人必不容應」，大有干涉戰事的希望。「二十六日，電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聲明日先開戰，豈非自取罪」，發給照會的用意，不是表示堅決應戰，而是希望「後來各國調停議結，暗伏其根」。戰爭開始，第一希望因日政府迅速對英認賠謝罪落了空，第二希望因各國宣言中立，調停一時無望，日本方面又「有美國人幫助戰事」（朝鮮稅司柏卓安致津稅司密信），他本來不會有戰意，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畏葸延宕」，再沒有其他主張。

葉志超當然不會比李鴻章勇敢一些，日軍進攻牙山，壽士成戰敗，葉志超率軍先逃，曾善向平壤狂奔，兵士疲瘦對露，沿途都是屍體。從牙山到平壤不過數百里，他前走近路遺棄口軍，專走遠路，

一個月（七月）才到這平壤，李鴻章依摺葉志超報告，奏稱運軍在牙山大捷，沿途應放饑兵，戰功甚大。清政府特發上諭說「直隸提督葉志超與倭人接仗，擊斃倭兵二千餘人，實屬奮勇可嘉。加恩賞給該軍將士銀二萬兩，以示鼓勵戎行之至意」。又諭「該軍將弁皆苦戰，奮勇出力，深堪嘉尚，著准其擇方奏保。該提督已抵平壤，與大軍相合，即着統率諸將，協力進剿」。逃將賊兵受重賞，葉志超並陞任平壤各軍總統，李鴻章的賞罰調度加速了平壤軍的潰敗。

平壤潰敗

（二十年

八月）

主戰派首領光緒帝嚴令李鴻章備戰，牙山戰前數日，李鴻章派衛汝貴、馬玉崑、左寶貴、豐陞阿四大軍自遼東分起入朝鮮，駐紮營京平壤城。朝鮮人民夾路歡迎，爭送茶漿勞軍。這些軍閥軍隊在國內當慣了盜賊，對朝鮮人民自然更殘暴，大軍過境，毀器物，燒房屋，奪財貨，淫婦女，殺平民，捉壯丁，擾害異常。「由義州至平壤數百里間，商民均逃避，竟有官亦匿避。定州燒屋幾

及半里，沿途鍋鍋碗碎，不但夫馱難覓，且途中飯舖皆無」（李鴻章稟飭軍紀電）。作為主力軍的衛汝貴「怯無能，性情卑鄙，平日尅扣軍餉，不得軍心」（光緒上諭），在四軍中紀律尤壞。馬左衛豐四軍共二十九營同居平壤城中，將各一心，不相統屬。衛汝貴軍十三營，人數最多，「兵不服將，鬩關數次，連夕自亂，互相踐踏」（李鴻章稟衛汝貴電），又與馬玉崑軍互相轟擊，死傷多人。七月底，葉志超率敗兵六營逃來，被任為各軍總統。將領各有意見，不服調度，比較能戰的譚士成藉口報兵，走回天津。葉志超毫無佈置，束手待敵軍來攻。八月十五日，日軍先鋒到城郊，葉志超主張棄城逃走。左寶貴不許，派親兵監視志超，自率所部六營守北城玄武門山頂。其餘各將分守東西南三面。十六日，日軍集合重兵猛攻玄武門，左寶貴誓必死，立城上指揮，殺傷敵兵無數。日軍排炮轟擊，左寶貴殺死。日軍佔玄武門，尚不敢入城。當時馬玉崑衛汝貴率退東門兩路日軍，還可以回兵決戰。葉

志退下令撥兵遣退，各營潰亂，日軍擊潰兵二千餘人。葉志超率將領奔逃五百餘里，二十二日渡鴨綠江退入中國邊境。

守平壤本是必敗的下策，李鴻章一向主戰不主勝，以為戰敗講和，「和款可無大損」，戰勝則「兵燹禍結，大局不可收拾」。他駐兵牙山絕地，又駐兵平壤孤城，目的就在戰敗講和，葉志超一路潰退，正是執行他的求敗方針。

平壤城內駐清兵三十五營約二萬人，積儲軍火糧餉極多，凡有大小砲四十餘、毛瑟槍一萬餘桿，餉銀約十萬兩，又各將領搶得的財物，有金磚六十七塊，金錠六十一錠，金沙大小三十包，其他貴重物無數。這些，都是中國和朝鮮人民的膏血，經過他們的手，全部送給日軍。葉志超照例彙報戰績，李鴻章又照例奏送將掩飾，清政府依據紙上空文，無視輿論的指責，下諭「葉志超著加恩免議，李鴻章亦一併加恩免議處分」，平壤大敗，就這樣不負責任地結束了。

平壤戰前，李鴻章派宋盛、劉盛休、依克唐阿等軍駐紮九連城，防守處以九連城是中韓交通孔道，與南岸朝鮮羅州隔江相望。當時集中軍隊七十餘營約四萬人，滿洲將軍依克唐阿十二營自立一軍，其餘各軍歸宋慶總統。完全像平壤一樣，各軍將領不服調度，散漫無紀，同居九連城中，依舊束手待敵軍來攻。

九月二十二日，日第一軍到義州，二十六日，日兵三三千人渡河，放一排槍，依克唐阿軍潰逃，被日軍追殺百餘人。二十七日，日軍大隊渡河，各軍不戰潰散（僅滿士城軍接戰一二小時），二十八日，日軍入九連，安東二城。

大連旅順濱

敗（二十年

十月）

光緒六年，李鴻章開辦總督旅順軍港，陸續建築砲台。十一年，迭大船廠，設海軍提督衙門，與山東威海衛同爲北洋海軍根據地。甲午戰爭時，旅順軍港設海岸砲台十三座，陸路砲台九座，有大砲七八十尊，除本國造四尊，其餘全用德克鹿卜廠製品。旅順港後路大連灣設砲台六座，有克鹿卜最新式大砲二十四尊。旅順駐張光前、黃仕林、姜桂題、程允和、衛汝成、徐邦道等六軍，共三十餘營。李鴻章令「食部庸劣」的張照環統率六軍，實際是各不相統。大連駐趙懷益軍六營，九月二十六日，日第二軍登陸花園港口（離金縣二百八十里），預備砲馬輜重上岸凡十二天，中國海陸軍坐視不過問。日軍到奉子窩，旅順震動，徐邦道提議出兵迎戰，保護後路，張光前等不聽。趙懷益聞日軍登陸，派人邀大通軍來到煙台出資，準備逃走。部下將士要求出擊，懷益斥責說「我奉中堂（李鴻章）令守砲台，不管後路戰事，汝等欲拒敵，須請令（李鴻章命令）方可」。徐邦道率本部兵士往守金縣城，與日軍大戰，死傷極重。十月初九日，向趙懷益請援，他正在碼頭親自督兵勇搬運餉銀，行李什物上船往煙台，不肯援救。金縣城破，徐邦道退回旅順。初十日，日軍分三路進攻大連灣砲台，原來預備倉庫早一天已逃入旅順，兵勇潰散。十一日，日海軍來攻，見砲台上站立日兵，海陸兩軍不死一人，太意外地佔領了大連灣。

李鴻章經營大連灣凡六年，防務最稱鞏固，軍械庫中儲藏大小砲一百二十餘尊，砲彈二百四十六萬顆，德國新槍六百數十桿，子彈三千三百八十一萬顆（槍砲數目也許不確）。其他如馬匹、行軍帳及各式軍用品無數。趙懷益不願毀壞，全部留給日軍，因爲這都是不便運向別處變賣成錢的器物。日軍在大連休息十天，二十一日，向旅順進兵。各守將準備設法來就逃，統帥張照環早已逃歸天津。徐邦道率兵抵禦，擊退日軍，保旅順後路。各守將不派援兵，又不給送糧食，紛紛從海路逃往煙台，大小

官員各取庫中貴重物件僱民船逃走，兵士無人統率，搶掠官銀號，族爾大亂。二十四日，日軍大隊來攻，徐邦道戰敗退回。二十五日，椅子山砲台失陷，各台守兵相繼潰散，日軍佔領旅順。

李鴻章經營旅順軍港凡十六年，前後費銀數十萬兩，船塢、砲台、軍備號稱「北洋精華」，與大瀾運同樣全部送給日本強盜。

日軍入旅順後，獸性大發，慘殺中國軍民，引起正義人士的憤慨。美國胡蘭德博士在「中日戰爭之國際公法」裏說「當時日本將卒之行為，實超出常度之外。四日開砲殺非戰鬥者婦女幼童。從軍之歐洲軍人及特別前隊員自舉此殘虐之狀況，然無法制止，唯有旁觀，不勝歎惜。此時得免殺戮之罪人，全市肉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爲供掘尋其同胞之死屍而被殺殘留者」。泰晤士報載「日本攻取旅順時，我殺百姓四日，非理殺伐，甚爲慘傷」。又有「中兵斃羣，披其執纜，先用洋槍擊死，然後用刀支解」。美國報紙「痛責日本軍隊之暴行，謂日本國爲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又謂「今晚文明之假面，露野蠻之本體」。日本強盜從慘殺旅順軍民起，五十年來慘殺中國人民何止數千萬，這一篇血腥必需清算，自然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但是，國內大盜的罪惡並不比外國強盜較少，外盜一定是內盜引進來的。滿清政府、李鴻章及其繼承者，五十來年篡奪國家統治權，一脈相傳，堅持失敗主義，招引外國強盜乘機侵入，共同享受掠奪物。中國人民不堅決消除這些篡奪政權的內盜，日本帝國滅亡了，更強大的帝國主義還會繼續擴大。

光緒六年，李鴻章辦北洋海軍，在天津設水師學堂。教習學生多是福建人，福州船政學堂的宗旨照習，再加上淮軍的腐爛風紀，構成北洋海軍不可救藥

的症候。北洋歷年添購外國船，有戰艦九艘，守口放船六艘，魚雷艇六艘，練

船三艘，運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器械噸數與日本海軍約略相等，將士素

質遠不及日本。鮑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說「海軍之建也，琅威理（英海軍軍

北洋海軍戰
敗（二十二
年八月）

官，任北洋海軍總司令。其時，李鴻章派入，願之。右翼總兵劉步蟾以計逐張威。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鄂閩人之上，為鄂閩所制，威令不行。張威理去，操縱盡弛，自左右總兵以下，爭望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對東，海軍慶例巡南洋，率淫賄於香港上海，識者憂之。李鴻章所謂『日前海軍將材，尙無出其（丁汝昌）右者』，『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全是自欺欺人的空話。信辦海軍，原爲提大本集團聲勢，與陸軍同樣不會準備對外作戰，因之從來不需要整頓。

北洋海軍兩個根據地，威海衛停泊戰艦，棗園修理船隻，各設提督衙門，保衛渤海口。二十年七月初，丁汝昌執行李鴻章的『保船』計劃，堵塞威海衛兩海口，密佈水雷、木關、鐵鍊，阻日海軍來攻。清政府主戰派令丁汝昌出海邀戰，他卻報稱『未遇倭艦』，其實日艦控制了渤海，經常在威海衛口外巡弋。

八月十三日，李鴻章派招商局輪船在劉步蟾兵十二營援平壤，自鴨綠江口大東溝登岸，丁汝昌率海軍全隊兵艦十三艘護送。十七日到達大東溝。十八日午前，見西南來黑烟一簇，測望來船懸美國旗。午刻船來漸近，凡十二艘，全改懸日本旗。丁汝昌、劉步蟾、漢納根（德人）秦榮（英人）在旗艦定遠鐵甲船（管帶劉步蟾）上議定由『分段襲例』陣勢，下令起錨應戰。劉步蟾違反議定的陣勢，發出信號，令艦隊橫列，主力艦（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中。他是卑劣的懦夫，企圖居中發射砲火。秦榮見陣勢錯誤，但時機迫切，不便更改，對劉步蟾說『總兵已發錯誤之信號，然若更改，紛亂益甚』。兩翼弱艦自後位置危險，故將後進，艦隊成半月形，而主力艦自然突出在前方，日艦似將攻敵弱的右翼，秦榮建議全隊向右移動，或可使主力艦先與敵艦接觸。丁汝昌立即採納，令漢納根到船後傳令發信號，各艦遂令移動，劉步蟾停留不動，遂與接觸。秦榮大怒，自瞭望塔跳下，奔上飛橋見了丁汝昌

，因言語不通，等待漢納根回來。翻步艦在橋下突發一砲，飛機年久失修，被震破壞。丁汝昌奉命從空中跌落，都受重傷。丁汝昌仍坐甲板上督戰，漢納根出身陸軍，海戰不能得力，卻成爲主要指揮者。

日艦轉攻左右翼小船，陣脚致遠，經遠兩艘被劃出陣外。致遠受傷，管帶廣東人鄧世昌恨關建燾將領作戰不力，對大副陳金揆說「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此艦，足以奪其氣而成事」。致遠開快車撞吉野，中魚雷炸裂，全船二百五十人同時溺死。經遠屢受傷，管帶林永昇也敢輪撞日艦，中魚雷沉沒，死二百七十人。真正死戰的將領止有陸軍左翼貴海軍鄧世昌，林永昇等數人，其餘將帥多是兒戲，但得李鴻章信任的却是那些兒戲將帥。

雙方接戰，中方沉沒四艘，逃走兩艘，剩下七艘。日方沉沒一艘，重傷數艘，日火艦五艘合攻定遠鎮遠兩主力艦，日旗艦松島受重傷，定遠也受傷。戰事經歷五六小時，日艦向南退去，中國艦隊退回旅順。

黃海大戰，中國失艦較多，但止是小敗，也可以說不分勝敗。李鴻章故意自認大敗，逃作陸軍武器論，說是「凡行軍制勝，海軍惟恃艦砲，陸戰惟恃槍砲，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由此得出結論：「海軍快砲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挫敗「固由寡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一切腐敗潰逃的責任，全部推脫得乾淨，事實恰恰證明軍閥軍隊根本不願抵抗，國恥時，所謂武器不良，無非作爲藉口，實行一貫的失敗主義。

黃海戰後，翰林院學士參李鴻章，列舉罪狀，其中有一條是「倭米船則放之，倭運糧平其則擊之，倭艦被獲，非明縱則私放。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搜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某（字經方）爲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章叔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鴻章及軍械局員，而某親索還李鴻章之

議，勒令天津李鴻章改供。俾李鴻章既無所出。有謂李鴻章者，又爲之請旨釋放。京城所歷年所購糧餉，多被盜守盜貨。及東事已起，始檢出不合用之新槍子，實與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朋分，而李鴻章爲之補給領字。外間並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赤田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處開設洋行三所。種種事實決非虛妄捏造，雖然不能斷定他已經賣身給日本，但國慮留難和餘地，不經堅決抗敵，始終無之戰意，却是無疑的。軍國責任決定李鴻章在戰迫作戰時，採取這個一斷消極應戰一而力謀投降的卑劣方式。

威海衛法敗

(二十一年)

正月

中國船艦入旅順港，照例納稅，加工修理，三十五方河碼頭。因爲「船上無用者甚多，極爲難處」，他要求做海軍副提督黃資馬壽，有極強個海軍人材，以能戰爲要，否則「不肯再上船」。這說明明海軍損失不大，主顧病根在弁兵弱敵無用。李鴻章拒絕他的提議，令劉少蟾密代產軍提督。九月二十日，各艦修整竣工，出旅順口回威海衛。十月，旅順危急，丁汝昌請率海軍全力援旅順，決死一戰。李鴻章大罵，說「汝善在威海守汝敗隻船勿失，詎非汝事」。

十月清政府從李鴻章，嚴令丁汝昌「守鎮定兩鐵艦毋損傷」。從此北洋艦隊困守港內，坐待城滅。

李鴻章看海陸軍是個人私物，黃海一戰，大發牢騷，說「以北洋一隅之力，博倭人全國之師」，決計藏匿不出。他不想十餘年來耗費銀數千萬兩，專養北洋一隅，當然應負抵抗侵略的責任。李鴻章要錢時看到全國，出力時止見北洋，電閱所說的國防軍隊，本質未盡是私人軍隊，這就是絲毫不客氣請的例證。

李鴻章外交上主張屈服求和，軍事上主張戰戰自保。一個投降主義者應該有這樣的思想，他起初自信「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光緒十七年檢閱海軍奏)。黃海戰後，他自信能守威海衛

，與船「北洋海軍尚有完備，倘遇兩鐵艦，即以快船發雷，隨以快船發雷，隨以快船發雷。各口守台甚勇，均係訓練有素」。試看他怎樣守威海衛。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海陸大隊到威海，陷桑城縣。日船二十五艘，多是木質小船，被砲擊不剩十隻。威海港內泊戰艦十五艘，出口決戰，威敵未可知，丁汝昌受李鴻章命令保艦，堅守不出，其砲軍得進攻威海砲台。威海衛砲台分南北兩砲，前砲砲台三座，設大砲十三尊。北砲砲台七尊，設大砲十四尊。各砲全是德國克鹿卜廉製。守台兵號稱練軍，凡八營。統領戴宗祥自率練軍駐北砲砲台，分駐劉公島率練軍駐南砲砲台。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日軍攻佔南砲砲台，擊軍陣亡二千餘人，砲台被擄，劉公島逃走。北砲砲台望見，同時潰散。初七日，戴宗祥逃往劉公島。東方兵事紀略說：「蓋自甲午九月，練軍軍勇丁即索歷餉銀兩大嘩，欲潰者屢矣。臨餉者，勇丁初入營，須扣餉三月，存餉領台，以為軍米贖價底銀，俟勇丁脫營日始補給令去。於是將領利勇丁逃亡，其存餉三月可不給，而續給之勇仍可扣贖也，恆以苦工資勇丁，勇怨入骨，及軍船陷危，而戴宗祥給歷餉兩月，緩軍亦嘆，宗祥終不給，至是稍略，洪不復顧」。李鴻章所謂「訓練有素」的練軍，竟是一堆不堪一擊的腐敗軍隊。

日陸軍佔領南北砲台，日海軍堵塞威海東西兩口，海陸發砲攻北洋艦隊。十二日，擊沉來遠、威遠等船，來遠管帶鄧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啓正在政院住宿，沒有避難。十三日，各將領勾結洋員（英人浩威為首），煽動兵勇水手叛變，露稱「向丁提督乞生路」。洋員與機動丁汝昌「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說「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洋員及各將領密謀迫脅汝昌投降，十六日，令弁兵圍汝昌鼓噪，德員瑞乃爾密告汝昌說「兵心已變，勢不可為，不若沈艦燬台（劉公島砲台），徒手降敵，較為得計」。汝昌深思良久，下令各艦管帶開門沉船，遣軍閥夫反抗命令，怕空手投降，日本人要發怒。十七日，汝昌召集各將領，令港中除艦十艘，撞撞突面，或能逃出敵艦。各將領又反抗命

令，自動散會，借使弁兵持刀毀廢汝昌。汝昌勸慰羣徒，服藥自殺。丁汝昌統帶海軍，任命羅致，當然應負重要責任，俱黃海大戰，受傷不退，取海軍國，寧死不降，在當時將帥中還算是難能可貴的人物。

十八日，儒夫們會議投降，瑞乃前提議選丁提督前令，沉船燬台，再議降事，儒夫們不許。浩威起草降書，請求「不傷中西水陸官弁兵民人之命，託丁汝昌名義，撥出殘餘艦隊十一艘，劉公島砲台及軍資器械，投降日海軍。

李鴻章經營十六年的北洋海軍，可恥地燬滅了。他自稱創辦海軍是第二等「自強之道」，原來這是這樣的一種「自強」。

牛莊，營口，田莊台潰敗（二十一年二月）

平壤、九龍城戰敗，淮軍名聲掃地。清政府起用湘軍舊將，令魏光燾、陳澧、李光久等募湘勇援遼。十二月，任命湘軍首領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湖南巡撫吳大澂、淮軍總統宋慶為副帥。山海關內外駐湘軍、楚軍、皖軍、淮軍、豫軍、滿軍共百餘營六萬餘人。其中劉坤一所部號稱八十餘營。開戰以來，這是最大的一次出兵，也是清政府主戰派的最後一試，久受淮軍欺壓的湘軍又被重視了。

日軍踞海城縣，目的在佔牛莊、營口。宋慶所部五十餘營三萬人守營口。吳大澂所部魏光燾、李光久等軍守牛莊，大部湘軍進取海城。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海城日軍出戰，湘軍依克唐阿敗逃，湘軍退回牛莊。初八日，日軍分三路攻牛莊，將士請李光久出陣迎戰，光久正吸鴉片煙，不發命令，日軍已衝入市內，魏光燾、李光久棄軍竄走。湘軍十一營被圍，糧民房苦鬥，死傷三千餘人，牛家後鑿兵突圍出。軍庫有毛瑟槍一千五百餘支，槍彈一百五十一萬顆，大小砲十九尊，火藥一千六

百箱，馬匹次相無數，悉被日軍擄去。吳大澂駐田莊台，當夜出奔。田莊台是營口後路，東征軍糧台所在地，宋興霖營口，當夜率全軍同守田莊台。十一日，日軍入營口，獲得大砲四十五尊，兵船一艘，小火輪兩艘。十三日，日軍踏冰渡遼河，守河兵大潰。田莊台守兵不糾敵軍迅速到來，一時不及逃，被虜二千餘人。百餘營大軍，六天內連失牛莊、營口、田莊台，這一潰敗的結果，剝奪了主戰派降的希望，同時也掩飾了主和派求降的理由。

第三節 和戰兩派的爭權及主和派的得勢

中日戰爭與清政府帝后黨爭有密切關係。帝黨主戰，要在戰爭中削弱后黨，后黨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實力。兩黨借和戰爭奪權利，隨着軍事的慘敗，后黨在政爭上反取得勝利。

主戰派——
帝黨（光緒帝、翁同龢、張蔭桓）

西太后立光緒帝，原用作政治傀儡。光緒十二年，光緒帝年十六歲，習慣上稱為「成人」了，西太后不便繼續「聽政」（太后稱裁），宣稱明年正月「歸政於帝」。亦選爲首的王公大臣懇請「訓政」，所爲「訓政」是「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實際仍是「聽政」。西太后算是俯順「天下公論」，允許「訓政」。十五年，光緒帝年十九歲，西太后覺得「訓政」也不便了，宣告「撤廢歸政」，令光緒帝「親政」，實際仍握干涉政令任免大臣、擬

「親政」與「訓政」不同處，止在皇帝先看奏摺，看後再請太后懿旨。

光緒帝是滿洲皇族中較有頭腦的青年皇帝，學習漢文洋文，頗想有所作爲。他最親信的漢文師傅翁同龢是「尊王攘夷」論的舊式學者，任戶部尚書，參與軍機及各部事務，在政府有相當地位。李鴻章實力最大，自成北洋系統，致翁同龢所深惡。光緒十六年，戶部禁止南北洋購

買外國軍火，翁李不和開始趨向化。此後朝鮮交涉，翁主張硬，李主張讓。翁主自力拒日，李主借外力，雙方成見愈深。甲午年，張蔭桓翁同龢贊識，考中狀元。張嘗著有「朝鮮善後六策」，恨李鴻章不用他的計策，斥為「主和誤國」。張嘗的主戰論，影響翁同龢，同龢又影響光緒帝。

主戰派本身缺乏實力，利用皇帝上諭和士大夫清談，督促李鴻章出戰。又令維新派徐君實代丁汝昌（被李鴻章拒絕），令湘系軍閥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責李鴻章，「拔去三眼花翎，擢去黃馬褂」。這都是主戰派排斥政敵收回兵權的計劃。至於如何戰勝日本，他們並無辦法（如翁同龢），其他所謂辦法，也止有一個「聯英伐倭」（如志銳、張之洞），並不比李鴻章「聯俄拒日」好一些。李鴻章感到地位危險，對日本求和愈急，對西太后關係也愈密切。

主和派

后黨（西太后、李鴻章

西太后把持政權，當然引起光緒帝及帝黨的不平。甲午年正值她六十歲（十月十日生辰），從正月起，擬派軍經費大修頤和園，準備舉行萬壽盛典，廣收貢獻。朝鮮事支控李鴻章的主張，但求從速和解了事，免得就讓做壽。七月，中日戰事緊急，戶部請「停工」，暗指修建頤和園事。西太后發怒，翁同龢奏稱「查停工一條，指以後尋常工作，其業經興辦之工，毋庸停止」，主戰派屈服了。光緒帝示意親近的朝臣，多上主戰條陳，企圖借清議壓迫西太后。

於是南書房，上書房（宮內書塾）兩處人員每日輪流上奏摺，主戰論盛極一時。奏摺多請翁同龢點景移作軍費。所謂點景，是城內大柵及西郊郊頤和園，沿路築彩亭彩棚，種花、奏樂、演劇，每五步一座。這種駭人的浪費，主戰派要求停辦，完全合理，她更大怒了，對朝臣們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這就是說，決心對光緒帝報復。

李鴻章主和是要保全北洋地盤。所謂練海陸軍自強，他對伊藤說了真話：「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

六月十八日，英公使德爾芬，連命各國領事帶十餘個軍快，往登州，與俄使同候外軍，實其重兵隨時待命，恐俄東方商務，與英大有關係，勒令撤兵，再議善後，英使必遷，此好機會勿任俄軍先取。他相利用「英俄相忌」，引英國首先干涉，替英國計劃出兵的方法和理由那些具體，就建議大做夢，他自信此計大妙，一面「罵人密告德使」，一面請總署「商禮歐（英公使德爾芬）」。二十九日，總署復電說「英派兵艦赴後之說，既似不以爲可，未電本國」。李鴻章做了一天好夢，被這個電文驚破。

俄使——六月二十日，喀使（俄公使喀希尼）遣巴參賀面言接章貝（俄陸軍公使）電，稱倭兵在漢城，使館不安，已電請國家（俄政府）派兵護送。喀使亦電本國酌辦。鴻詢俄水師提督現有船幾隻。巴云，有大兵船十隻，調往仁川甚便，鴻謂貴國如派船，我海軍提督亦可派往會辦。巴云，甚好。李鴻章得到這個口頭援救，認爲「俄俄真動公憤，未必收漁人之利」，請總署共同努力，促成交涉。清政府主戰派主張聯英，二十一日，覆電：「謂非欲收漁利」，其誰信之……不可倚以爲助，致事後別生枝節」。這是翁李意見的衝突，背後隱伏英俄兩個侵略國。

合求英俄——英俄都不肯放棄對清政府的領導權，商定「同出調處」。英國又約德、法、義三國同辦，「合五國加力責之（日本），俾從公論」。六月二十四日，李鴻章遵照俄喀使通知，電總署「隊在京，請著議，略在津，與約議」，隱隱是中日各退兵五百里。這一天正是英輪高禮號擊沉的後一天，又是日軍進攻，清兵在牙山潰散的一天，英俄借修兵爲名，在北京、天津參加帝后黨爭，加強自己的地位。

李鴻章在求俄求英外還向其他侵略者求救。

求法——六月初三日，法外部表示「法願願調停，但中國應備有備戰之勢」。李鴻章得信，急電

皆法國「如何講停法，願隨其詳」。法答稱「出於睦誼，法亦出公論，當隨英機後」。

求德——李鴻章電駐德公使，向德外部說「德在東方商務有關，似未便坐視，望力勸德撤兵。否則開釁，恐擾大局。」

求美——李鴻章明知「美暗結日本」，但仍希望萬一。六月初十日，電駐美公使請美外部「會各國使勿動，共保和局，否則勢將決裂」。美外部答稱「當電駐使力勸共保和局，但美不願會同英俄各國，恐各國別懷意見，於事無益」。

李鴻章全力貫注在求外國干涉，葉志超、袁世凱連電求援，他總說「已付各國公論」，英法現已「出場」，嚴令葉志超「堅貞勿怯」，「靜守勿動」，實行不抵抗主義，希望博得「公論」的同情。

第二期——

依美國為主
的求和活動

（威海衛失
陷以前）

沙俄對朝鮮抱大野心，牙山戰後，喀希尼與李鴻章秘密商定中俄共同保護朝鮮。八月，平壤、大東溝海陸軍戰敗，西太后決定聯俄，借俄力講和。派翁同龢到天津密議。翁同龢是主戰派首領，奏稱「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西太后定要主戰派參加聯俄，仍令前往天津。李鴻章對同龢保證「俄必不占東三省」。同龢回京覆命，聲明「略事恐不足恃，以後由北洋奏辦，臣不與聞」。帝后兩黨意見依然對立。同時英使歐格納也活動和議，主張「由各國共同保護朝鮮，中國賠日本以兵費」。翁同龢反對賠款，李鴻章藉重聯俄，西太后但求了事，當時主戰派尚佔優勢，和議停頓。

日本方面海戰連捷，企圖攻陷北京，一舉實現大陸政策。一同統植日本的美國，「鑑於歐洲強國之形勢，甚為危險」（塞塞錄），就是說，日本甚為危險。十月朔九日，美政府通知日政府說「戰鬥已久，若無限制日本軍海陸進攻之法，則與東方局有利害關係之歐洲強國，難免對日本將來之安圖

幸願，爲不利之要求，以促戰爭之結局。美國提議日本前途的危險，又替日本指出獲利的方法，說「美國大總統從來對日本懷深篤之好意，若爲東方和平，當於不損中日兩國名譽之範圍內，盡力仲裁」。日政府當然「深爲感謝」，照陸奧宗光自述，「予私語美公使謂恩云：日本政府現在公然煩美國政府爲中日兩國間之仲裁者，或不免其他第三國干涉，故不能不避脫此事，異日若由中國開講和之端緒時，美國從中交換彼我之意見，則我政府當深依賴美政府厚誼。譚恩十分了解予（陸奧）意，並約將此意報告本國政府」。美國與日本暗中結成諒解，表面裝成「公正人」，向清政府提出「友誼」的調停。

主戰派反對聯俄，主和派反對聯英，恰恰給「決不干涉他國利害之美國」一個最好的機會。日本又表示「欲中國自與商辦，而不願西人干涉」，拒絕英俄插手。美國採取「不干涉」態度，僅僅替中日傳達意見，勸兩國派員直接會議。主和派在九連城敗後，求和更急，不得不信賴這個唯一的「公正人」。

十月二十五日，駐北京英使田貝電譚恩說「中國將直接開講和談判之事，委託本使，講和條件爲承認朝鮮之獨立及賠償軍費二件，乞將此旨轉達日本外務大臣」。清政府認美國是「公正人」，很信賴地投入日美的圈套。

半殖民地政府，像小兒不敢離開保姆一樣，有所行動，必須依靠外國人。李鴻章說日本「志得氣盈，所徵黃帝」，中國官員一定「爲彼輕視」請外國人前往，是最好的辦法。十月下旬，清政府派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到日本，探問講和條件，日政府說德璀琳是「西人」，非中國大員，拒絕接見。當由關公正人的田貝「開此次德璀琳突然奉使命前往日本，頗感不快，特勸告總理衙門速召彼還」（葉塞德），德璀琳只好回來，因爲他是英國西人不愛美國西人。

清政府派通譯中國大員龔蔭桓充全權大臣，聘美國前任國務卿科士達助訂和約，科士達先到日本，二十一年正月，張蔭桓就到。日政府以口中國使臣「全權不足」，陸奧宗光向龔蔭桓朗讀「斷絕談判」的宣言。張蔭桓在日本受各種意外侮辱，最後被日本驅逐出境，退回中國。

日政府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公開指定李鴻章充全權大臣，理由是「彼此談判之結果，恐爲空文，必須實力實行」。日政府侮辱張蔭桓，目的在逼迫李鴻章出面，如饒如渴地要求投降的清政府，立即派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往日本商訂和約。

當時威海衛陷落了，主戰派最後一試的吳大澂湘軍在山海關外潰散了，在「都城之危即在指顧」的情勢下，清政府盼望日本開示條件。日政府通過美使田貝開示賠償兵費、朝鮮自主、割讓土地三條，清政府以「宗社爲重，邊徼爲輕」作理由，授權李鴻章全權辦理。二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帶同科士達到馬關，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開始談判。

主戰派多數是空談「急王援夷」的學生，少數所謂有辦法的，如志銳（光緒帝親信）奏請「備英俄援，以二三千萬兩贖之」，張之洞主張「借英款一千五百萬，購鐵甲三四艘，雇明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襲日本之後，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容闕西學東漸記），完全是夢中囈語。主和派準備接受一切賣國條件，換取萬惡的「宗社」苟延殘命，比主戰派惡劣更甚。兩派主張不同，其辱爲禍國殃民則一，中國人民被這一羣國賊統治着，當然免不了馬關條約的嚴重災禍。

第四節 馬關條約的締結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日本戰勝海軍的滿清，氣焰高張，軍閥、財閥、政客各提自己所需要的條件，遂將條約如下約記

海軍部——對取台灣全島。

陸軍部——遼東半島撫朝鮮之背，扼北京之咽喉，國家將來大計上，決不可不歸我國有。

財政部——索賠款十萬萬兩。

各政黨中有所謂「對外硬派」，主張割遼寧省及台灣，賠款至少須二萬萬元以上，有所謂「改進」及「革新」兩派，主張「日本不可不有瓜分四百餘州（中國）之覺悟。此時須以山東、江蘇、福建、廣東四省爲日本領土」。又有所謂「自由黨」，主張「割讓吉林、盛京、黑龍江三省及台灣。中日兩國之通商條約，須訂變認歐洲各國之條件」。

日政府綜合這些食慾，製成以「朝鮮獨立、割讓土地、賠償軍費及將來帝國臣民在中國通商航海之便宜條件爲主眼」（伊藤博文）的十條媾和條約，專等李鴻章來簽字。李鴻章雖然竭力辯論，甚至作無恥的哀求，都是枉費口舌，毫無效果。談判舉行五次，日本始終恃強逼勒，不准不簽字。

伊藤：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李：難道不准分辯？

伊藤：只管辯論，但不能再減少。

這就是五次談判的總精神。三月二十三日（公曆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終於簽協馬關條約。主要內容如下：（一）朝鮮完全自主；（二）割讓奉天省南邊地方（遼東半島）；（三）割讓台灣全島；（四）割讓澎湖列島；（五）賠償軍費銀二萬萬兩；（六）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定進口稅；（七）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漢奸），不得遺爲逮捕。

頂是南京條約以來題一新時代的賣國條約，中國殖民地化的程度從此更深入一大步。過去轉讓香港、九龍及臺灣國，還說是「偏遠地區」（李鴻章稱謂「蕞爾」），現在渤海及大塊設省地區了。過去外國不得在中國設立工廠，現在可以在中國製造，免納海關進口稅了。各國與滿清締約，都享有「利益均霑」的特權，馬關條約開了端，接着就是割地狂潮和投資競爭，中國瓜分的危機更加迫切了。

李鴻章也感到馬關條約的嚴重，回到天津，稱病不出，派科士達到總理衙門，敘述「李相之忠」，勸從速批准和約。和約當然批准，李鴻章給科士達酬勞金十五萬元。

第五節 台灣的兩權抵抗——官紳

的虛聲抵抗與人民的英勇抵抗

（二十一年五月至九月）

中法戰爭後，台灣改設行省。全省分台北、台中、台南三部。巡撫駐紮地台北府（淡水）為全台灣精華所在，經營鐵路（基隆至淡水），商輪、屯墾、開礦，每年收入三百數十萬兩。台中窮苦，台南不會開發，窮苦更甚。台灣居民番族佔十分之六，住內地，與漢族為仇。漢族多閩粵兩省人，住沿海城市，經常發生械鬥（主要由於官紳挑撥，從中取利）。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帶來淮軍四十餘營，被後任巡撫非淮系的邵友濂裁撤半數。失業游勇流為盜賊，與在營兵丁結成哥老會，保持淮系勢力。台灣孤懸海外，大小官吏從內地來，貪腐枉法，黑暗無比。這樣，番與漢，閩與粵，官與民，兵與官都充滿着不和，造成不和的總原因是官吏的殘暴和貪污。

光緒二十年十月，邵友濂擅自革改台灣，驅動清政府調任為湖南巡撫，後任是「剛復自用，自誤

爲是，與倭國勳凱凱圖（清政府上諭）的唐景崧。二十一年正月，唐景崧派同鄉軍官帶銀二十萬兩，回廣東招募盜匪，作爲親信軍隊。這種橫勇毫無紀律，欺侮其他軍隊，互相鬥毆。景崧自率廣勇守台北，令紳士林朝棟守台中，總兵劉永福守台南。林朝棟所部台灣土勇十營，中法戰爭時擊敗法軍，號稱善戰。劉永福黑旗軍從廣東調來（二十年七月），所部僅兩營，到台灣後擴充成八營。林朝棟是著名戰將，被唐景崧猜忌，命令他們離開富庶的台北。

三月，台北府准軍兵變，唐景崧令叛兵首領充當官，軍心愈益離散。

馬關條約簽字前，台灣紳民探知割台勢不可免，紳士邱逢甲創議建立民主國，開議院，製地黃虎國旗，用台灣國名義抵抗，免得清政府爲難。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決定限期交割，上諭「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隨覓。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員，並著唐景崧飭令陸續內渡」。一個政府當它把持統治權的時候，用各種方法教人民相信官民一體，官是人民的保護者，反對貪官污吏就是亂民。等到出賣領土人民的時候，它把「大小文武各員」撤退，什麼不顧了。人民不願做亡國奴，設法保護自己，又被看成亂民，說「台灣民如此兇橫」（李鴻章給李經方電），請「日本遣派水陸各軍，以資彈壓，保守平安」（李鴻章致伊藤電）。這不是極明顯地指出官與民是對立的兩體，如果真是一體的話，爲什麼要官不要民，還請日本派兵彈壓呢？當時邱逢甲爲首的一羣紳士，不是依靠民衆的實力，而是對滿清幻想「我皇上何忍棄之」，對外國幻想「各國仗義公斷」，對唐景崧幻想「誓死守禦」。五月二日，邱逢甲百餘人以台民名義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爲總統，燭護「台民佈告」說「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集萬業棄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這和愛國詞句，似乎代表台民的意志，但他們的行動，遠不能代表台民。他們行兩跪六叩首禮拜見總統，送上「台灣民主國總統之印」以後，一切依樣葫蘆，所謂民主國總統和議紳（譯員），實際上仍

是滿清的巡撫和紳士。

唐景崧逃往後，出了一個告示說：「民間有假立名號，聚眾滋事，備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同時給總理衙門電報說：「惟臣先行，民漸不容，各官亦無一保全。只可臣暫留此，先令各官陸續內渡。臣當相機自處（逃定）。他嚴禁民間聚眾，顯然爲保全各逃官，這種逃官，無一不是該殺的匪類。還聞台灣民衆的歡迎，命令官員兵丁急速內渡，五月初四以前，台北官員幾乎全部逃走。三月間，他會同唐景崧四十萬兩前往上海，後來又應劉訂聯大批軍火，這些銀兩都是一去不知下落，他自己的妻子行李早已逃走，上得『相機自處』，何曾想到保護台灣的土地和人民。

唐景崧逃往時，壽庫還存銀四十餘萬兩，火藥庫存火藥四萬餘磅，毛瑟槍彈二百八十餘萬顆，各炮台有炮彈數千個，他一手把持，不分給林朝棟、劉永福。五月十日，滿清對台特派大臣李經方帶同科士達，乘坐日艦到基隆，會見日本台灣總督，出具勸讓『清單』一紙，內開『台灣全島，澎湖全島之各海口，並各府廳縣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台灣澎湖兩島人民就在這裏賣身契下當亡國奴了。日軍登陸攻陷基隆，虜虜潰亂。十二日，唐景崧逃回廈門，邱逢甲、林朝棟相繼內渡。淡水城中敵勇游歷挨戶劫掠，番庫存銀二十四萬兩，匪勇奪銀互殺四百餘人。日軍不知虛實，不敢前進，得外國商人通知，十五日，派兵八十名進城，台北陷落。

台北淪陷，全省富源被日本佔有，林朝棟逃走，台中空虛，潰兵土匪大亂。台南勢成孤立，很難堅守。紳民請劉永福任軍統，總兵楊泗洪任分統，統率各軍統領十八人及義民各軍。劉永福登台立誓死守，誓書中說：『自問年將六十，萬死不辭。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貴相投；惟誓同仇，援助豈容稍異』。他把黑旗軍放到最危急的戰場上來團結不同系派不同地區的各軍，與日本海陸軍作戰四個月，主要是靠團結的力量。

閏五月初三日，日艦兩艘襲安平口，劉永福避炮轟擊，日艦逃走，台南與日軍戰爭開始。黑旗軍會同防務各軍日接巡防各海口，日軍每次登陸，都被守軍殲滅，戰爭限在台中陸路上，這是支持較久的重要原因。中旬，日軍攻陷新竹縣。新竹是台中入口處，林朝棟走後，劉勳王永楊等率新臺軍會同吳湯與所率新竹義民軍把守，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相持一月餘，日軍購買漢奸從僻路抄襲，楊紫雲戰死。吳彭年率黑旗軍趕援不及，退守大甲溪。六月中旬，黑旗軍聯合徐慶所率義民軍進攻新竹，斬獲頗夥。日海軍接連登陸，牽制劉永福兵力，使不得專顧大甲溪。七月初，吳彭年、徐慶大敗日軍及漢奸軍，吳徐軍乘勝追擊敵，殺敵七百人。後路新臺軍大營忽被漢奸襲擊，統領李惟義逃遁，大營失陷。前敵各軍聞警潰退，營官袁錦清死守大甲溪，掩護各軍。清率黑旗健兵五十餘人衝敵砲兵陣地，全部戰死。劉永福令忠滿（滿洲人）率忠滿軍四營往援，忠滿軍意不進，大甲溪被日軍佔領。

大甲溪失守，劉永福令各軍擇彰化（台中府）境內大溪扼守。七月初五日，徐慶率義軍三百人誘日兵深入，繞軍李邦瑞、鎮海軍營官李仕高正而接應，新臺軍營官陳尚志、義軍吳湯與、沈仲安由後路左右包抄，大破日軍。抗日軍進攻大甲溪，敵砲火猛烈，死傷甚重。初七日，又大破日軍，敵敵逃入深山，吳彭年率隊窮追，經「掃蕩此虜，不食鹽類」。敵敵得漢奸土匪引導，竄向八卦山。八卦山在台中府城外之山，失城不能保，永福急令彭年退守八卦山。彭年命吳湯與義軍爲前隊，陳尚志率營軍爲後隊，李仕高鎮海軍爲左隊，林鴻貴黑旗軍爲右隊，彭年守陣。初八日大戰八小時，抗日軍死千餘人，初九日，敵軍大隊放槍快砲進攻，湯與中砲死。鴻貴率七星隊（黑旗軍中衛隊）百餘人衝入敵陣，擊湯與屍體，又中砲死。軍隊潰亂。彭年立山頂，率七星隊三百餘人死守，敵大隊集中轟擊，敵砲擊及七星隊全軍殉難。漢奸開城門迎敵，李仕高、沈仲安、楊春發巷戰半日，又全部殉難，台中

淪陷落。

這一期戰爭，歷時兩月餘，台中失守，戰爭是失敗了。敵人海陸步馬總全力進攻，抗日義民軍止有拾餘土槍，正式軍隊也只有少數毛瑟槍，雙方器械相差太遠。台灣境內游勇潰兵土匪特別多，被日本收買充漢奸，他們熟悉地勢，比正面敵軍更難防禦。軍隊派系複雜，行動不能一致，能戰的部隊太少。不過這些都還不是抗日軍的致命傷。強迫抗日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李鴻章的對台封鎖。台南現銀極少，劉永福設官銀票局，發行一元至五元鈔票，因地方貧瘠，鈔額有限，不能供軍餉。發行官信票（郵票），得洋銀五千元，仍無補於事。他曾派人回廈門，電求沿海各省督撫助餉，又向各地愛國人士籌款。李鴻章及清政府嚴令官民「不得絲毫接濟台南」，籌款員都空手回來。開戰兩個月以上，前敵各軍迫切請求補助餉械，軍械庫僅有毛瑟槍數十枝，其餘土槍土藥，都毀爛不中用，永福憂愁無法，搜括得銀八千兩解前敵，路上又被日寇陸兵、漢奸、土匪搶去。永福再派文家羅綺章渡廈門，電求沿海督撫救台民，語極哀痛，仍毫無所得。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極度殘忍冷酷，這也是許多實例中的一個，值得作為不可忘的教訓。台南軍民處在這種嚴酷封鎖的環境裏不屈不撓地戰鬥着，雖然失陷了台中，英勇的戰績是不可磨滅的。

七月初十日，日軍進陷雲林、苗栗兩縣。十一日，進佔大莆林。十二日，向嘉義縣侵進。正當彰化失守的時候，劉永福趕上前線籌劃防務，令王德標率七星營守嘉義城，楊泗洪率鎮海軍、武毅右軍、吉林砲隊任野戰。又招得著名匪首黃榮邦（原名丑）、林義成（原名苗生）、簡成功、簡精華（原名大肚）等部助戰。這些匪首先受日寇誘惑，準備降敵當漢奸，但是他們到底是中國人，在劉永福及義民軍感化下，都改名表示抗敵決心，而且都成了抗敵英雄。李鴻章的封鎖，必然產生賣國求榮的各式漢奸，台灣人民的路綫，可以挽救漢奸變成愛國英雄，黃榮邦等名留青史，證明人民路綫的偉大。

十一日，楊泗洪率所部軍夜圍攻大菁林，備精銳，林廷成等密請軍數千助戰，日軍敗走。泗洪追擊，發敵砲炸死，發官榮乃昌奮戰不退，日軍砲彈如雨，精華從側面猛擊，日軍大潰。乃昌受重傷，裹創血戰，揮軍追殺，遙見火光燭天，聲動山谷，探知林義成，黃榮邦義軍潰敵逃路，一時軍心大振，前後夾攻，殺敵數百人，收復大菁林。乃昌傷重死。永福令蕭三發統黑旗軍代楊泗洪指揮前敵各軍，令簡成功總統義民軍。日寇陸路戰敗，急派兵艦十餘艘攻台南各海口，砲擊日夜不停，漢奸土匪蠢動響應，永福對台南佈置海防，又推行聯莊法，檢舉匪類，地方逐漸安靖。

十三日，王德標率七星隊及黃榮邦義軍二千五百人林義成義軍三千人簡精華義軍數千人進攻雲林縣，日軍戰敗棄城逃走。德標收復縣城，會同義軍追殺，簡精華軍從小路抄襲，殺日軍成兩部，一部亂軍入山，被林義成軍包圍，全數殲滅。十四日，進攻苗栗縣，殺敵兵二百餘人，克復林栗兩縣。十五日，蕭三發督各軍前進，日軍大敗，逃入彰化城。十六日，各軍圍攻彰化，敵憑藉砲火防禦，不敢出戰。當時聯莊法推行到台中，台北鄉民秘密組織聯莊，等大軍到來起兵作內應。台灣全局大有希望，但危機也同時加增，無法克服。

台南餉械早已竭蹶，劉永福再三派人回內地籌餉，這些籌餉員到處受官紳侮辱，回台後不免怨忿，宣告「接濟決望」。因此人心動搖，譚紳營弁紛紛逃匿，不可阻止。二十四日，蕭三發請求補充餉械，永福括得銀二千兩解前敵應急，外國洋行指使大小商人到官銀票局兌現銀，市面大擾，永福不得已派文案吳朝林內渡求接濟，依然毫無所得，日海軍爲解救彰化被圍寇兵，砲擊台南，企圖登陸，永福籌餉難防，困苦萬狀。二十五日，義軍海戰連捷，殺敵大小軍官十三人。二十九日，三發奪敵大砲一尊，生擒敵兵四人，斬首數十級，八月初二日，前敵請發餉械，語極悲痛。永福括得銀一千五百兩，給前敵補充軍食。初三日，商人持銀票索現銀更急，政局中不走，市上拒用銀票，交易停止，流日

單在李鴻章、外國銀行、奸商壓迫下不能支持了。

這一期將近一個月，軍事上是膠着的，但李鴻章的封鎖和外國洋行大小奸商的破壞，逼得抗日軍必須失敗。

前敵圍城軍數千人連日饑餓，蕭三發與簡精華等商議「相持非久計，不如併力前進，奪回彰化，或可駐足」。這種悲慘的決議，他們知道走上必死的道路了，作戰非常勇敢。徐慶率精壯番民七百餘人充先鋒，八月初五日，至軍進攻，敵大放槍砲，不能攻克。初六日，黃榮邦猛攻砲台，中砲死。初七日，林義成攻砲台，又受重傷。十三日，敵軍反攻，三發率各軍力戰，三發受重傷，徐慶、簡精華奮死擊退敵軍。各軍死傷慘重，饑食鹽胡，哀求永福設法救濟。永福無策搜括，長嘆道：「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到底籌不出一支錢，只好在餓死前途緩戰。十九日，敵軍又反攻，簡精華、林義成應戰，被圍重重，夜間還不能突圍，徐慶率死隊衝入，三更才破圍歸營，精華、義成、徐慶都受了重傷，戰士死傷無數，二十日，又大戰，各軍戰死，死二千餘人。二十二日，徐慶率隊衝鋒，各軍總進奮戰，敵軍退却，不幸徐慶中砲死，敵兵反擊，各軍潰散，雲林、苗栗兩縣又陷。

陸路正在台中苦戰，敵海軍攻台中，劉永福駐安平砲台抵禦。十七日夜間，敵艦分五路砲擊，永福巡視各砲台督戰。二十三日，陸路敵砲隊攻嘉義縣，王德標假敵，乘營退入縣城。敵踞營房，夜半地雷爆發，殺敵七百餘人。德標出擊，敵營被潛路伏兵殺死無數。二十四日，敵軍大舉攻破縣城，七星營、義民軍巷戰，將士死傷極重。王德標、簡精華率殘軍逃入大山。嘉義縣陷落，台南危急不可守。

廿五日，敵艦攻嘉義砲台，永福千成良登台拒守，漢奸引敵兵繞遠小路登岸，突破大營，又通擊砲台。守台兵圍守兩日，饑餓不能起立，砲台失陷，成良領出得不死。二十六日，敵軍攻鳳山縣

；義民軍戰敗，敵屠鳳山城，又進犯台南府城。永福駐安平砲台，策應守城軍。各軍餉械不能贖，二十九日，敵攻砲台，永福親自發砲，殺敵數十人。九月初一日，城中絕食，守軍潰散。初二日，敵軍攻砲台，永福登德國商船退回內地。

這是台灣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史。唐景崧反築台北，李鴻章封鎖台南，失敗早已決定了，劉永福爲首的抗日軍，在絕望中戰鬥到最後一寸土地，這種堅強的精神，又決定了勝利終究會回來。現在台灣歸還祖國了，李鴻章，唐景崧的繼承者儼然又統治着台灣，無疑的，台灣義民軍的子孫們決不會忘記五十年前被出賣當亡國奴的悲慘教訓。

第六節 三國干涉下滿清贖還遼東半島及大借外債

(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英俄兩大侵略勢力，爭奪對滿清政府的領導權，是相持不下的。李鴻章請求列強干涉中日戰爭，因「英俄相忌」，在戰爭停止前不能實現。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下旬，清政府決定割讓土地，令李鴻章渡日講和。俄國決不願日本佔朝鮮、遼東，英國也不願日本在大陸上獲得領土，在這一點上英俄利害暫時一致，因此，英採取局外中立態度，俄得進行對日干涉政策。

俄法同盟，德法世仇，法助俄對日行動是自然的，德企圖離開俄法間親密關係，又謀在遼東獲得一個軍港，因而也參加行動，俄法德三國結成了團體，但並不堅固。

俄政府對德法，積極組織共同行動，對日本，竭力隱蔽自己的真意圖，日政府極不安心，屢電駐俄公使密探情況，毫無所得，反預計「俄以大概當不以兵力干涉」。美國國務卿秘密通知駐美日公使，急電日政府說「俄國希望佔領中國北部及滿洲，當反對日本佔領該地方及爲朝鮮之保護者，三萬俄

兵，已屯駐中國之北部，有漸次增加之形勢』（空室錄）。三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字前七天）李鴻章密電總理衙門，還在探問「未知俄廷意見如何」，日本却在三月二十八日（李鴻章到馬關後六天）知道俄國的佈置，美國自居公正人地位，又保護科士達當訂約顧問，消息通知一方面，未免太「公正」了。同日，李鴻章被兇手組擊受傷，日政府異常狼狽，紛紛表示慰問，這當然由於李鴻章有力量費國，是日本的理想人物，死去對日本大不利，更主要的原因是「若某強國（指俄國）欲乘此機會干涉，彼固以李之受傷為最好之口實」（空室錄），日政府怕干涉行動突然出現，一面聲明「暫時休戰」。（空室錄）李鴻章半尚有綽帶，以綽帶外之一限表示十分誠懇之意，感謝我皇上仁慈聖旨」（一）而請李鴻章在病牀上開始談判，用惡毒手段逼李鴻章簽字。三國干涉快變發作，日本從英國方面獲得消息，向李鴻章提兩次衰的美救書，限三天內承認全部條件，否則派兵攻高進攻北京。清政府、李鴻章「欲保京城，不得不爾」，科士達也從旁催促，日本在美英暗助下，達到預期的目的。

日本爭得先著，三國落後了。沙俄大受衝動，馬關條約簽字後六天（公曆四月二十三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俄德法駐日公使，同時向日外部「勸告日本政府，應放棄對遼東半島」。日政府異常恐慌，軍事方面「國內海陸軍備，殆已空虛，而去年來繼續長期開戰之我（日本）軍隊人員軍需，固已皆告疲勞缺乏，即軍用俄國艦隊抗戰，亦甚無把握」（空室錄）。外交方面向英國求援，英國表示保守中立，向美國求援，美國答稱「願與日本協力，而維持條約的批准之件，已對調駐北京美國公使勸告中國從速實行」，援助並不強有力。日本被迫不得不對三國屈服。內閣決定「對於俄德法三國雖全然讓步，對於中國一步不讓」的方针，四月十六日，日皇宣告「容納友邦（三國）之忠言」，表示全然讓步，又說「關於交還半島讓地之一切措置，朕特命政府與清政府商訂」表示一步不讓。

日本原想變相的佔有遼東，方法是口頭上「放棄永遠佔有遼東半島，雖作償金之担保，一時佔領

該半島，而大增加金額，使中國去久不能「清」。向該政府提償借項要求，按該政府完全拒絕。中國政府又向三國提出「交還遼東半島之賠款款項定爲五千萬兩」，三國決意三千萬兩，借款後三個月內實行撤兵，並不許再有其他要求。九月初二日，日本正式承認三國宣言。償還問題算是解決了，問題轉化爲國際間借債的競爭。

中日戰爭中，清政府借外債約四千萬兩。戰後驟增賠款二萬萬兩，總達款三千萬兩。第一次（每六個月一次）就要交出八千萬兩，第二次五千萬兩，餘款三年內付清。清政府每年收入止八千萬兩，決無償付能力，除了大借外債再不能有任何辦法。過去借外債，多由總稅務司英人赫德主持，以海關稅收作担保，期限短，利息重（至少八厘），是英國在華銀行一宗好買賣。這次清政府急需巨款，赫德建議大借外債，俄國要奪取英俄的經濟利益，同時排斥法德兩國，秘密通知願單獨借銀一萬萬兩。法德當然力爭，清政府不敢開罪法德，謀分別商借，俄國不許。最後俄法合借一萬萬兩，年息四釐，三十六年還清，以海關爲担保。英國喪失大利，又怕俄法干涉海關，德國被俄法排擠，極爲憤恨，英德兩國合作，向清政府抗議。美國也想分潤利益，法國還想繼續出借，俄國主張列強共同借款，鬧得總理衙門像個大拍賣場，翁同龢日記敘述英法公使徐爭的情形，說英公使「咆哮恣肆，爲借款也，此等惡趣，我何以堪」。說法公使「無恥無益，而日在大羊虎豹叢中」。到底英德成功，合借銀一萬萬兩，年息五釐，三十六年還清，以海關爲担保，三十六年內，不得改變海關行政。這就是說，英國把持海關行政，不許別國插足。

清政府借到銀二萬萬兩，除兩次付賠款一萬三千萬兩，償清賠款餘數，還短銀六七千萬兩，經手人的回扣、佣金、官吏的貪污多至三四千萬兩，何等殘酷的剝削，光緒二十三年，清政府準備再借一萬萬兩，引起各國第二次大爭論。

李鴻章親俄，主借俄款，張蔭桓（代表翁同龢等親英法大臣）主借英款，說「合肥聲名掃地，必無成」。俄國提出借款條件（一）俄國借款建築並管理滿洲及中國北部之鐵路；（二）現任英人海關總稅務司去職，改由俄人；（三）借款以海關稅收為担保，不足之數，以地稅、釐金為抵押。光緒二十四年，英國提出類似的借款條件，特加揚子江流域不割讓於他國及開放大連灣為商港兩條。後一條專對俄國示攻勢。俄公使警告李鴻章「大連灣臨口岸，俄與中國絕交」。清政府親英派藉口「英款利息低而期限長」，與英國商定章約。俄公使堅決反對，親到總理衙門提警告。翁同龢日記述俄公使語：「若中國不借俄而借英，伊國必開罪，致人為難之事」。俄使走後，英使又到。日記說「英使（奕訢）密納樂」語亦橫，大略謂中國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語詰俄。英何害於俄，而俄必阻止耶」。翁同龢埋怨李鴻章說「蓋合觀專以俄與英之語激動之。故致此咆哮也。嗟，殆矣」。若俄兩國爭殖民地，帝后兩宮依靠英俄爭政權，結身英俄和帝黨取得勝利。原因是甲午戰後，李鴻章喪失北洋地盤，實力大損，西太后名義上「歸政」，不便過度干涉光緒帝；三國目標還看功，勸索聯軍，惹起某些士大夫的反感。李鴻章提倡英俄各借一半，仍不能通過，后黨失敗了。借款由英國三豐、德國德華兩銀行出借，銀數一萬萬兩，八三折扣（照人的盤剝），年息四釐半，四十五年還清。主要條件是揚子江流域不得割讓於他國，借款以海關收入及一部分釐金、鹽稅為担保，四十五年內不得改變海關行政。

甲午戰爭的結果，在政治上，瓜分危迫在眼前，割地狂潮滋成瓜分的初步形勢。在財政上，滿清政府的基礎發生大動搖，不依靠外債就不能生存。總之，中國殖民地化比前更深入一層。

滿清政府借外債開始於同治四年，到光緒二十年（光緒十三年以後不借外債）凡三十年，共借債六次，總數約四千萬兩，總利息不過五千七百萬兩，除還本利有餘。政府每年收支相符，財政基礎相當穩定，會左李及後起的張之洞辦洋務，談「自強」，主要由於原有錢可派派發。

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凡五年，借貸七次，共銀三萬七千萬兩，除付日賠款本息二萬五千兩，其餘一萬二千萬兩，都消耗到折扣、佛金、利息、食污、軍費、政費上去。海關稅本是政府歲入的大宗，隨後抵押無餘，政費必須另尋財源，正如李鴻章所說『國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為深恥，如復橫征暴斂，貧民豈能相安』（李鴻章致日政府說帖）。滿清統治的危機非常顯著，因之尋求外國依靠更感到迫切。

第七節 大買辦李鴻章游歷歐美的賣國活動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至八月）

三國干涉，日本退還遼東，西太后、李鴻章親俄派自以為有『遠見』，一發反李的洋務派如劉坤一、張之洞也改變態度，主張對俄締結密約，結強按保護中國。劉坤一希望『稍予便宜，中俄邦交永固』，使『倭與各國有所顧忌』（二十一年閏五月奏）。張之洞希望更大，奏請『中國海軍練成不島，如有俄人之助，將來無論何國尋釁，數旬之後，可以立發兵艦數十艘，游行東方海面，則我得以專備陸路戰守之計，而敵人亦不能為深入內犯之謀』（六月奏）。照舊那樣想法，中國海面有俄人代守，滿清真可以高臥無憂了。劉張是有力的總督，這些謬論，對親俄派起了支持的作用。

沙俄替滿清索還遼東，當然要換取極大酬報。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俄皇尼古拉第二世舉行加冕典禮，各國都派專使往賀。光緒帝派非准系的外交官王之春為致賀專使，被俄政府拒絕，說是王之春『位望太輕，難於接待』，這就是說，非李鴻章親到不可。光緒帝改派李鴻章為正使，非准系的外交官邵友濂為副使，李鴻章藉口傷酒時發，步履蹣跚，不肯奉命。結果光緒帝讓步，授李鴻章為『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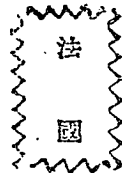
爾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賀加冕，又往英法德美四國聘國書，取消邵友濂王之春專使副使名額，讓李鴻章單獨辦事，李鴻章步履不軟弱了。

李鴻章帶着大批中外隨員，二月中旬，從上海出發。臨行前曾對黃遵憲說「聯絡內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英德等國爭奪這個大買辦，各派大員勸請他先游歐洲，後往俄國。俄皇決不放鬆，特派親王一入坐專船到蘇彝士運河迎接，把大買辦先搶到手，經最短路程送上彼得堡。三月下旬，開始外交談判，四月中旬，簽訂「中俄密約」，主要條款是（一）日本如侵佔中國或朝鮮土地，兩國派水陸各軍互相援助；（二）戰時俄國兵艦得駛入中國所有口岸；（三）中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達海參崴（中東鐵路），鐵道由華俄道勝銀行承辦經理。李鴻章非常滿意。五月初俄國游歷德、荷、比、法、英、美等國，各國政府竭力招待，但並無所得，李鴻章接辦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機構，也毫無所得。他以為中俄密約解決了一切問題，不必再留意外國富強的原因。八月，回到中國，對黃遵憲說「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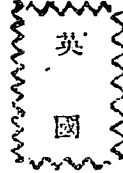
第八節 割地狂潮

（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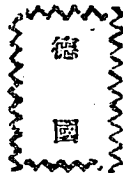
甲午戰爭前後，歐洲資本主義正在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對中國要求投資，設工廠、造鐵路，各國公使迭次商談，都被清政府拒絕，政治借款因缺乏機會，不能強迫清政府無故舉債。以馬關條約三國條約為契機，帝國主義要求一齊發作起來。投資必需劃分勢力圈，更必需先奪取根據地，以便進一步實行瓜分，與遠東同時，列強奪取根據地的競爭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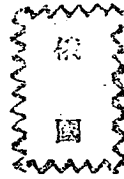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一年，法國自稱護法有功，提出割讓雲南名益島、烏得兩地，雲南歸歸通至龍州（廣西省）昆明（雲南省城），雲南兩廣開礦先向法國商辦等要求。法公使施阿爾態度兇悍，逼總領衙門承認。二十二年，法國要求全部成功。二十三年，迫清政府聲明不割讓海島及對岸陸地於他國。二十四年，藉口俄租旅順、大連，強租廣州灣為軍港，期限九十九年。法公使每次提出要求，先替清政府擬就承認文件，不准改動一字，翁同龢稱爲「鬼」，「犬」，以表示深惡痛絕。照施阿爾說，李鴻章親俄，認法是俄同盟，出力相助，因此交涉順利。



法國企圖割雲南，兩廣爲勢力圍，英國當然不甘，二十一年，提出割讓野人山全境，開放西江等要求。英公使態度也異常橫蠻，翁同龢說他「貪如狼，狠如羊，其利猶不下於旄賊」。二十三年，訂立條約，割讓野人山一部份，西江開放梧州等三口。雲南兩廣地區存在着英法勢力的對立。二十四年，強租威海衛爲軍港，與旅順，大連對抗，限期九十九年。又強租九龍半島（擴大租地），香港附近各島嶼、大鵬、深圳二灣，與廣州灣對抗，限期九十九年。



二十一年，德國要求設立天津，漢口兩處租界，作爲得遂的報酬。二十三年，藉口曹州教案，派軍艦強佔膠州灣。二十四年，清政府被迫訂立條約，承認（一）德國租膠州灣爲軍港，限期九十九年；（二）德國在山東建築鐵路兩條（膠濟路及津浦路濟南以北一段）；（三）鐵路附近三十里內開闢礦權。



二十三年，俄國藉口德佔膠州灣，派軍佔領旅順、大連灣。俄公使向李鴻章張蔭桓送軍餉，李五十萬盧布，張二十五萬盧布。二十四年，俄國換得極滿意之條約。清政府承認旅順、大連灣、大連灣商港，租期二十五年，東省鐵路進支路一條，通旅順、大連。俄財政部大臣說：「此為余對中國人辦交涉第一次行使賄賂手段」。

列強根據地確定了，「各海口盡被外人所佔，此即割裂也」（英公使督告總署語）。從各根據地出發，列強互認勢力範圍，長城以北屬俄，揚子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一部份屬英，福建屬日。又各爭奪鐵路建築權，英得二千八百哩，俄得一千五百三十哩，德得七百二十哩，比得六百五十哩，法得四百二十哩，美得三百哩。「逐塊瓜分大清帝國」（德皇威廉二世語）的形勢雖已經造成；但帝國主義者決不滿足於已有的勢力範圍，利害衝突益加劇，中國人民也決不允許瓜分的實現，普遍地，大羣地發生着自發的反帝鬥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就是瓜分運動的反應。

第七章 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

——戊戌變法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

第一節 緒言

李鴻章自稱「禦之時」的「洋務」經過甲午戰爭破產了，洋務派辦工業失敗，給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有機會反對官辦、官督商辦，要求自己的發展，在政治上產生改良主義的民權運動。

甲午戰爭，中國海陸軍遭受徹底的慘敗，外國侵略者不僅在言論上公開主張而且在行動上積極進行「瓜分大清帝國」，這刺激了一部份滿漢統治階級及染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要求聯合起來，抵禦外侮，在政治上產生改良主義的保種運動。

當時改良運動倡導者，如光緒帝、翁同龢、張謇、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雖然思想上各有不同，一般說，都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人物。他們希望中國也走一次「明治維新」的道路，但客觀條件絕對不能允許。因為帝國主義通過洋務派與頑固派結合，確立了強大的統治機構，任何改良和舉動礙了他們，必然予以嚴厲的打擊。戊戌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此，戊戌以後各種改良運動無不失敗。

變的緣因也在此。

第二節 甲午戰前改良思想的醞釀

洋務派舉辦新政，自稱求富強，實際是阻遏了民間資本主義的生長。中法戰爭前後，以上海、香港為中心，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已在倡導改良主義的「變法」。例如馮桂芬（林則徐的門生）著「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所謂富強之術是「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四端，首先要廢除八股，開學校學習西學，設船塢局製造洋器。實行的方法他看得極容易，說「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裏的資本家主要是從官僚、富商、豪紳、地主變遷過來，它本身缺乏獨立的實力，却和封建勢力尤其皇帝有不可分的關係，把希望寄託在上層當權者，這是改良主義的共同信仰，也是它失敗的共同原因。比馮桂芬更著名的干體（太平天國狀元），會遊歷英國，精通西洋科學，回國後充香港領事口報主筆，鼓吹變法。他贊美日本「國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中國急需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專制。更言「今日時勢之急」的是「首在乎收拾人心；國民之利而導之，顧民之志而消之」。他認為那些洋務派的新政，止「能為民福而不能為民利，能為民害而不能為民利」（上當路論時務書）。王韜著書多種，對變法運動有很大影響。甲午以前，鄭觀應、何啓、胡禮垣、陳虬等提倡變法，態度愈急即明。鄭觀應著盛世危言，何啓著中國政教改革法論，新政始基，新政變通，新政安行等書（各書多是何啓胡禮垣合著，總稱新政真詮）。陳虬著治平通議，報國錄（總稱盤廢叢書）。都主張開議院，行君主立憲制度。鄭觀應說「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其主者權得其平，其立法之善，

恩慮之密，無遠弗屆。此種話語，實合意爲人選一介矣。其種君主立憲主義的「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盛世危言西學篇)論，是改良主義的基本精神，與洋務派專制主義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性質有別。

變法運動的又一推動力是耶穌教士和在華歐美商人，他們希望滿清政治有某些改良，以便擴大商業推廣教務。滿清禁止中國人辦報，當時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漢口、香港、廣州等處，西商開設報館，延華人主筆，這些人多是維新名士，在西商庇護下獨佔輿論界，變法思想的傳播，得力於報館不小。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歐美耶穌教士在上海成立廣學會(印度也有廣學會)，會員林樂知(美)，丁韞良(美)，李佳白(美)，慕維廉(英)，艾約瑟(英)，李提摩太(英)，化之安(德)等能用中文著書，介紹西學，改變了一部份士大夫輕視異教的成見。會中出書範圍廣泛，外國歷史及辦學校新法影響尤大。如泰西新史論要(李提摩太譯)列載愛通與盛記(李提摩太著，記俄國大彼得日本明治事特詳)，七國新學備要(李提摩太著，又名速與新學條例)，文學與國策(林樂知譯)，自西徂東(化之安著)等書給中國維新派有根據談論變法。光緒十五年，廣學會發行萬國公報(月報)，林樂知主筆，多載時事論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變法成爲一個運動，萬國公報是有力的推動者。

第三節 甲午戰後變法運動高漲

甲午戰爭中，慈禧派西太后、李鴻章等迫與英法光緒帝、翁同龢、翁同龢，親英派失敗了。廣學會看出親英派不甘屈服，要在政治上尋出路，再持勸告變法的機會。光緒二十一年，派李提摩太駐北京，謁見

政府中當樞大臣，翁同龢、孫家鼐（光緒帝師傅）、文廷式（光緒帝親信）等接受勅告，開始閱讀時務，傾向變法。

光緒十四年，廣東舉人康有為入京會試，寫了一篇「上皇帝書」，請求變法維新。書中大意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層，對洋務派的變法表示異議，他說「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報、機器、輪船、鐵線之用，不隨其利，反以爲好。夫泰西行之而富強，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至於奸蠹叢生，則雖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變之爲愈矣」。這正是中法戰後：李鴻章積極擴大洋務的時候，康有為看作「奸蠹」，「巨害」，主張從政治上變起。代表官僚、買辦利益的洋務派與代表資本主義的改良派，分歧就在對專制政治的變或不變這一點上。他這篇駭人的論論，得極少數帝黨官僚贊成，但無人敢代遞。后黨大學士徐桐說「如此狂生，不可中」，抽去他已被錄取的考卷。康有為爲考試受挫，却大得聲名，有利於運動的倡導。二十一年三月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康有為在京會試，號召各省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萬言書，要求「拒和、遷都、變法」，着重尤在變法，說「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這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也是無先例的士人聯合大請願，康有為的變法主張成爲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在滿清嚴厲禁止士人干政的制度下，這一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雖然萬言書仍被拒絕呈遞，但頑固派閣卷官不敢再攆斥他的考卷。康有為取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在未到工部前，又上變法萬言書，這一次他成功了，光緒帝閱後「極嘉許」，他接着又上皇帝萬言書，被工部頑固派大臣阻止，七月，帝黨文廷式出面組織「強學書局」（又稱強學會），康有為、梁啟超加入活動，成會中主要份子。會員有江標、袁世凱、黃銳憲等及英美人士共數十人，每十日集會一次，每次有人演說。又創行公報，康有為撰稿，每日印一二千份分送朝官貴人。兩江總督張之洞

見學會勢盛，捐銀五千兩充公費，八九月間康有爲住南京，謂張之洞設立上海強學分會，臨行前一天，訪李提摩太商議合作。李氏稱許他的萬言書，「余甚驚異，凡余從前所有之建議，盡歸納品結，若驚奇之小指南焉，吾人之目的相同，宜其親來訪談」。康有爲出京後，梁啟超任李提摩太私人書記。強學會的支持者是翁同龢、孫家鼐，提倡者是廣學會代表李提摩太，借「書局」、「學會」名義，實際組成以黃奕爲背景的擬帝政黨。

后黨當然不許帝黨擴大勢力，徐桐公然宣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就是說，決不許帝黨得勢。上海強學分會成立一月餘，會務發達，會員張謇、陳三立、岑春煊等多是維新派名士。善看風色的張之洞預見后黨定要進攻，藉口不同意「孔子改制」學說，停發會費。李鴻章的親家御史魏瀚伊奏請查封，說是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權議之風，西太后據奏強迫光緒帝下令查封強學會。翁同龢深爲失望。帝黨御史胡孚辰奏請解禁，翁同龢藉此力主恢復，結果改設官書局，每月經費一千兩，任務是譯書，請李提摩太在官書局任職，他知道后黨勢大，變法時機不會到來，出京回上海廣學會。

極端頑固惡劣的后黨，強學會獲得四個月活動，唯一原因是馬關條約太激起全國士民的忿怒了，這一羣賣國賊不得不暫時退縮。八月，日本宣言交還遼東，后黨依仗沙俄，氣餒漸張，解散強學會，正是它回復權力的初步，也是維新運動第一高潮的結束。公車上書後，維新派影響放佈全國，頑勢力並不能阻遏這個潮流，維新運動在上海、廣東、湖南三個中心地區繼續發展起來。

上海

黃逸暉就上海強學公會誌上海報館，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時務報（旬刊）發刊，黃居超任主筆。他是天才的宣傳家。在強學會書記員又在李提摩太的私人書記，半年內不僅讀完了各地譯出的西書，還接受李氏的口頭指點，雖然還止二十四版，他的中西學問，在當時已是第一流。時務報出世，「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梁啟超清談報第一百冊祝辭）。二十三年十月，他到湖南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繼續出版，上海及附近地區出版報章雜誌，不下三十種，輿論界頓呈皇氣象，滿清嚴禁士人干政的防又破維新潮流衝破了。

湖南

在湖南產生地的湖南，頑固勢力特別強大，新舊鬥爭也特別激烈。中日戰爭爆發，湖南維新志士 嗣同、唐才常提倡變法救亡，湘唐活動僅在瀏陽縣，與原有為領袖的變法運動並無聯繫。光緒二十三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督學江標（後任徐仁鑄）都是維新派，與唐等合作，創辦時務學堂，聘梁啟超為總教習，唐才常等為分教。嗣同等積極支持，一時籌辦新式水陸交通、開礦、設武備學堂、練民團，又設南學會，出版湖學新報（自三月始，每月出三冊，至四月十五冊止），湖報（散為日報，合為月報，自二十四年二月始，至八月止），湖南成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南學會是湖南新政的最重要部份，「該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策，而先從湖南辦起，蓋實強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演說稿在湖學報發表），此學會之意也」（飲冰室文集嗣同傳）。南學會會員千數百人，省城設總會，各縣設分會。嗣同說「固不能與民權，亦當界紳督國事之權。夫苟有神權，即不必有議院之名已有議院之實矣」。在變法初期這種省縣紳商議院是推行新政的有

效檢閱，因為士氣劣紳反抗商學會，還不會國運來。時辦學堂學生四十人，多是志青年，教習批答學生課本，發揮民族、民權主義，如「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毗髮」。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生號者無人焉，間有歐羅考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這是排滿革命思想已超出改良主義範圍。又如「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也，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之」。這是贊美民主政治，已超出君主立憲範圍。梁啟超、陳嗣同、唐才常、樊鍾（揭陽縣南學分會首領）、皮錫瑞（今文經學大師）等借學堂、學會倡導新說，當時正是各國強奪沿海要口，瓜分之說盛行，滿清政府賣國罪惡露無遺，人心恐慌的時候。南學會準備「屹然自立於天下，即與遇英人葛洪（瓜分論者）之狂悖，尙能有所資藉（創辦新政），不論於鞏固之族」（唐才常上歐陽中鵠書）。思想上確有革命傾向。大劣紳王先謙、葉德輝率領頑固派強徒，自稱「保衛聖道」，用各種卑污手段，大舉向維新派攻擊。說時務學堂培養「無父無君之亂黨」。南學會提倡「一切平等禽獸之行」。「倡平等」是「墮綱常」，「伸民權」是「無君上」，要求清政府廢歷有爲，梁啟超。設憲雖「欲以我朝列聖乾綱獨攬之天下，變爲泰西民主之國，直道好之尤」，應「暫割寸縷，處以輕刑」。結果劣紳們「齊集大成殿，謗告至聖先師孔子，應將亂民樊鍾驅逐出境」，皮錫瑞在南學會講學，力主變法，他的兒子著醒世歌，說「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劣紳們斥皮氏父子「被邪說所惑」，也用暴力把他們驅逐出境。湖南新舊兩派長期益鬥，直到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唐才常自立更起義失敗後，頑固派屠殺維新派一百餘人，才暫時取得了可恥的勝利。



上海學分會解散，康有為繼續宣傳變法，二十三年，與岑春煊等在廣西開辦學會，又回廣州開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廣州成爲變法派運動的發源地。他奔走兩廣江浙，結交紳士大夫，勸辦學會報館，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說，三年內全國設立學會，學堂，報館凡五十一所，其中學會二十四，學堂十九，報館八，就地區說：湖南十六，江蘇十一，廣東八，北京三，陝西二，陝西、湖北、浙江、福建各一，實際數目或更多，康有爲倡導的功績是巨大的。

全國維新運動的高漲，引起頑固派的驚駭，洋務派首領張之洞著勸學篇，代表頑固勢力反抗新潮流。洋務派是改頭換面的頑固派，它也口稱必須變法，但絕對反對民權，不許絲毫觸動專制制度。勸學篇自序「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其（西人）總教政俗已不免於夷狄之陋，學術義理之微，則非彼所能夢見者矣」。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就是洋務派的變法宗旨。書中有渙賦、寬民、救災、惠工等十五篇，竭力宣揚滿清的「深仁厚澤」，全是無恥謊話，根據這些謊話，武斷的證明君主專制是盡善盡美的制度。他的基本主張在「明綱」，說「三綱相傳數千年，更無異議，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明綱篇）。他的攻擊目標在民權，說「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法人皆自主，不盡滅人類不止」（正權篇）。一八九八年（戊戌）勸學篇出版，「於朝廷之力以行之，不歷而徧於海內」，對維新運動阻力極大。梁啟超評勸學篇說：「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其次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戊戌以來將近五十年，因爲中國還不會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況，變和的張之洞和勸學篇尚有活動餘地。不過，人民政治覺悟逐步提高了，即使「挾朝廷之力」

，九個月「印刷至二百餘版」，每非增加一些惹人掩鼻的灰塵，總不能阻止社會進步的大潮流。

甲午至戊戌，維新運動的成就，第一，衝破了滿清禁例，爭得某程度出版結社的民主權利。第二，民間資本主義工業獲得法律上承認。甲午以後，新工業從洋務派「官辦」，「官督商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中國開始傾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洋務派所持新工業的時代暫時沒落了。

光緒二十一年，維新派首領之一胡燏棻上「變法自強條陳疏」，要求「開民廠以製造機器」。揭出官廠的弊病說：「中國各省設立製造、船廠、槍炮、子藥等局，不下十餘處；向外洋購置機器物件不下千百萬金，而於製造本原，並未顧略。推厥病源，厥有三故：各廠之設，類以洋人成事，其病一。廠係官辦，一切工料資本，每歲均有定額，事事依樣葫蘆，一成不變，其病二。各局總辦、提調人員，或且九九之數未譜，但求不至偷工減料，已屬難得；器械利鈍，悉聽工部指揮，茫無分曉，其病三」。結論是「中國欲辦官廠製造器械，雖百年亦終無起色」。這個結論完全正確。他主張「必須准各省廣開民廠，令民間自為講求，如國家欲購槍船械機器，均托民廠包辦。則人人有爭利之心，虧本致懼，自然專心致意，實力講求，以期駕乎西製之上」。康有為上皇帝書也說「機器廠可興作業，今各省皆為厲禁，致吾藝技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贏敗，而禁吾民製造，是自蹙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減偷，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宜讓民為之，並加保護，凡作器械廠者，出資領牌，聽其創設」。胡康二人的意見，代表社會進步勢力，清政府不得不放棄舊說，李鴻章所設禁止民間使用機器的慣例，諭令各省「招商多設織布紡綳等局，廣為製造」。按照二十三年張之洞奏指所說「數年以來，江浙湖北等省，陸續添設紡紗、織絲、蒸繭各廠約三十家。此外機造之貨，蘇滬江寧等處，有購機器製造洋酒、洋紙、火柴、碾米、自來火者。江西亦有用四法發露蠶絲之請。陝西亦集股開設機器紡織局。四川已購械創設煤油並鑛立洋燭公司。山西亦集股與辦煤鐵，開

設商務公司。至於廣東，十年以前即有七絲、洋紙等機器製造之貨。湖北湖南兩省已均有購械造火柴及榨油者。湖北現已學得機器造茶門德土之法，勸諭華商興辦。湖南新約現已設立寶善公司。籌備各種機器製造土貨之法。自此各省氣象日新，必且益備愈廣。這確是甲午戰後發生的新氣象，滿清政府第一步明令承認民間資本主義生產的合法，可以說是維新運動的重要收穫。二十四年，清政府設農工商局，獎勵機器製造，又特定章程，凡「有能獨立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辦植樹各廠，有裨於興國利民之計者，並照軍功之例給予特賞」。給地廠也允許民間經營，證明光緒帝全部受維新派建國，有高度的變法決心。

第四節 參加維新運動的派別

維新派與頑固派人數比較，「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嚴復論中國分黨）。頑固派反對變法，決心「寧可亡國」。這些人結合在四太后、李鴻章、張之洞三首領之下，構成強大的反動勢力。維新人數既少，共同擁戴的光緒帝，又並無實權。頑固派有沙俄實力支持，維新派止有英美日限於友誼的同情。維新運動是資產階級要求民權的運動，而當時資產階級，還不會成爲一個獨立的階級，因之內部派別紛歧，力量薄弱，顯然不能戰勝頑固派。

維新派內務同維新系、假維新系、康有爲門下的麥孟華系都屬右派；康梁系、容闈系屬中派；譚嗣同系屬左派，這些派別代表的利益不同，對維新運動各採不同的態度。

翁同龢系

這一系是皇帝的宮僚集團，翁同龢爲首，孫毓汶、長麟、志銳、文廷式等爲中堅。「太后既已歸政於皇上，則一切政體不宜干預，免礙皇上之肘」（御史安維俊甲午年奏疏）。這是翁系的宗旨。他們也贊成變法，謀育國強兵，但對康有爲民權平等說，表示憎惡。孫毓汶奏稱「孔子改制考將蠱惑民心，導亂天下」。請旨將改制考毀版。翁同龢日記謂「近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此人居心叵測」。翁系的變法主張是在皇帝「獨斷」下，改革某些弊政，引進康有爲，目的在加強帝位，反抗后黨，對民權平等說，不得不暫時容忍。翁同龢最得光緒帝的信任，西太后法政斥逐安維峻、文廷式、汪鳴鑾、長麟、志銳，削弱帝黨。戊戌四月，光緒帝召見康有爲，決定辦法，西太后迫令光緒帝革翁同龢職，即日驅逐回籍，翁系在政府中失勢，維新運動遭受嚴重的小擊。

假維新系

這一系是投機官僚，本贊助康頭圍派。嚴復說有三類假維新人：「其一以談新法爲一極時髦之舉，隨聲附和，不出於心。其一見西人之陷堅固利，欲從而效之。其一則保守舊之人，及見西法，不欲有一事爲彼所不知不能，於毛髮隱微，附會等詞，天下之人，翁無宗之。維新之稱將爲所絕。此三者，有維新之貌，無維新之心者也」（論中國分黨）。例如李盛鐸原是保國會發起人之一，後來頑固派要起反對，他也彈奏三本攻保國會，託張蔭桓等說全部會員名單，抽出自己的名字不登，求得頑固派的信任。又如孫家鼐以皇帝黨山陞，翁同龢被逐，他暗中轉向頑固派，排擠康有爲。維新派中庸份子中，這一系人佔大多數，一遇風色不順，就散走或反嘴。

嚴復系

嚴復是福建學堂第一期學生，光緒二年，遊學英國海軍大學。六年，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前後二十年，擁有多量的學生。二十三年，在天津出版《國聞報》（旬刊），譯載外國重要政事及名著，頗膾炙人口的譯文，就在報上按期發表。甲午戰後，緊接着各國強奪海口，對中國人的刺激是太深了，天演論風行全國，被譯為「中譯之善本無有過於此書者」。在維新運動中起了極大的作用。當時上海時務報，天津國聞報分黨南北輿論界領導地位，嚴復思想的影響不下於梁啟超。嚴復代表不願亡國但缺乏勇氣的保守派士人。他譯書多種，文字古奧，自稱「吾譯非以餉學僮，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蓋效「報館之文章」（與梁啟超論所譯原富書）。這正是保守思想的表現。因為不願亡國，主張「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原強篇）。因為缺乏勇氣，他一面痛恨專制政治，一面又崇拜專制皇帝。譚靜（韓愈）篇說「秦以來之為君，正明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令，媚毛而起。質而論之，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這樣完全正確的論據，却得出「君與民共治」的結論，對大盜妥協。在上皇帝萬言書裏，不敢提出民權，止請「結百姓之心」。方法是在親至沿海各省，巡守各方，縱民聚觀高呼，瞻識共主。說百姓見皇帝一面，就「權作感泣，人人有獻主死敵，奪不自願之心」。把大盜描寫成神聖，百姓是大盜崇拜者，他所說的維新，實際是開明專制，康梁失敗後，嚴復並不被頑固派追究，這不是偶然的。

麥

孟

派

麥孟華是康有為大門徒之一，與梁啟超有同等地位。他代表康門中最頑固一派，主張「尊君權抑民權」，說「中國非民權不立之為患，而君權不立之為患」。

親至沿海各督，巡守各方，縱民聚觀高呼，瞻識共主。說百姓見皇帝一面，就「懼慄感泣，人人有割，康梁失敗後，廢後並不被頑固派追究，這不是偶然的。

麥孟華系

麥孟華是康有為大門徒之一，與梁啟超有同等地位。他代表康門中最頑固一派，主張「尊君權抑民權」，說「中國非民權不立之為患，而君權不立之為患」。他把中國社會一切腐敗落後現象，都看作民太自由，君太無權。他所謂變法，要變出一個有絕對權力的皇帝。

以上右派各系，都不是民權主義者，變法的目的在變無權的光緒帝為有權的光緒帝。

康梁系

康梁系代表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轉化為資本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就是說要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權利。西報稱「甲午以後，中國有三黨：守舊黨（后黨）主聯俄，意在保現存之局面；中立黨（維新派）主聯日，意在保國以變法；維新黨（與中會）主聯英以作亂為自振之機」（嚴復論中國分黨）。中立黨是介在頑固派與革命派中間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政治團體。康梁系應該被認為中

立黨的主幹。

康有為，廣東南海縣人，出身豪紳家庭，年幼受嚴格的程朱學教習，開口便稱「聖人，聖人」，青年時期，博通今文經學，中國史學及佛學，棄程朱學轉崇陸王學，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今文經學派自譔自珍，魏源以後，借公羊傳所謂「微言大義」，議論時政，有維新變法的傾向。它的反對派古文經學派與程朱道學派，桐城古文派勾結（鴉片戰後，以會黨黨為有力代表，所謂合義理考據詞章為一），成學術界的兩個派，康有為曾信今文經學，陸王學，說明他在舊學範圍內屬於求新方面。中年到北京應考，路過香港上海，「見西人權民政治之完整，觸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之本原」（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光緒十七年，在廣州萬木草堂開始聚徒講學。他的講學宗旨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每

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治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康先生傳）。原來今文學學風長於附會，雖然西書不多，也儘夠他附會了。

康有爲講學凡四年，培植維新派的基礎，陳千秋、梁啟超稱大弟子，助帥著大同學、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完成了維新運動的理論根據。新學僞經考在學術意義上推霸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的主張，大義在「通三統」，「張三世」。三統是說夏商周歷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三世是說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愈進步。梁兩部著作影響很大，改制考尤使守舊者驚駭，孫宗璠、陳寶箴奏請毀版，張之洞著勸學篇來對抗，說明他的學說獲得不小的成功。

康有爲「秘不以示人」的重要著作是大同書，混合公羊家三世說、禮運篇小康大同說、佛教慈悲平等說、盧騷天賦人權說、耶穌博愛平等自由說，攪耳食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學說，幻想出一個「大同之世」。全書分十部，共數十萬言。大意說封建社會是據亂世，資本主義社會是升平（小康）世，共產主義社會是太平（大同）世。他描述「大同之世，天下爲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極樂世界」，表現出豐富的想像力。他說「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皆歸之公。舉天下之田地皆爲公有，人無得私有而私買賣之（公農論）。凡百工大小之製造廠鐵道輪船，不許有獨人之私業（公工廠）。大同世之商業，不得有私產之商，舉各地之商業，皆歸於政府統之」（公商篇）。至於如何去私產，說是從「去人之宗始」。自稱「此事甚易」，實際是毫無辦法。康有爲著大同書，當然不是好奇炫博而是給中國資產階級指示出路。那時候歐洲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在工業上他看到「近年工人罷工之事，挾制業主，騰踞於歐美，今不獨萌藥身。又工廠之結構，彼此必齟齬，惡或無鐵血之禍，其爭不在強弱之國，而在貧富之羣矣」（工不行大同則工廠業主爭將別成國

（風篇）。在農業上他也看到「故以今之治法，雖使機器可用，而人民更加才智，政治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終無救生民之食安樂，農人之得均安也。或亦能創共產之法，而有室有園，自私方甚，而欲行共產之說，猶往南而北其轍也」（農不行大同則不能均產而有僥民篇）。歐洲的丁農鬥爭，使中國剛開始的資產階級感到自己可怕的前途，大同實企圖解決這個難題，妄構中國特殊說，肯定「全中國絕無階級，以視印度歐洲階級分級之苦，其平等自由之樂，有若天堂之視地獄焉」（階級之苦篇）。照他的說法，中國並無階級存在，自然不會有階級鬥爭，用改良方法可以消除未來的鐵血之禍。大同書中中國資產階級奉為經典，口頭高呼「天下為公」，實際是抹煞階級存在，幻想資產階級的永久繁盛。

梁啟超發揮康有為的理論，提出「以公為體，以變為用」的「治天下之道」（說葦自序）。變的目的在保國保種，方法提倡聯合黃種，君民同治，以孔教為國教，反對專制獨裁，外國侵略者及買辦洋務派。變的目的在變政體，方法是廢科舉，開學校，改官制，地方自治，反對變枝節。戊戌以前，梁啟超宣傳變法的理論和政綱，對維新運動的推進，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梁系政策的大宗旨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治）。從「滿漢不分」出發，康梁系不談民族，而談保種，主張聯合黃種各族，反抗白種人的侵略。對外信賴日本，梁啟超述師說，說是地球有一種「運」已到日本，「當渡黃海渤海與中國，而北有滿洲，南有台灣，以為之過脈，今運將及矣……十年以後，中國之強盛，將甲於天下」（論中國之將強）。滿洲台灣是日倭侵略中國的南北兩通路，康梁反認為是與中國之「運」的過脈。用神秘的「運」來掩飾反人民心理的聯日政策，是他們的真意。對內企圖「滿漢合種」說是「平滿漢之界，誠支那自強之第一階梯也」，「籠羣出」徵籍貫、通婚姻、並官缺、廣生計」四條辦法，若滿洲的「聖皇」保持「李治支那之光榮」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康梁的保種主義是反動的。從『君民同治』出發，梁啟超嚴格區別民權與民主的含義「絕異」，中國正能行民權不能行民主，他說：『政府壓制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對民主革命認爲『我國民智未開，明白自由真理者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故革命者最險之策而亦最下之策也』（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康梁的民權主義也是反動的。不過，他和右派的嚴復有區別，嚴復以爲『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主而入民主』，梁啟超相信民主政治將得最後勝利，以爲『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是從，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論君政民政相體之理）。康梁系屬於維新運動的中派，比右派進步，因爲他們承認從民權可以轉到民主。

容 閻 系

容閻是中國改良主義的創始人。幼年在香港瑪禮遜學校受美國式教育，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遊學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信耶穌教，娶美國妻，入美國籍，是美國化的中國人。大學畢業後，抱着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自處於富強之境』的志願，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歸國，想『識中國建官，庶幾得行全志』。他曾同情太平革命，向洪仁玕提出富強策七條，未被採納。又回會國藩，李鴻章建議辦機器製造廠、輪船招商局，派幼童赴美遊學，都得到實現。洋務派創辦新政，多與容閻有關。留美學生一百二十人回國，『列身顯要，名重一時』，容閻在這一派人中有威信。中日開戰，激動了他的愛國心，又回中國，結實翁同龢、康有爲、梁啟超等人，籌劃維新事業，『寓所變爲維新黨領袖的會議場』（容閻西學東瀛記）。庚子年，唐才常等組織自立會，推容閻爲會長，自立軍起義失敗，退回美國。

以上中派兩系，代表萌芽狀態的資產階級。它們軟弱性使它採用改良主義方法，希望從滿清政府

手中用和平方法取得一部份政權。當時建國道途不能不受限制，它也會發現出些許革命的傾向；但當它獲得有利可圖的機會，又立即堅持改良主義或隨落利反革命；這有爲就是這一派人的典型。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孫中山準備起義，向陳少白去見康有爲，想招他同辦大事，剛好萬木草堂放假，沒有見着。正月，康有爲與梁啟超等一羣學生往北京會試，路過上海，陳少白到旅館找他，密談革命，陳少白「與中會革命史要」記載當時談話：「我說現在中國的情形，已很危急，滿清政府實在不行了，非革命一下不可。他也說，很對的。然後他就問我長江一帶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說大概的把局面說了一下，他點頭稱是」。與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康有爲派弟「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章太炎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戊戌政變，康有爲逃到日本，也預想利用與中會聯合起兵，後來奪得與中會領袖羣衆，才堅決保皇。專圖個人私利，從此不再是進步政黨首領而成爲反動集團的渠魁了。

譚 嗣 同 系

譚嗣同出身湖南瀏陽縣大紳士家庭，受王夫之船山遺書的影響，早年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甲午戰爭更刺激他發憤提倡新學。當江南製造局譯出的自然科學書，廣學會譯出的外國歷史、政治及耶穌神學書，供給他的新知識，加上舊的儒學、老莊學、佛學，構成變法的理論體系，成爲維新運動時期第一流思想家，光緒二十二年，他在南京著「仁學」，每成一篇，而梁啟超相繼，康梁思想給他的影響當然不小，但並不能改變他獨特的面貌。在漢滿問題上，康有爲不敢表示不滿，譚嗣同嚴厲抨擊（元）愛親覺羅（清）諸職種異類，憑陵乎禮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仁學上）。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他悲憤異常，說「滿漢之見，至今未化，故視爲儲來之物，圖自全而已，他非所值，尊二百九十年之竭力供土，遂無一點好處耶。宜乎台灣之民，聞見棄之信，腐心切齒，以爲恩斷義絕。開關以

變熱惡心如此者」(上歐陽中鵠書)。在君民關係上，原有爲主君民同治，譚嗣同主張治，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爲君。夫曰共舉之，則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事之資也。如时而事猶不辦，事不辦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仁學說)。在思想根源上，原有爲從陸王心學出發，以爲變法是由於「不忍之心」。譚嗣同繼王船山「新說則無其道」說爲變法宗旨。以爲「道必依於器而後有實用，非空談無物之中有所謂道」(上歐陽中鵠書)，就是說，依社會的變化而變法。在對舊派態度上，原有爲主妥協調和，譚嗣同主鬥爭。他說「平爲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今日中國能鬥到新舊兩派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今日但觀誰勇猛耳」。唐才常也說「若夫地球全局，則非發明重民器戰平等平等之大義，斷不能如此浩劫。受茲不能殺身以成仁，不能曲學而阿世」(上歐陽中鵠書)。這些，都是譚嗣同唐才常高舉康有爲處，在湖南自成總新運動中偏左的一派。不過，他們並不能超出改良主義的範圍，譚嗣同稱光緒帝。怕西太后藉口傷害「始事主戰之人」(光緒帝)，希望天祐我國，使和議速就，日月照臨如初」(甲午年上歐陽中鵠書)。他雖然憎恨滿洲統治，反滿決心是缺乏的。唐才常聽到光緒帝變法，說是「皇帝神聖天縱，遠過唐虞，合地球全局觀之，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逆而難，今適得其易者，誠我四萬萬人無疆之幸也」(上歐陽中鵠書)，他相信「皇上天豈聰明，使我朝得澤之厚」，變法一定成功，這些錢去捐道員，準備做維新大官。改良主義派不論他如何激進，到底還是軟弱的。

維新派內部右派勢力最大，中左兩派較小。張謇在光緒任用專辦新政的軍機四卿。楊銳(張之洞、陳寶箴保薦)，劉光第(陳寶箴保薦)代表右派，林旭(康有爲門徒)代表中派，譚嗣同代表左派。四卿中，林旭尤盛惡氣，毅然獨斷」(光緒大事彙編)。實際上只有譚嗣同一人盡力新政。楊銳是

既滑官僚，張之洞最親信的門徒，代表假維新系。他原收賄賂，今日一捲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章太炎革命道德說）。明知「今上與太後不協，變法事大，禍亦不測，吾屬中樞要，死無日矣」。還是貪戀利祿，捨不得軍械處地位。劉光第是積極的攝帝官僚，仇恨后黨，不願往來，代表翁同龢系。林旭浮薄少年（二十五歲，沈葆楨孫婿），與后黨首要之一北洋大臣榮祿有交情，康有爲想利用他謀帝室兩黨妥協。被捕前一天，「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斬首時還「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左派譚嗣同獨能忠於自己的變法事業，拒絕日本人的勸告，不肯逃亡，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不昌也。有之，請自歸開始。」（梁啟超戊戌六君子傳）。辦理新政的四腳，反映維新運動的紛歧和無力，震世勸教於用寶，不就因爲看穿了維新勢力遠不敵頑固派。

第五節 百日維新

洋務派的變法「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何調適」（嚴復上皇帝萬言書）。梁啟超攻擊尤力，說「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觀矣。三十年來名臣會國藩、文祿、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學乎。李以三十年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箇而已。一旦有事，朝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政變原因答客難）。維新派反對洋務派的

議論符合社會的公意。因之「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談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康有爲上皇帝書），也是符合社會公意的正確方針。但維新派鼓「變之自上也者順而易」的思想所迷惑，看光緒帝是「天資聰明」的「聖主」，根本不認識也不可能變法，維新運動全部落空，正是認識錯誤的應有結果。

在國內政治方面，西太后、光緒帝的關係，是滿清機構極度腐爛的表現，光緒帝作爲西太后的一個傀儡，才有他存在的意義，不願當傀儡，就是不能當皇帝。雖然光緒帝確有變法決心，對西太后表示「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予我以君實權毋違位」，對孫家鼐表示「朕但願效中國耳，若能有益於國民，則無懼何害」（康有爲戊戌奏稿）。但傀儡地位並不因此改變。在外國關係方面，西太后李鴻章訂中法條約，出賣東三省換得武力保障后黨政權的鞏固。英美並未得同類利益，不願意積極支持帝黨。維新派變法，超出帝國主義能允許的範圍。梁啓超引李提摩太所著「西鐸」說：「西官之爲中國謀者，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余於光緒十年回英，接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請示振興新學之道，以備異日傳播中華之用。某國大臣變色曰汝教華人盡明西學，其如我國何，其如我各與國何！」又說：「西人之見華官，每以諛詞諂媚；曰，貴國學問實爲各國之首，以爲其自以爲是之心，而堅其藐視新學之志，必使無以自強而後已」。李提摩太目的在傳教，不妨說出一些政治侵略者的秘密。這便一般維新派覺悟到：「西人之政事可以行於中國者，若練兵也，置械也，鐵路也，輪船也，開礦也，西官之在中國者，內焉賄之於吾政府，外焉賄之於吾有司，非一日也。若變科舉也，興學校也，改官制也，興工藝開械器廠也，獎農事也，拓商務也，吾未見西人之爲我一言也」（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弊）。維新派對西人態度，譚嗣同可爲代表，他在強學會封禁以後，認爲「事理失平，轉思出而獨寤其編。操督將孔子攔起，略假耶穌之名，推英國駐漢領事賈士充會首，結爲湖南強學會」。與

賈誼「訂立密約，殺費搖敵，紅欲假耶穌之名，復欲行孔子之實，圖目前之庇護，杜日後之隱憂。不圖西人絲毫之利，亦不授西人以絲毫之權，語語踏虛，字字從活。此約一定，學會隨意可與，誰敢正目視者」，「上歐陽中鶴書」。維新派標榜保種保教，戒備西人的乘機侵略；同樣侵略的日本，却看作同文同種，主張中日聯盟，共禦西人。變法期中，伊藤博文藉口遊歷到北京，光緒帝破例親自接見，請他指導「改革順序方法」。甚至有人奏請留爲中國宰相。伊藤與李提摩太同一處，策動變法，這當然引起英美的不喜，隨着「中日親善」的發展，英美採取監視態度，防保種主義的實現。日本雖大野心被英美牽制，不敢出力支持光緒帝。無論在內政外交上，光緒帝都沒有變法的條件，維新派異想「願而易」，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爲入京上書，請光緒帝「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書中例舉上中下三策，上策主旨是「探德俄日以定其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又請閱讀泰西新史綱要，列國變通與盛記及自著的日本變政考，大彼得變政考等書。經頑固派多方阻撓，直到二十四年正月，光緒帝才看到他的上書，大受感動，翁同龢也指薦「有爲之才過臣百倍」（梁啓超如此說，可能誇大，密薦是事實）。光緒帝諭總署，自後康有爲如有條陳，即日呈遞，不許阻撓。有爲奉旨專摺統籌全局，大旨仿日本維新與政，（一）大齊羈臣以定國事；（二）設「上書所」以廣言路；（三）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四）各道設「民政局」以舉行地方自治。維新運動開始與光緒帝結合。

以膠州灣事變爲發端，外患極度緊張，瓜分大禍迫在目前，維新派人士紛紛組織學會，京外如湖南南學會，京中如國學會，陝學會，蜀學會，粵學會；又有保浙、保漢等會，意在團結志士，亡國後保種本領。三月，康有爲等發起保國會，議定章程三十條，標保國、保種、保教爲宗旨，北京，上海

設兩總會，各設分會，略具政黨之規模。康有為在成立大會上講演，亡國慘禍，說「香港英人，至今尚無科第，人以賣辦為榮。英人之饒實者，皆可為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衡，紅藍之頂，乃多為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寒哉。及今不自強，恐我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這樣的意見本是莽統治階層設想，頑固派却惹起攻擊，組織所謂「攻保國會」，散佈惡謠，又總統上奏彈劾，故意造成混亂狀況，使保國會自覺退縮。清人文商評奏康有為開保國會，聲明「保中國不保大清」。頑固派當有力證據，準備查究。光緒帝說「會能保國，豈不大善」，革文榜御史職。保國會召集三次，會員二百餘人減至百人左右，以後不再開會，事實上被頑固派破壞了。

——這是新舊兩派首次衝突，各有損失，不分勝負。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表示變法決心。召見康有為，詳談變法步驟，康有為開始參與政權。頑固派也開始籌備政變。頒布定國是上諭後四天，四太后令光緒帝下詔革翁同龢職，賜逐出京。又諭工部以上大臣授新職，到皇太后前謝恩。又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甘軍）、聶士成（武毅軍）、袁世凱（新建軍）三軍。

這是新舊兩派決鬥的準備，新派得起草上諭權，舊派有軍政實權，握著屠刀待機而動。

從四月二十三日（公曆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到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共一百零四天，維新派實行「除舊布新」的初步理想，發出數十條改革命令，這些命令大都含有妥協性，在頑固派留有出路，因為缺少推行命令的實際力量，頑固派拒絕接受這個妥協。

關於除舊 的命令

(一) 廢八股，改試策論。全國數百萬八股士人痛恨入骨。(二) 各省書院祠廟改設學堂。書院山長多是地方上有名紳士，祠廟有落後民衆擁護。與一廢妨地方官保護政士、教民「命令對照，激起廣大士民的憤怒。(三) 裁減綠營。近百萬將弁兵卒發生失業恐慌。(四) 裁撤京內外大批衙門冗員。腐朽官僚大地震動，公開反抗命令。(五) 准滿人自謀生計。二百五十年來久貫寄生生活的五百萬滿人，突然喪失特權，陷入死亡的危境。維新派紙上除惡，引起各種舊勢力強烈的反抗，光緒帝愈益孤立，四大后愈益堅強。

關於布新 的命令

(一) 辦學堂，首先籌辦京師大學堂。(二) 設中國銀行，購務鐵路總局，農工商總局，提倡各種實業，直到允許私人辦兵工廠。(三) 獎勵新著作，新發明。(四) 設立譯局，翻譯警籍，報紙一律免稅。(五) 准許自由開設報館、學會。(六) 編國家預算，公佈議出歲入，按月發表。(七) 廣開言路，不論官民一律得上市言事，嚴禁官吏抑阻。(八) 辦農會，商會。短期內給予人民相當充分的民權自由是維新派運動最大的成獄。這個成獄繼續發展起來，可以摧毀頑固勢力。但頑固派決不允許維新派獲得時間；在湖南，聚眾圍攻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毀時務學堂；在北京，八月初發動政變。

這是新舊兩派全面衝突，新勢力來不及發展，被舊勢力用暴力摧毀。

四月間，光緒帝開始變法，兩太后同時佈置軍隊，令榮祿統率董壽裳三軍。董福祥是甘肅總辦，左宗棠收買他煽動回民起義軍，被稱爲猛將，最得榮祿的重視。聶士成是淮系著名戰將，絕對服從李鴻章的命令，在三軍中兵力最強。董福祥對於運用兩湖督臣，取得相反各派的相信任。甲午變亂

他這派的得意門徒，主張吞併朝鮮強硬對日。張蔭桓翁同龢主戰派反對李鴻章，但李鴻章却認袁世凱唯一可用的人才。他給總署信裏說「朝鮮之事，最難處置，剛柔操試，勢在兩難。袁世凱精明剛幹，鴻章每切論以鎮靜勿擾」。這就是說，如果袁世凱學得鎮靜一些，那便成「不易得」的「通鑑」，能處置最難之事。甲午戰後，主戰派謂「袁世凱深悉倭情，屢購密報，若其倭韓形勢早達朝廷，期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開朝旨召詢袁世凱，而李鴻章屢轉禁錮，不使至京」（翰林院名譽李鴻章摺）。據翁同龢日記，袁世凱會派密使求他設法准令入京，他並奏請「派袁世凱帶數營」，似乎袁世凱是主戰派方面的人。馬關談判，伊藤「問袁世凱何在」。李鴻章答稱「現回河南鄉里」。伊藤追問「是否尚在營務處」。李被迫承認「小差使無足重輕」。袁世凱經這一追問，聲望更高。清政府選為北方洋式軍隊創辦人，得力於翁同龢的有意培植。帝黨開強學會，他入會贊助。翁同龢被逐回籍，路過天津，他派專人持函慰厚禮，表示同情帝黨。在維新派看來，他應該擁護光緒帝變法。但在榮祿部下，他仍是親信將領之一，領兵七千人。翁同龢第一次接見，就判定「此人開展而欠誠」，老官僚的人事經驗，有時是精確的，果然，光緒帝及維新派首領都成了「此人」的出賣品。

七月下旬，懷塔布（西太后親信），楊崇伊（李鴻章親信）等往天津，與榮祿密謀，預定九月初，帝后同到天津關兵，舉行政變，形勢非常緊急。康有為先會派親信人徐仁錄探問袁世凱意見，袁表示擁護。康有為、譚嗣同信以為真，向光緒帝保薦，準備給他參謀部長職務，保護新政。七月底，形勢更急，光緒帝與譚嗣同有為等說：「朕位且不保，爾等可有何良策，勿速遷南」。康等有商定召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擢升侍郎，令專辦練兵事宜。次日又召見。初三日，譚嗣同與袁世凱，讀他閱兵時，教光緒帝出險，誅太后黨，恢復帝權。袁世凱許諾，「正色厲聲」說「錄榮祿如殺一狗耳」。初五日，袁世凱請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即入京見西太后，半夜後，

溥太后囚禁光緒帝，宣稱皇帝再三懇請調政，初六日起，坐殿辦事，百日維新宣告結束。袁世凱的血
續叛賣手段，換得清國派的信任，從此變成政治舞台上頗為重要的人物。

政變後，維新派認定李鴻章太見英使，於啓超見日使，容爾見美使，議設法救光緒帝，鄧被追緝
。榮祿、楊岳、伊大捕維新派，康只得英日總保護，康逃香港，梁逃東京。楊雲秀、康有溥及軍機四卿
被捕處死，罪狀之一是「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當時新派紛紛逃避，北京形勢混
亂，各國藉口護僑，調兵入京，清國派才開始畏懼，諺曰「朝廷政有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
用刑至意」。被捕官員革職從軍，得免一死，即國派在一個月內禁止全部新政，恢復全部舊制。新政
中被獎勵推行的所有保甲法，兩太后說「認真辦理，自進一益」，實際是剝用地方頑固份子，普遍在
禁維新派。因為光緒帝廣開言路，不少鄉村士人上書議論政事，攻擊官吏，頑固派需要保甲來摧毀
民權的萌芽。

第六節 康梁維新派墮落成反動集團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指出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點：「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
——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改良主義的康梁維新派（死心保皇
以前）當然也受這個原則的支配，不過比當時的革命派——興中會，革命性更少些，妥協性更多些。
變法失敗，康梁等逃到日本，維新派開始分化為三部份。一部份是湖南維新派，如譚永年、熊力
山、唐才常等傾向革命，畢熊等先後參加興中會，而康梁絕交。唐才常保皇名義起兵勤王（排滿），
算是半革命。一部份是康梁等，公開號召保皇，拒絕與興中會保持微弱的聯繫，梁主張合作，革命傾

向比較顯著。一部份是麥孟華、徐勤等，堅決保皇，反對革命。已亥（光緒二十五年）以後，康與麥混爲一談，成與中會的頑敵。

康初到日本，經宮崎寅藏、平山周居間勸告，由梁啟超代表康有爲約陳少白代表孫中山在大森毅家黨首次商議兩派合作。第二次陳少白直接和康有爲談判，與中會要排除滿清幾個統治，康有爲要保存光緒帝，說「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的」，就是說止反對西太后的頑固政府。康有爲的想法，以爲西太后年齡比光緒帝大三十歲，西太后死後，自己無疑是立憲政府的首領。他寧願等待時機，當滿清主子的奴僕，不願在革命團體當第二三位的首領，談判不得結果，保皇會公然設立起來，與中會會員被奪去大半。當時日本政府培植中國反滿團體，命令康有爲出號，他離開日本，向美洲及南洋華僑宣傳保皇。

梁啟超留住日本，在湖南維新派及大部份唐氏門徒推動下，決議發動「勤王兵」，與孫中山商定孫康兩派聯合計劃，孫中山任正會長，梁啟超任副會長。徐勤，麥孟華竭力破壞，不肯訂立聯合章程，向康有爲告急，說「康啟超漸入行若爾姿，非速設法解散不可」。梁啟超原想雙方投機，總是說「我們雖然用保皇的名，實際還是革命」。楊衢雲看出「此種人非真愛國者，與之合作實爲有害無利」。孫中山却熱望合作，因爲中國留日本學生不過七八十人，多數屬康派，與中會不得一人，合作成功，可以因之接近學生，對與中會是有利的，但不會發覺梁啟超別有詭謀。光緒二十五年，康有爲命令梁啟超到檀香山辦保皇會，臨走時譚駭騙孫中山，立誓「合作到底，至死不渝」。請介紹檀島與中會重要會員。孫中山受騙了。他利用孫中山關係，宣傳「名爲保皇，實則革命」，誘惑僑商加入保皇會。與中會發源地的檀香山，像橫濱一樣，會員又被保皇會奪去大半。

康樂讓落了，但留在日本的政門徒們還要求與革命派合作。康有爲到加拿大宣傳保皇，進行策

順利，騙得不少金錢，竟信回來，痛責那倡言合作的學生，說他們太無志氣，不識邊際，要附人後尾，看風可恥。今日有了加拿大這樣好成績，更發聲改前非，自己爭氣。這一番教訓，把那些心想活動的門徒，罵得啞口無言，只好死心塌地，跟着他一路走。海外各埠興中會會員，受他們的迷惑，許多人變節，革命運動遭受極大的打擊，幾至無法進行。興中會本身犯了錯誤，還就康派「名爲保皇」的荒謬主張，使革命旗幟在羣衆中混亂不清，進行喪失原則的合作，正如楊雲雲所說「有害無利」。

第七節 自立軍起義

湖南維新派多與興中會接近，光緒二十五年，梁啓超，唐才常，林奎，黎力山，吳祿禎等決議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運動會黨與防軍，先襲取武漢爲根據地。興中會會員畢永年聯絡兩湖龍頭楊鴻鈞、李雲彪等數十人歸附興中會，楊李所開山堂，勢力最大，梁啓超談合作，目的在借出興中會的會黨羣衆。唐才常約林奎回國籌備起事，梁啓超開會徵途，興中會主要會員也有許多人到會，彼此互約合作，興中會在長江的會員及會黨都介紹給唐才常，林奎。

唐林到上海，發起「正氣會」，唐才常訂定會章，序文有「低首禮，自甘奴隸」，「非我種類，其心必異」一類反滿詞句，又有「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那種擁帝論，陷入不可解的矛盾中。革命份子畢永年，章大炎嚴厲反對，畢勸唐謝絕康有爲關係，辯論一日夜，不得要領。興中會影響下的會黨龍頭蔡學投唐，畢憤極削髮爲僧。康有爲暗中勾結英帝國主義，在華僑中募集軍費六十萬元，全部私吞，不肯接濟。唐才常並非真心擁帝，以爲兼顧革命，保皇，可得兩派協助力，不料兩派都失望離開，反而孤立起來。

唐才常受康有爲指示，改正氣會爲自立會，軍稱自立軍。庚子年六月，借反對西太后指示義和團擄外，亟需挽救時局爲名，邀請上海維新人士在英租界張園開中國國會，公推容尚爲會長，嚴復爲副會長，唐才常爲總幹事，林素等爲幹事。國會宣稱宗旨三點：（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二）「決定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三）「請光緒帝退位」。否認滿洲政府就不該保存清國和光緒帝，保存清國和光緒帝就不能創造新自立國，章太炎再三勸告唐才常勿爲保皇黨利用，唐才常還在希望海外匯款，拒絕勸告，章太炎當場自剪髮，表示決裂。所謂自立運動實際是戊戌維新派的動盪運動，從右派翁同龢系（文廷式爲代表）到左派譚嗣同系都參加了這個運動。

唐才常失敗的原因，由於康有爲私吞軍費，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國際形勢的變化。當時正是義和團極盛，北方混亂時期，英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通商口岸有爲指使自立會擁護兩湖總督張之洞制撫長江上游，（兩江總督劉一另有張蔭等人擁護），滿洲何啓指使興中會擁護兩廣總督李瀚章制撫兩廣。張之洞李鴻章都有自己的打算，他們視望形勢，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擁護，組織傀儡政府，如果帝后后存或帝后同存，他們深信沙俄勢力，滿清統治決不崩潰，則拒絕擁護並殺戮擁護者。自立會，興中會領導人簡單地在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一方面着想，希望與洋務派首領合作，維新派的自立會固然宗旨混沌，又自立又保皇，革命派的興中會同樣也是態度曖昧，似民主又似君主立憲。七月下旬，八國聯軍入北京，西太后挾光緒帝同逃，國際形勢不允英國獨佔南中國，張之洞的計算決定了，得英領事同意，屠殺唐才常及自立軍。

康有爲與英帝國主義的秘密勾結，在向華僑募款公函中流露出來，他說：「新黨已於上海設立國會，預備新政府，爲南國立國基礎」，又說：「我南方勤王義勇已分布數路，不日將起……一而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圍陞以救主，英既相助，則我輩立不敗之地」。張之洞被獲漢口自立軍機關，奏報嚴

辦兩湖會黨擾亂說，其詞甚有目共賞，直有各省爲獨立之區。其華洋文規條，內有曰：不認滿洲爲國家。這證明所謂「自立之區」是依照英國的計劃來行動的。不過容國、唐才常等人未必預聞這些規條，正是間接受康有爲的指使。因爲容國起草的對外宣言八條，與與中會上香港總督書六條比較，自立會確在「自立」的意義上發言，並無依賴英國的思想表現。唐才常信任日本人，與英人少有往來，他和張之洞交涉，似乎並不預知英國對自立運動的關係，當時自立會推容國駐上海，黎科駐漢口，辦理一般的外交事務；康有爲派門徒龍澤厚代唐才常辦外交，這也許是承受英國指示的密使，容國、唐才常及其他自立軍領袖原有爲欺騙是事實，但卻無直接勾結英帝國主義的嫌疑。

唐才常、林圭組織自立軍爲七軍，秦力山統前軍，駐大通；田邦裕統後軍，駐安慶；陳猶龍統左軍，駐常德；沈靈統右軍，駐新堤；林圭統中軍，駐漢口。另置總會親軍及先鋒軍。唐才常任雷軍督辦，駐漢口。日人田野橋次在上海發刊日文日報，替自立軍鼓吹革命，不遺餘力。唐才常托日人勸告張之洞接受自立軍的擁護，宣布兩湖獨立。張之洞觀望形勢，不表示態度，也不出面干涉。兩湖、江西、安徽等省哥老會員及水師營兵紛紛參加，有數數十營，定期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時大舉。唐才常屢電海外，催康有爲、梁啟超匯款接濟，再三辭謝，等待酒款。七月底，龍澤厚招文廷武來漢口，向張之洞告變，經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地方官更捕獲唐才常、林圭、田邦裕、黎科等二十餘人。張之洞對西太后表示忠誠，大殺湖北維新人士百餘人，湖南劣紳王先謙、葉德輝等機報復，向巡撫告密，又大殺湖南人士百餘人。被殺的人都是兩湖進步的知識份子，他們有高度的愛國熱忱，主動上要求除舊布新，挽救中國，這樣的死不失爲勇敢的死。唐才常等被捕，羣呼「速殺」，張之洞不敢白日行刑，二更後押到僻靜處加害，受刑人伸直頸頭叫「殺」，毫不畏懼。確保持了譚嗣同的犧牲精神。可惋惜的是他們錯走了改良主義那條死路，不能斷絕保皇會的可恥關係，希望得些軍費，結果較採

國會出賣，二百餘人的流血，止有一種作用，就是給「改良主義無前途」這一事實作證明，其他作用是没有的。

： 自立軍的失敗，使改良與革命兩派發生變化。「秦力山、陳翰龍等至日本，即向梁啓超大開交涉，要求算賬，梁憤而有披髮入山之宣言。保皇會自此信用漸失，不復談起兵勳主事，未幾易名帝國黨改爲」（閱國前革命史）。這是說梁一輩無恥的政客同西太后的假維新投降，更徹底的墮落了。「力山以才常起兵用勳王號，名義不隨，欲力振刷之，遂與啓超絕，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遊學生疑孫公與梁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相與語，歡甚，知其非才常輩人也。孫生聞孫公無他窺狀，亦漸與親，稱族大爺始得播種舍論」（章太炎著熊力山傳）。這是說知識份子開始從梁影響下解放出來，找到孫中山的革命方針。

第八章 對抗瓜分運動的義和團運動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至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

第一節 緒言

如果鴉片戰後，國際貿易中心從廣州轉移到上海，南中國經濟秩序的驟然變化，成爲促起太平革命的一個主因。那末，甲午戰後，北中國經濟也起了驟然的變化，如開海港、造鐵路、辦郵政、設海關、通商等，這也成爲促起義和團運動的一個主因。但它們却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太平革命反對的是滿族的封建壓迫；義和團運動則是中國人民自發的反帝國主義的侵略。

義和團在形式上是以落後的宗教迷信表現出來，實際上却代表着廣大中國人民反帝的運動。當時人民在滿清愚民政策與宗教腐敗的欺騙影響下，只能由這種落後形式表現他們的憤憤，不應該對之做過高的要求。運動的範圍在北中國特別廣泛，人民狂熱的參加了反侵略活動，比之平英團，甚至比之天津教案是有更大規模的發展。中國人民中蘊藏着不可限量的反抗力，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證明它有觸必發。滿清義和團運動的原因，無疑是甲午戰後的外國侵略和滿清暴政，侵略和暴政，使農民更覺痛苦，到的是外國教士的內地傳教。

鐵路外侮時對北方人民的迫害。

(一) 領

士掠奪

光緒三十一年，山東大刀會開始有排外活動；顯然是甲午戰後的反應。二十二年，德國向總理衙門指囑索借膠濟鐵路。二十三年，大刀會殺鉅野縣德教士三人，德國派兵強佔州府。而政府說「德國圖佔海口，蓄謀已久，此時特環鉅野教案而起」，確是實情。德德強佔之緣，俄佔領旅順，大連，英強佔威海衛、九龍，法強佔廣州灣。「四十日之間，失地失權之事已三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保國會演說辭)。要挽救這樣嚴重的瓜分局面，維新派知總份于提倡保種、保國、保教的變法方案。感受威脅最大的山東人民，實行樸素的武力反抗方案。二十四年三月初，大名府考試童生時城內發現多數布告：「各省愛國志士，親西人無辜無天之行爲，已決於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燬其居。其不與我同心一致者，男在女媧，聞此告示，而不爲奮揚者亦如之，完了」。散發布告的是大刀會，證明它在努力宣傳武力反抗的方案，這個方案，迅速獲得北方廣大民衆的贊同。

(二) 經

濟掠奪

光緒三十四年，中德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允許德國經營膠濟鐵路，並開辦鐵路兩旁三十里內的礦。山東人民會受侵略者無數次暴戾的欺壓行爲；例如膠濟路局自備釘路橋樑高價勒索農民口角互毆，德軍藉口保路，槍殺農民二十餘人，與擄劫金幣指使賄賂，擄掠兵費二千四百餘兩。又如鐵路阻礙水路不肯造橋放水，引起農民「暴動」。袁世凱明知「其(德人)特強專兇，動輒細故得兵壓脅，久已成爲積弊，而愚民仇外益甚」，但仍派兵替德人鎮壓。山東人民游動義憤，責任全在侵略者方面。膠濟鐵路以外，清政府借英款，用英工程師築成津滬鐵路(二十一年完工)，京奉鐵路(二十二年完工)。京奉鐵路總幹段(二十五年完工)。又借俄款(比國出商)築盛(盛溝橋)濟鐵路，二十四年成慶泉、

定)毀，二十六年成保正(正定)毀。凡鐵路所到地區，舊式的交通運輸被湮置，路線上田地房屋燒燬被毀壞，直隸和國運動在京津保三角地區特別熾烈，造鐵路時對人民非法壓迫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天津間中外輪船暢通，運河逐年失去作用。光緒二十六年起，各竹漕米不論海運河運，一律改徵折色，運河竟成廢物，沿河城市衰落，元明以來南北主要水旱大交通從此荒蕪，對兩岸居民的生計是嚴重的打擊。

洋貨進口在光緒十三年(中法戰後)，開始超過一萬萬兩，二十二年(甲午戰後)開始超過二萬萬兩。「二十八年(庚子戰後)開始超過三萬萬兩，三十一年(辦假維新)開始超過四萬萬兩。」土貨出口至光緒十七年才超過一萬萬兩。(二十八年超過二萬萬兩，宣統三年超過三萬萬兩)。大抵中國戰後一次，輸入發展一次，輸出遠遠不上輸入。從甲午到庚子凡七年，平均每年入超約五千萬兩，而且輸入各貨，洋藥(鴉片)逐年減少(因土藥大量生產，售價較低)，洋布棉紗及其他洋貨逐年增加，加速中國手工業生產的瓦解，北方修築鐵路，更有利於洋貨的深入內地。

光緒二十二年，創辦郵政局。二十五年，改電報局為官辦，增添資本二百二十萬元(以前官督商辦，資本八十萬元)。對驛站和民營信局，這種新事業威脅着舊式通信人員的生計。

漢口到北京阜路及沿運河水旱兩路是中國南北交通的兩大路綫。甲午以後都起大變化，再加洋貨流行，鐵路，郵電通達等原因，農民手工業者、商人、交通運輸工人、驛站夫、鏢客、下至騾馬幫奴，失業破產至少數百萬人，政府和地方官吏止顧搜括，誰也不會顧及大批人的生活。

關於滿清暴政對北方人民的迫害：

(一) 無
情的搜括

甲午戰敗，清政府濫借巨額外債，除付交日本二萬萬五千萬兩（連利息在內），餘款一萬二千萬兩用途不明，全被回扣，浪費，私吞消他盡淨。政府負債既多，財政愈益困難，只好盡量增加捐稅，因之甲午以後的剝削整重，官吏貪污比以前更大進一步。光緒二十一年，戶部竭力籌款，有扣壓俸、增釐金、折漕米、七葉、茶葉、糖、鹽、烟、酒加稅，田房稅契設法整頓，典當各商強令捐輸等各種苛難辦法。以山西為例，二十二年七月開辦烟酒稅，每酒一斤徵錢三文，每菸一斤徵錢五文，鹽菸十文，至二十三年六月，共徵銀五萬餘兩。二十六年，增稅酒五文、菸八文、鹽菸十六文。按照一般收稅的例，官吏舞弊中飽，比報解數加三倍，山西人民單就菸酒一項，光緒二十六年前每年負擔二十餘萬兩，再加其他捐稅，負擔的嚴重可想。山西如此，別省自然也毫無例外。二十五年，戶部奏稱：『近年大費有三，曰軍餉、曰洋務、曰息債。息債或約需兩千餘萬，洋務亦約需兩千餘萬，軍餉約三千餘萬，此三項已七千餘萬矣。此外，國用常經、京餉、旗兵餉需及內務府經費；又各直省地方經費，亦幾二千萬。收入約八千萬，短少一千數百萬兩』。全國人民飢寒交迫，政府還要加索一千數百萬兩，捐稅名目繁多到無法再添設。西太后召集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大會議，結果議得『裁革陋規，剔除中飽，認真整頓，化私爲公』十六字。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政府奪取各衙門已有的陋規，讓官吏另立名目收規費。這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已經說出了『化私爲公』的秘密，他說：『其考（海關）例外浮費，原不難澈底查明，全行禁革，但射利之徒（官吏），營私玩法，一經查出款目，必將視為例所應得之款，其勢必致費上加費而後已，從來清釐積弊，另定新章，大抵如此，不獨關稅一事如此。』西太后採納大臣的建議，以『嚴提中飽，力杜虛糜』名義，令各省都督撫『凡取諸商民者，一併和盤托出』。北方省份，例如直隸總督裕祿交出三十七萬兩。這當然不能滿足清政府的貪慾，竟以

「雖非國規中飽，而利不在國亦不在商」為理由，擬取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漢河金礦局，餘利歸公。當然，這還是不夠的，以「江南地大物博」為理由，特派剛毅「前往將關稅、釐金、鹽課等項實力整頓」，括得二百餘萬兩，照樣又說「廣東地大物博」，派剛毅「馳往妥籌鉅款」。又括得「常年軍餉銀一百六十萬兩」。剛毅在南方共括得一千萬兩。北方各省比較貧瘠，雖然捐稅額不及江南，廣東那樣多，人民痛苦却並比較少。滿清政府劫掠大量金錢，各地物價立即騰湧，就廣東物價作例，洋銀一元不夠糴三斗米，銀四錢止夠買百斤柴。但滿清政府還說是「並無絲毫加取於民」，更繼續向人民勒索。

(二) 廣泛的水旱災

由於吏治的敗壞，官吏肆無忌憚的吞蝕款項：咸豐五年，黃河自河南銅瓦廂改道流入山東，從此經常泛濫成災，治河經費大部被官吏侵吞，堤工草率，潰決後以搶險堵塞等名義，領得額外經費飽入私囊，水災成治河官的利源。光緒二十二年山東巡撫李秉衡奏稱：「近來幾於無歲不決，無歲不歉，除額撥經費不計外，其另案之款，十年通算不下八百萬兩，而河工敗壞日甚一日」，河旁居民連年受害，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治河官吏製造的人禍。二十四五年，黃河大潰決，直隸的東南部，山東沿運河的西部都被決毀，災區極廣，淹死人口十六七萬，損失田地房屋不可數計。同時北方各省連年大旱，農民吃樹皮草根甚至吃觀音土以代糧食。例如災情較輕的江蘇北部，窮人出賣子女，女孩按容貌年齡，高價至多一千元，低價僅五十文。這種不忍想像的災難，身當其境的農民該是多麼慘痛！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春間，某些外國報紙已經說到，「今年順直一帶雨水極少，麥田盡稿，民氣頗為不靖。而山西自去年冬初迄今，更涓滴無之，撫心時事，屬勝杞憂」（「拳匪紀事」引西報）但滿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不肯承認有災，依然加緊搜括。

農民最忌恨
的人——享特
權的教士和
教民

咸豐十年即英法聯軍占據北京後二年，英法與清政府訂條約數條。法約第六條原語『仍准教士傳教』，當時充翻譯的法教士私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賃田地建造自便』一句。清政府昏愴糊塗，簽字承認。英美耶穌教士也就同享利益，到內地置產。這種卑鄙可恥的手段，是自稱『待人如己，勸人行善』的教士幹出來的，中國人民完全有理由驅逐這一群騙子出境。

法國對華商業極微，著重傳佈天主教作侵略工具。各國在華天主教士，爲要享受特權，都嚴從法國公使，因此法公使獲得天主教保護權。光緒十三年，德相俾斯麥感到『布教事業，於領得殖民地有大功』，扶持德教士在由京傳教。法國專有的保護權被破壞一部份。廿三年，大刀會殺德天主教士二人，德政府不再經由法駐北京公使交涉，直接出而強佔膠澳，滿足了十年來奪取殖民地的野心。中國人民完全有理由憤恨這種偽善地用傳佈基督教之名以掩護掠奪政策的教士。宗教侵略，在北方主要是天主教，在南方主要是耶穌教。大抵天主教的面貌最露骨更顯明，耶穌教比較溫和些。歷來教案多數由天主教發動。當然，耶穌教也不放鬆每一便於侵略的機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所謂『待人如己，勸人行善』的工作如下：

教士設立教堂，必需召集多數信徒。但中國人受儒佛道三教影響，雜拜鬼神，要他毀祀先神主及五祀神位，專拜一個外國上帝，却是極困難的事。因此教士招徒的方法，第一是照揚外國勢力，吸引那種不逞官吏嗾使被別村別族侵侮的人『投教』。這一類投教者，往往全村全家投奔教堂，依外力自衛或報仇，思想上似乎自認爲外國殖民，與中國脫離關係。第二是出錢收買窮極無聊的人『吃教』，買價不二，有的說『白銀兩兩』，(中西紀事引吳德之說)，有的說『給銀一百三十兩』。(魏源海國圖

志)，有的說「教士們發着大批的金錢，收買中國人民中間的無賴份子，來者不拒，總是隨時的或經常的發給金錢」（羅得克夫「義和團記」）。這一類吃教者，把「教民」當做一種神術（義和團起義後，山東主教允許以後教民指認不准寫教民字樣，是非曲直一聽地方官秉公訊辦），依外力詭詐善良，包庇辭訟，力量比舊紳士更大。第三是宣傳教義，得某些人的信仰。這一類人是真正「信教者」，在教民中佔極少數。事實上教堂是外國教士和投教者、吃教者共同組成的侵略團體。

教民由教士包庇，教士由公使包庇，動輒向總理衙門提出交涉，不滿足要求不止。另一方面，總理衙門飭各督撫「妥善辦理」，督撫飭各州縣「妥善辦理」，強迫人民吃虧了事。依據一些簡單的材料，足夠證實教士教民「無法無天」的暴行。

教士——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屈結結束，清政府擬出八條章程，向各國公使妥籌善後，以保「中外永遠和好」。它不敢過度揭發教士罪惡，但所舉例證，教士實是外國侵略者與中國劣紳，土霸，訟棍，強盜，騙子的混合體。總署「與各國駐京公使再三商議，均以原約未有之條，不能照允」。足見教士一切進行得各國政府的同意。章程要說：「教士自立門戶，遷徙中國法令，僭越權柄，猶之一國之中，有無數敵國而自尊自主者」。外國在各地方設立教堂等於佔領土地，招收教民等於募集侵略兵，這對中國是何等的威脅。教堂既是自尊自主的敵國，自然要對外侵略，有下列各種行為：（一）出頭干涉訴訟；教民犯罪，被官管押，外國教士便請釋放。例如：「四川教民婦女搗毀平民租項，反毀傷平民。主教者居然行文說情，教民婦女竟不抵罪」。（二）霸佔財產；「洋人愛某處房宅，其人不要，則第一無業奸民指為己物，賣與洋人，並串通書吏竊印文約，洋人即據為己有，驅逐業主」。（光緒二十二年總理衙門奏）。「紳民有高華巨室，便指為常年教堂，勒逼民間讓還。且於縣制有關之地。以及會館公所祠堂園境紳民所最尊重者，皆任情勒索，抵作教堂」。（三）侵犯主權，以一窮

最高官自居；如山東德教士自請巡撫，命令各官服從教堂的指示。媚外活膩的官員有矣；如貴州主教胡輝璋向總理衙門「保舉前任道員多文等，請予優獎」。不順從的官員有矣；如四川、貴州教士因教堂請撤地方官」。又如「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勒索，苛虐異常。疆建主教愛資執照，每張洋二十四元，良民有此，始免教士凌虐，奸民畜此，即可鄉里橫行」。侵略中國主權直到強媚外的總理衙門也說：「似此無理已極，情實難容」。(四)「淫兇恣殺；如「四川陝教士李國一案，實由教民逼人惡婚肇禍。李鴻章將正兇何彩正法，劉福擬絞。而教民殺死平民及經年姦淫獲殺首惡教民雖已蒙罪，終不到案。其司鐸軍輔臣糾眾毀斃國民趙永林等二百餘名。梅教士聲稱已赴外洋，不能查辦」。(五)勒索賠款；如「四川陝教士馮爾樂一案，業已鞫獲冉老五正法。有梅教士硬指紳士主使，濫勒賠銀八萬兩」。以上多是天主教士幹的事，但號稱較為善良的耶穌教士又有另一套傳教方法。聯軍統帥瓦德西所著「拳亂筆記」說：「關於英美教會事業，余實不能詳細批評，但余却深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即所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實常以服務教會純粹麵包問題。凡認爲賺錢的事業，無不兼營並進。余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不論天主教，耶穌教，他在外國侵略政策下傳入中國。即使有安分教士，總不能改變傳教的侵略性，何怪「百姓始而抱怨，繼而成恨，終日爲仇，各處人民不問天主耶穌有無區別，而皆指爲天主教也」。(總理衙門與各國大臣商辦傳教章程八條)。

◎教民——「入教華民大率敢類，一經入教，魚肉鄉民。教士每依爲心腹，恃作爪牙，一遇門毆，必相袒護，數十年來總理衙門辦理教案，從未見教士責罰教民之事」(光緒二十二年總署遞議教案章程奏)。教民本來多是「以教中爲遁逃藪」的莠民，罪犯，訟棍地痞之流，得教士之包庇，更使匪

案爲，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地痞紳士詭詐，或風氣受其欺侮，或強佔人妻，或誘使六淫，或復其應交業主延不清償，或錢糧應交公庭違抗不完納，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諉，或因小忿而隨路平民，種種劣爲，幾難盡述』（李東沅傳教論）。地方官不敢得罪教民，勢必「扶教抑民」，獄訟勸平民受屈，公費強迫平民添派（客項公費如差徭及公金項），教民往往拒絕攤派）。平民忍氣吞聲，受教民壓迫。光緒二十二年，總理衙門因「年來教案迭出，每歸賠償，累萬盈千，公家受累無窮」，特定新章，凡「教案賠償之款，由該督撫奏道及府廳州縣分年按成償還歸公」。這就是教案賠款裏地方官負擔，從此平民又增加兩重災難。第一，代官吏賠款；第二，地方官「規避賠償，諱民教鬥毆，妄釋民讎」（御史潘廣潤奏），調兵戕殺平民，使教民滿意以減輕賠償額。如碭山縣教民造謠，激起械鬥，江蘇山東兩省，藉口「大刀會匪滋擾」，派兵「會同勦辦」。殺平民三十餘人，一面賠教士七千餘吊完案。「教案之變端，皆肇成於教令之唐謬，必由有司抑民而袒教」（徐世昌陸民心宜願稟）。這正是說明了一部份的實情，因爲抑民袒教，應負主要責任的是充當外國奴才的滿清政府。

一般平民受教堂極野蠻殘忍的壓迫，不反抗不能生活，竟和團宣傳「殺了洋鬼頭，穩雨往下流」。「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在農村中成爲發動廣大羣衆的有力口號。

民教大衝突終究要爆發，這是無疑的。如果官吏與教堂完全一致，協力鎮壓民衆，爆發可能遲延一些。但政府和官吏事實上對教堂存在着深刻的猜疑，更預備發展教黨勢力的日益擴大而增強起來。太平天國滅亡後，不少反滿份子藏身教堂，特種砲藥。如浙江教民施鴻慈、潘阿士等本侍王李世賢部下，在鄉間訂製軍器，結集義軍，被劣紳告發，搜獲「妖書符印，語多悖逆」（溫州道上總署稟）。當時革命軍衆數千「南勢洶洶」官紳咸懼，急發潘二人。貴州冉石棟、宋玉山、廖神仙、譚元帥等「先會從賊（石棟開軍）受偽職，嗣入教中」（總署商辦傳教章程），安徽「白蓮教混入天主教」

專剪教外人頭髮，激起教案。尤其戊戌變法，耶教士李提摩太等居指導地位。在頑固派看來，教士包庇羈民，是可忍的忿怒，包庇「叛逆」，是不可忍的仇恨，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正好是誘導頑固派與義和團合作的基礎。

第二節 從義和拳到義和團

義和拳是舊式農民起義的許多秘密結社的一種，它是白蓮教的一個派別。

歷史上有兩個宗教，在農民起義中常起領導作用。一個是道教，一個是摩尼教，兩教又混合成各種秘密宗教團體。

東漢末，張角創太平道教，張陵創五斗米教，道教開始是農民起義軍的宗教。後來一部份為統治階級收買而馴伏，一部份仍在農民中秘密活動。唐末五斗米教主孫恩會起長生軍顛覆了東晉的統治。舊史書上所說「左道惑眾」、「妖賊創亂」，大抵是指道教徒準備或發動起義。道教徒自稱有奇術，能預知，在迷信落後的社會裏，這常是號召羈衆的有效方法。

公曆第三世紀，波斯人摩尼創摩尼教，用隋間傳入中國。第八世紀，回紇中（唐時住新疆吐魯番一帶）奉為國教。回紇助唐平內亂有功，摩尼教得在長安、洛陽、太原、江陵、南昌、紹興等地建立大雲光明寺傳教，摩尼教的主要教義說有善惡二神對立，一個代表光明，一個代表黑暗，教人崇拜光明與黑暗鬥爭，因此又稱光明教。教徒白衣白冠，死後禪葬。唐武宗禁止各宗教，後來各教解禁，摩

「僧教獨被永遠禁止。以後民間秘密結社的僧教（教徒稱事處吃菜人），白蓮社（又稱白蓮會），白雲宗、明尊教，都是摩尼教的支派。北宋末，摩教主方臘起義。這時候的摩教還保持濃厚的摩尼教色彩，教徒不飲酒食葷，不宴會賓客，不拜神佛祖先，止拜日月（日月合成明）。人死裸葬，不用棺槨衣衾。同教互通財物，稱爲一家人。俱另一方面，却和天師道（五斗米道）結合，教徒認張角爲祖師，被官吏捕獲，備受任何毒刑，終不肯說「角」字。元末，白蓮會首領劉福通奉教主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起義。林兒稱小明王，起義軍首領之一朱元璋建立明朝。白蓮會與佛教結合，專拜彌勒佛，旗色深筒紅色（劉福通朱元璋等軍稱紅軍，別部有白軍，青軍），與摩教不同。明末白蓮會蔓延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省，教主王森（河北河縣人）死後，其子王好賢及教徒徐鴻儒有衆二百萬，起義反明。滿清嘉慶元年，白蓮教首領劉之協等提出「反清復明」「官逼民反」口號，發動大起義，旗幟衣服用白色。嘉慶十七年，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天理會（八卦教）起義，震動教育李文成，坎卦教育林清聯合攻襲北京皇宮，謀奪取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起義口號是「反清復明」（李文成自稱大明天順李真主）允許成事後公衆每人得分地一頃。白蓮教，天理會都奉「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真訣，雜拜佛道兩教衆神；不專拜彌勒。

宋元明清都定重刑禁止摩尼教，因之支派極紛雜，傳授極秘密，南方有摩教、齋教、吃菜教，北方有白蓮、天理等教，名目更多。嘉慶時嚴補白蓮教，兩江總督百齡捕得教首方榮升等，百齡「令從其教者，俱降十字架又吞家肉一塊，即可免死，而方榮升及女尼朱二姑娘但求速死，俾生西方樂土，終不肯降食」（夏燮中西紀事）。照夏燮所說，「白蓮教即末尼（摩尼）之支派，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以同財同色爲其教法之綱領」。教徒「持齋誦經咒，不跨十字架，不食家肉」摩教徒互通財物，天理教號召分田地，這就是統治階級害怕的所謂「同財」。摩教中嚴公度母並稱，白蓮教起義首領

有齊王氏，李父成妻張氏，都能領兵作戰，違反婦女禮儀的舊例。這就是傳統宗教的所謂「同色」。摩尼教演化爲魔教，又演化爲白蓮教，原有教義愈演愈少，道教色彩愈演愈多。白蓮教在農村中流行，因爲他是魔、道、佛三教的混合物，雜拜各種鬼神。

天理教起義失敗，滿清政府大捕白蓮教，那彥成查出直隸懷慶石佛口王姓一族，世代到各省傳授大乘教清六門，方榮升就是王姓門徒（白蓮教主王森嫡孫人，石佛口王姓很可能就是王森後裔）。那彥成破獲的教門有大華教，清茶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教，好話教，一柱香離卦教，佛門教，白陽教，紅陽教。搜出的經卷有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真經，元亨利貞輪世經，迴背十王經，高老祖經，不分發覺的教門及經卷一定還不少。滿清政府殘酷鎮壓這些教門，按「叛逆」、「冷罪」傳教人誠處凌遲，斬，絞，充軍等刑。經卷被稱爲「邪書」，特派官吏「嚴密搜查，務令盡絕根株」。滿清政府對「邪教」的防禁是毫不鬆懈的。義和門是白蓮教別派八卦教的一個小派，它的特點是練習拳棒。那彥成早已「說明義和門拳棒，係離卦教之徒黨」。義和團有一秘密之符號，交戰時佩於身上。其符用黃紙一張，用硃砂畫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頭無足，而尖削，但有眉眼，頂上有四圓光。心下書「秘」字一行，其意若曰，我爲冷雲之佛，火佛在予之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上面左端書請天兵天將，其右端書請瘟疫之神（景善日記）。這個怪像很可能是魔教秘密崇拜的鬼神，所謂「冷雲」、「火佛」、「圓光」與摩尼教的「大光明」或有淵源。滿清嚴禁「邪教」（大清律例別規定禁魔尼教）。義和團無論在那彥成表揭裏，在京善日記中都有「邪教」形跡，然而它終於是成爲大運動，原因之一，就在滿清害怕義和團的勇敢戰鬥，從嚴禁轉爲利用。

(二)義和拳在戰鬥中擴大起來

天主教傳入中國，它被大多數人看作「如誘婦女，誑誘病人眼睛，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的邪教（海國圖志可為代表）。外國兵槍砲猛烈，但也被看作「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跌倒不能起身的直脚人（如則徐可為代表），這種怪說傳到農村，有奇術又有拳棒的義和拳很自信能與外國人對敵。天津義和團揭帖裏說「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兵法易，助學拳，要撲鬼子不費錢」。第二句說兵法容易，就是神仙助人學拳，足見義和拳在羣衆中取得信仰，主要由於他有神卷。

山東江北一帶，大刀會勢力極大，被稱爲「刀痞」或「會匪」，與義和拳等教門被稱爲「邪教」或「教匪」顯有不同。光緒二十一年，大刀會已作仇教活動。後來義和拳在山東取得合法地位，多數大刀會員參入，義和團與大刀會實際上合成一個「滅洋」團體。

義和團從「行蹤詭秘畏人知」轉到合法公開，是經過戰鬥才得到的。山東義和拳首領曹州人朱紅燈自稱明朝後裔，開始是揭「反清復明」的起義團體。官吏袒教抑民，受教堂指使，不論是非曲直，教民必勝，平民必敗，義和拳適應羣衆的義憤，「聚衆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刀森立，儼同敵國，動言焚殺，官吏莫敢誰何」。在拳民武力監視下，官吏只得「噤不敢言」或「用奇設法，和解拳教」。（勢乃宜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書後）。義和拳不但保護拳民，對平民也一律保護，「略遇不平，不惜殫命代爲伸理」，平民受教民欺壓，紛紛參加，抵制官吏和教堂的橫暴。公稱義合拳爲「義民會」。這種民衆自衛方法完全合理，官吏却認爲「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山東巡撫李秉衡、張汝楨派兵鎮壓拳民，毫無效果。例如平原縣拳民集會千人，開放大砲，抗拒清兵，清兵大敗逃走。光緒二十五年二月，清政府撤張汝楨，並派著名屠戶毓賢爲巡撫，毓賢前曾做曹州知府，一年中殺所謂「

匪徒二千餘人。政府認爲「聲名卓著」，升他當按察使，他見西太后自誇功德，說「匪已肅清，永無後患」。這時候任命這個屠戶做巡撫，目的顯然在大殺山東拳民。毓賢派濟南府知府帶兵「查辦」，列陣戰鬥，被拳民殺死數十人，他不敢向政府請援，因爲說過「匪已肅清」，又不敢向拳民攻擊，因爲每戰必敗。朱紅鏡要吸引反致羣衆加入義和團，改提「扶清滅洋」口號，勢力愈益擴張。毓賢正在爲難，恰巧戊戌政變後，西太后提倡辦保甲團練，毓賢出告示改稱和拳爲「義和團」，表示承認爲民間團練。義和團立「扶清滅洋」及「毓」字大旗，可以公開活動，各縣遍設拳廠，在平縣八百六十餘莊，拳廠多至八百餘處。運河以西地區（水災嚴重地區）尤其發達，全省農民大體被拳廠組織起來。當時義和拳運動「僅僅想強迫教士退出中國，教徒脫離教會」，所採方法普通是恐「嚇」，最嚴重的不過近乎「虐待」，並無傷害人命，毀壞教堂的行動。傳教士却認定拳衆運動是一種「叛逆」，鼓勵教民準備武裝衝突，常常無緣無故的侵犯義和拳，一面誇張聲勢，首先是美國教士向駐京美使發電報告說：「搶劫縱火及暗殺之事，有增無已，若非四公使館聯名要求停止此種情事，則在應莊、臨清與濟南府之美人，其形式極爲險惡」。其實事情並不如此。應莊傳教部週年報告明白指出「雖時有可怖之恐懼，然絲毫無生命之傷害」。臨清傳教部報告也說「約三分之一的基督教徒，蒙有損失，總計亦不過四百三十餘元。個人之傷害未見發生。居臨清之某基督徒，有一子暨一妹夫均爲拳衆所擄，兩人之耳皆爲拳衆割去」。輔耳自然是強暴行爲，但證明拳衆並無殺死教民的意圖，美國教士有意擴大事態，美公使康哲根據擴張的報告，也就壓迫清政府撤換毓賢。十一月，清政府命令撤換毓賢，使用更大的屠戶袁世凱做山東巡撫，要他來完成大殺義和團的血腥任務。毓賢是絕對排外的頑固派，在軍事鎮壓失敗後，可以在「扶清滅洋」的共同點上被迫承認義和團爲合法團體。袁世凱是絕對排外的洋務派，他擁有強大的私人軍隊，殺人是他的長技，他到山東，義和團陷入血海之中了。

袁世凱到山東，肥城縣偶然發生英國教師伯魯克被殺案。在山東舉國整個的運動中，外人爲拳衆所傷害的止有他一人。在一九〇〇年（庚子）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外人在中國爲拳衆所殺害的也止有他一人。這說明義和團行動不會超過「恐嚇和虐待」的範圍。教師博特在他的報告中，會說這次的事變，實有偶然的成份，英使館派領事甘伯樂到山東觀審，在他的筆錄裏也說「伯魯克被殺與被審，是六個人（據袁世凱奏報僅五人）所做的事情。因爲他的兄弟和家中其他的人，在最近拳衆與官軍衝突時，都丟失了性命。在伯魯克被捕後，他們曾攜此俘虜遊行了幾個鐘頭，絲毫沒有想到如何作第二步的處置。最後，伯魯克斷其束縛，企圖逃脫，在追趕中他被殺害了」。這不是也承認是偶然事件麼？袁世凱却當作媚外資本，奏稱「平陰、肥城兩縣匪徒聚衆滋事」，故意把案情擴大。被捕諸人中兩人處死刑，一人終身監禁，一人監禁十年（在獄中死去），一人徒刑二年，地保四人革役，永遠不准復充。中國人民的生命就這樣不值錢地作爲伯魯克的抵償品了。他覺得還不夠，罰出事地方居民銀五百兩，豎立一座紀念碑，又給教堂賠償銀九千兩，地五百畝。可是英國公使對這種嚴重的科罰，還不满意，他認爲鄰近的兩個村保，也應該受罰，其實該事人與伯魯克並未經過這些地方，却要負「不竭力救阻」的責任，除了帝國主義者蠻橫自大，把中國人民看作奴隸，再沒有其他理由可說。

有帝國主義無限的貪婪，就有袁世凱瘋狂的屠殺來迎合外國主人。他定出「嚴禁拳匪暫行章程」八條，重刑督促官紳、吏役、保甲長、家長查拿拳民，又提倡告密，提被告人家產一半或全部充實。無論軍民人等，凡有練拳或贊成拳衆者殺無赦。他這種種殘忍的壓迫，激起義和團普遍的武裝反抗。袁世凱當作主要力量的新建陸軍，在拳衆反抗的浪潮中變成渺小不堪，他又奏准擴充新軍馬步砲隊二十營（每年餉銀九十八萬兩），又聯合青島德領軍隊，各地教堂武裝，協力攻擊義和團。地方官捕獲拳民，「堂堂用刀殺之」，連偽裝的審判也不用，說是「不忠也不孝，不義又不仁，干犯十大惡

，剿滅何足論」。到底干犯了誰呢？原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叫做「干犯十大惡」！在戰鬥中，朱紅燈戰死，義和團被消滅十餘部。以東光縣為例，方園十里地面，沒有一株樹上不掛人頭，沒有一個人頭上不包紅布。他的軍令是「見匪槍斃之」，又一軍令是「如匪至即放砲，必不放答，若匪至不痛擊，則將領以下概正法」。軍隊洗鄉村，鄉平拳廠，都是軍令及「嚴禁拳匪章程」規定的「合法」行為，無數拳民與非拳民冤屈喪命。青島附近即墨、高密、膠州的義和團與德軍多次接戰，德軍虐殺鄉村居民，稱為「嚴辦示儆」。袁世凱給青島總督電報說：「凡亂匪阻撓礦工之事，我必設法以乘除之，所謂保全二國太平之局者，我二人實有同心也」。他和剛在三四年前強佔青島的德國強盜「實有同心」，自然看中國人民是仇敵。「拳匪紀事」有一段「山東友函彙錄」，其中一函說：「東撫袁慰帥不助拳匪，嚴懲土匪，（大刀會），為東民所恨，皆有欲殺之勢。民間謠云「殺了袁頭蛋，我們吃好飯」。並在撫署照牆書紅頂花翎之大匾，伏於洋人營後，以示痛恨。故慰帥防範甚嚴，有於臥室外密護鐵網之說」。這樣萬惡的民賊，雖然德國直接給他武力援助，還替他宣傳所謂「袁世凱神話」，把極殘酷的屠殺手段描寫為「剛勇的武官所造成的奇跡」。但並不能阻却民衆的憤怒，一部「義和團聯合大刀會繼續在山東戰鬥。庚子年初春，乾字團，坎字團從山東北部落入直隸境向天津方向謀發展。

直隸東南部以大名府為中心，義和團勢力與山東同時高漲。光緒二十五年，一個官員敘述冀州拳民情形說：「阜州三月以內，即有教案兩起，雖皆未及決裂而了。實皆權宜處之。像拳黨衆多，一呼百喙，動輒集衆千百，洶洶而來。無論欲拿不得，且實拿不勝拿，倘或冒昧從事，彼謂官長袒護敵民，激成衆怒，必至不可收拾。即使立刻請兵，亦綽綽不濟急。州縣限於權力，故不得不暫顧目前，以無事為禱」。這是一般地方官率直的自供，在民衆風力面前，官吏不敢袒護敵民，顛倒是非，所謂「權宜處之」，實際是比較公平的處置。教士當然不肯退讓，壓迫地方官「非將拳匪立拿正法，驅逐淨

盡不可」。喪盡民族意識的「教民氣節盡甚，謂教士已調洋兵即可來此，與義和拳打仗」。另方面「拳黨聞之愈激其怒」。『景州境內，拳場亦有數十處，實防不勝防』。地方官處在「境內有教堂教民之村共百餘處」與「拳場亦已有數十處」，兩個勢力的中間只好藉口病重要求撤任。這說明直隸義和團與山東一樣，也止是禦侮自衛，強橫逞兇的是教士教民，不是義和團。

山東義和團入直隸境，立即與多數民衆結合起來，天津，保定，通州（運河終點漕米倉所在地）成爲義和團的中心地區。直隸總督裕祿的態度很強硬，庚子年正月，他出了告示說「近日無知愚民，感於外來匪徒持符念咒，降神附體能禦術砲之說，輒私立義和拳會，練習拳棒，蔓延各處，以仇教爲名，滋事擾害。迨兵役捕拿，猶敢恃衆抗拒，更屬目無法紀」。他提出嚴厲辦法，「對設立拳廠煽惑滋事首要匪犯，務必獲拿懲辦，斷不能俾逃法網」。對「被誘入會習拳者，倘猶不知悔改，即由地方官會同捕拿，決不稍從寬貸」。直隸布政使廷杰也出「嚴禁邪教」告文說：「近來義和拳匪假託邪術惑衆滋事，並拒敵官軍，不服彈壓，實屬罪不容誅。各州縣已將拿獲之匪首，稟請督憲批示，就地正法。該匪首等甘心爲亂，目無法紀，死有餘辜」，足見裕祿等人認義和團是「邪教亂民」，毫無同情的傾向。義和團對這個殘酷壓迫，一面宣傳「扶清滅洋」，號召廣大羣衆入會。到三月初，「直隸北境幾於隨處皆有，應募入會者亦實繁有徒。若輩均係一八八九年間與天主教爲難之會匪，即著名的天津教案」，因經法國使臣逼令華官將其首領殺戮，致懷恨在心，時思報復」（上海字林西報載北京專電）。到四月下旬，「直隸各處其勢甚熾，較前更爲猖獗」（北京專電）。一面武力攻擊教堂，並抵抗「官軍」的「剿辦」。三月任邱縣義和團與「官兵開仗，官兵爲其所敵，統帶官受傷甚重，知府亦受刀傷」。四月，裕祿派兵救涞水縣教堂，與拳民開戰，義和團擊殺督隊官副將楊某。涿州拳民二萬三萬人佔領縣城。豐台車站出賣廢票，訛詐旅客，義和團燒黃站房，連西太后的「龍車」一併燒掉。

裕祿無力控制直轄省的政權，各地四人相率逃來天津，他的軍隊削弱到止能「沿途護送」，不敢出發攻打義和團。天津是義和團中心之一，二月下旬「天津通城，貼有匿名揭帖，內中字樣各有不同，大抵恫嚇人民殺害洋人，並定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外國租界」。三月「津郡城廂內外，時有幼童演練義和拳」；又有幼女演練紅燈照」。乞丐組織沙鏡照，竊婦組織青燈照，兵士不少參加義和團，裕祿在羣衆大運動中，控制不住天津城，例如「豐台毀路之役，當場捕獲八人，解繫津獄。又自津西楊柳青捉獲傳法首領三人，亦置之獄，陸有一人赴縣署，自稱爲義和團，奉大師兄之命，偕同獄中諸師弟，擲刀擲筐，昂然詣獄，縣吏竟聽其自由來去不稍阻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同時外國不斷施行壓力，要他消滅義和團，他只好像德賢那樣被迫承認「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爲合法團體，藉以保持本身的安全。五月，裕祿「以敬體禮」迎「師（海）津一帶義和團」首領張德成、曹福田入天津城。義和團在直隸取得合法地位，勢力更大進一步，津城「旬日之間，神壇林立，業治鐵者，家家鑄力，丁丁之聲，日夜相續。官不敢禁挾板，伍禁冶鐵，示甫下，匪紛集縣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從之，冶爐徧徇巷矣」，（拳變餘聞）。「傳記載都斥責裕祿「縱拳釀禍」，其實裕祿何嘗不想殺滅義和團，但形勢不許他不向羣衆屈服，缺賢，裕祿，西太后都不能反抗這個形勢。

(三) 組 成義和團 的羣衆

義和團運動是廣泛的羣衆反帝運動，領導這一運動的是迷信團體義和拳，因之形式上表現極濃厚的宗教色彩。參加運動的羣衆，唯一目的在「滅洋」，如果領導者不是義和拳而是其他非迷信團體，也同樣會發動起來。

農民——義和團羣衆極大多數是農民。「拳匪紀事」說「入境之人，初惟鄉村愚民。平時受人欺壓，無可伸理，一聞匪說，冀精神道以凌人，一洩憤憤，乃相率乘其農業紛紛入城，甘爲匪類」。除去那些詭譎的詞句，基本上這種觀察是合於事實的

農民受盡各種欺騙，剝削，災禍，看出自己的仇敵第一是洋人。凡是洋人所在的地方，從內地教堂到租界，義和團都決心要消滅他，對城市取進攻的姿勢，不停留在鄉村裏。一個知縣官談述義和團向涿州集中的情狀說：「余於四月二十日（庚子年）到景州，即聞往北州縣皆有義和團，與軍敵人為難，並不傷害行客。二十九日到雄縣，則沿途皆有，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紅帶，首船用紅綵，亦有束黃帶用黃綵者。旗書「義和團」字樣，扶清滅洋」字樣。領隊之旗有次（三）字、乾（三）字之分，中皆用刀矛。水行、陸行皆向北進發。其中三十歲以上甚少，二十歲以下十二三歲居多。途中相遇，秋毫無犯。初二日許新城前進，見義和團紛紛往北。申到涿州，城上皆紅巾，黃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蟻，城廂內外幾二萬人，余見之不免心悸」。這樣有自覺紀律的出於志願的生氣蓬勃的青年農民隊伍，雖然在思想上，一方面是迷信落後，但另一方面自我犧牲，純潔無私，不畏強暴，民族自尊的偉大精神，實在是值得尊敬。他們在整個運動中，始終保持着這種精神，就是反義和團的記載也不能不承認「拳匪聚眾時，皆面多菜色，有黃團紅團之分，皆用巾帶為識別。手用長矛或徑用竹竿，年長者約念歲，最幼者只十二三歲，前被官軍聯軍擊死者皆是輩也」（拳匪紀事）。「面多菜色」，說明義和團在城市中不會腐化，「手用長矛」，說明義和團勇敢不畏死，因為農民是義和團最主要的組成部份。運動才表現出特殊的堅韌性。

城市小手工業者及水陸交通運輸工人——運河漕米的停運，津滬輪船的暢通，京津、津榆、膠保鐵路的告成，大量洋貨布疋的輸入，破壞了舊式的工藝和交通運輸，失業工人至少在百萬人以上。他們多數是天津、通州，保定，北京城內或附近的居民，熟悉都市中情況，義和團能進入都市，並能迅速發展，壓迫裕紳、西太后一類當權人向義和團屈服，工人響應農民起了決定的作用。

兵士——破產失業的農民、工人及貧民、亡命者流，在社會上生路斷絕，往往投營當兵。參加軍

隊後，沾染軍營習氣，多變養成破壞性。隨處他們原來是被壓迫的，所以同情義和團，尤其是董福祥軍，滿清把它當作滅洋的主力軍，軍官士兵很多加入義和團。又因為他們現在是專事破壞的職業兵，所以紀律毫無，燒房屋，搶財物，凡義和團運動中被人藉口指為暴亂的事件，大抵出於軍隊（包括反義和團軍隊）所為。雖然如此，軍隊有槍炮武器，對外作戰即使遠不及農工那樣勇敢，到底不失為農工的重要支援者。

婦女——義和團組織婦女團體，說明運動帶着廣泛的羣衆性。幼女團體爲紅燈照，老婦團體爲黑燈照，婦人團體爲燈照，婦婦團體爲青燈照，不入團的婦女也作燈照「法」令，七日不梳頭，不纏足。團裏唱着一首歌：「婦女不梳頭，飲去洋人頭；婦女不裹足，殺盡洋人笑呵呵」。用意在於動員每一婦女參加運動。紅燈照最盛行，企圖飛到外洋燒燬外國城市。天津婦女首領有黃蓮聖母，董二姑，劉三姑，所謂董二姑、劉三姑，說是董福祥、劉永福的妹子。董福祥「立誓滅洋」被稱爲董大帥兄，在義和團中頗有聲望，劉永福是越南沈法，台南抗日的英雄，爲南北民衆所尊敬，義和團假託董劉名義，藉以號召。當時幼女紛紛練習法術，「父母不能禁」，太平天國以來，婦女再一次表現了政治鬥爭的熱情。反動派說，造作卑劣謊言，惡意誣毀，全不可信。

以上都是構成義和團的主要羣衆，主體自然是農民。此外還是不少另一部份人加入義和團，這個人多是別有企圖，乘機謀私人利益。

乞丐——天津城內外乞丐，組成沙鍋照。借募餉名義，沿門強索。

流氓——流氓比乞丐更惡劣，紛紛設立神壇，聚集同類，自稱義和團，欺詐強奪，多屬這一類人所爲。

滿人——北京滿人，不分男女老少，大都加入或同情義和團。「宮中內侍及年老宮女等亦不時操

總幹事」。諸人積極練習，並不作戰，爲了保護自己的寄生特權，希望義和團替他們「扶清滅洋」。

義和團有乞丐流氓滿人加入，在城市中聲勢更大，但不長行爲也被這些人帶來。

義和團分八卦，「其蒙首圍腰之布，分紅（坎字圍）黃（乾字圍）黑白四色，然互相猜忌，並不聯絡」。它是教門紛歧的秘密團體，不可能有實際的首領及統一的行動。各派對「滅洋」意見一致，對「扶清」却有不同的主張，大體可分反清，扶清，保清三類。

義和團白色一派是白蓮教正傳，首領不知姓名，在運動中仍保持半秘密狀態。當義和團圍攻北京公使館形勢緊張的時候，白蓮教準備推翻滿清統治。長崎報載日公使西德二郎密信說：「據之內外有白蓮教匪，居永定門附近飯店之內，近增至二千，以袁君殺官篡位爲主義。其名籍爲官搜獲，殺其七十名。此匪聞撥九月舉事，人心更爲惶惶。該匪胆敢以紙紮成天子及國要肖像至英市殺之」。白色義和團人數不多，破壞後不見再起活動。

扶清類——朱紅燈派：

朱紅燈首創「扶清滅洋」口號。紅燈死後，義和團在直隸大發展，最著名首領有李來中。據傳或說：「該團匪目李來中，爲直隸團匪中最著名之頭目，即靈福祥手下之武弁也」。或說：「團匪頭目名李來中，係陝西人，聞未滋事前，曾由靈軍門引至內廷，經召見兩次」。或說：「據言李來中自北倉失守（七月十一日）後即已逃避，不知所往」（以上據靈福祥紀事）。或說：「拳匪賊雲集京師，更有靈福祥義弟陝人李來中者從中指揮，由是兵匪遂合而爲一，作爲與髮匪直無二致」。西巡迴鑾始

未諳)。義和團與董軍合攻使館，直到騎軍入京為止，攻擊始終不懈，李來中逃避說不可信，他是最引人注意的人物則是事實。東南各省推劉坤一等聯名電奏說：「拳匪若真係直隸義民，何以陝西李來中爲首」。董福祥敗退到陝西，上書斥責榮祿說：「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鈞諭，囑撫李來中，中堂欲撫拳民，則辭薦李來中」。足見李來中的總首領地位，爲衆所共認。董軍兵士全是陝甘人，又多參加義和團，李來中以義和團首領地位，影響董軍兵士，使成爲運動的支持者。董福祥是榮祿的總信走狗，榮祿後來竭力反對攻使館，董軍却自動攻擊，不肯停止。榮祿不能控制董福祥，董福祥不能控制兵士，可以推想李來中所起的作用。天津方面首領張德成，出身船夫，又一首領曹福田，出身「游勇」，曹代表城市中羣衆，自稱「習理」，（本任屬張德成），靜津一帶義和神團。張代表農村中羣衆，自稱「天下第一壇」。曹態度較強硬，張態度較溫和。直隸境內沿運河一帶團衆統歸二人管理。義和團宣稱扶清，行動上也確表示出以對等獨立的地位來扶助滿清，不受政府的約束。李來中所部「西直隸及陝西來之團匪，與端王（載漪）兵士自相攻打兩次」。反抗載漪的干涉。裕祿召張德成來天津，德成怒罵：「我非官吏，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裕祿自認錯誤，「以敵體體相見」。曹福田私室供「聖上楊老師」木主。那桐，許景澄奉命往天津求和，阻洋兵入京，被豐台團民捕獲，二人再三哀求，團民答稱：「吾國民知有祖師之命，不必問朝廷之命」。剛毅，趙舒緝到涿州，團民勒令對祖師跪香並承諾撤革直隸提督聶士成。這都說明義和團崇奉本教祖師，不認自己是滿清的奴僕。西太后逃亡出京，被義和團向聯軍獻媚，景廷賓提出「掃清滅洋」口號，成立反清義和團。從「扶」轉到「掃」，實際是恢復義和團的舊面目。

保清類——滿洲貴族：

載漪、剛毅、徐桐（漢軍旗人）等頑固派首領，妄想利用義和團，排除公使館中外勢力。清政府

特令載勳、隨發流離北京、天津一帶義和團，又嚴令載勳等查明「偽義和團，照土匪之例即行嚴辦」，力圖約束「義和團真心向背」（六月十號），但並不生效。滿洲貴族，能領導的團家，止是一輩北京旗人，他們與清政府利害一致，保清就是保自己的特權。

上述三類以外，還有不少投機者，設壇聚眾，混入義和團，例如天津土棍王某，在城內三條廟設壇，自稱壇師，招集流氓地痞，勸捐富戶四千餘兩，披髮潛逃，被外縣團拿獲，腰斬兩段。直隸候補道譚文煥自稱義和團軍師，派司廷雅委文煥為統領官，帶兵搶劫，得銀數十萬兩，後被聯軍捕獲，囚刑願以五萬兩贖命。文煥的兒子鐸三，立壇自充頭目，強佔婦女數十人，逃到涪州藏匿。這一類人並無政治目的，止是圖個人私利。

第三節 義和團的志願與紀律

義和團降神唸咒，盲目排斥洋人、洋教、洋貨、洋書、洋務人員，凡帶洋氣的人和物，一見「條不可退，必毀殺而後快」，這是愚昧甚至反動的一面。但從義和團的志願與紀律說來（材料全取參團紀事），它是舊式組織的反帝運動，在當時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把義和團描寫成「暴徒亂民」，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殖民地奴僕們的有意誣騙。

(一) 義和團的志願

義和團第一志願是廢除和約（不平等條約），庚子年四月初，北京團民傳言溫泉山深洞中，搬出前明劉青田預言石碑一塊，內稱「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指出和約是民冤的根源。又稱那些「上行下效」的官吏，「羽翼洋人，趨炎附勢，肆虐同羣」，指出大小官吏幫助洋人共同「虐害人民」。義和團第二個志願是驅逐外來宗教，天津各處貼着匿名揭帖，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乃滔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當要實現兩個願望，號召九月九日起義，「挑鐵路，把鐵砍，旋再興填大輪船……一窩鬼子全殺盡」。他們以爲這會使「大法國，心阻寒，英告俄難勢蕭然」。這自然是可笑的思想，但三個主要侵略國却不認錯。對新起的侵略國日本，義和團要用紅燈照「遠赴東洋，索還膠地並二萬萬之款」。天津、北京大書院附近貼有義和團警告各國報的揭帖，明白表示反對洋人的原因說：「只因四十餘年內，中國洋人到處行，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准有洋人，除將逐回外國去；免被割據逞奇能」。事實上在五月二十一日各國海軍攻陷大沽砲台以前，與其說義和團想殺盡外國人，不如說想逐回外國去。天津義和團對教堂揭示這樣的警告：「若爾耶穌教各教堂知悉：今限爾一體拜內，教堂內之人，悉行離開。各教堂均由本會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須用術，將爾各教堂房屋悉行折毀，縱火焚燒，彼時悔之晚矣」。這種恐嚇性語句，不過拆燒房屋爲此，並無殺人之意圖。上海字林西報也承認這個事實，它說「北省人心騷動，日甚一日，其華人中之下等者尤甚。一見洋人即行辱罵，然此尚無關緊要，惟於六月十七號一開大沽砲台被洋人攻取之信，更恨洋刺骨」。帝國主義所謂「下等者」的人民，實際是高等的愛國者，義和團自此以後，才實行殺戮洋人，表示對武力侵略的報復。它雖然戰鬥殘酷，廢除和約及反抗宗教侵略的志願是光明正大的。

(二) 義和團的紀律

純正的義和團有嚴格的紀律。「立壇之始，有願授壇者須有切實的保人，且須向壇跪香立誓。有不願意者亦不强」。『向神牌稽首，誓無改悔』以後，老師口授戒條：「毋貪財，毋好色，毋違受母命，毋犯朝廷法。滅洋，殺賊，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團員絕對不敢破壞戒條，因爲犯戒就「符咒不靈，神不附體，不能避槍砲」，上戰場的團員都是純潔的

盡工劫奪，再加謹慎的約束，成條完全生效，其次曹錕田頌除出發，沿路擄錢，除衆以爲老師作法，急搶取收錢。離戰場一二里，福田停隊間有人拾錢袋，除衆各出所拾，證明留心學法。福田說：「吾道最戒者貪財，今爾衆見錢即拾，神必不附，臨陣必傷亡」。義和團始終重視紀律，就是屠殺義和團的西太后也不能否認。十二月光緒帝罪己詔親自供：「溘添拳匪既焚堂毀路，急派直隸軍彈壓。乃拳匪所至，漫無紀律，殺虐良民，而拳匪專恃仇教之法，不極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百姓皆畏兵而愛匪』，究竟誰是匪，不是很清楚了麼？

義和團嚴守紀律，生活極苦，天津國民每日兩餐，『令有力者施送米麵，又向富戶勸捐銀米』。戰陣上食糧也自有變餅、綠豆湯。北京國民生活，由地主供給，貴族、大官、富農捐資設壇，自充壇主，耗費一些錢米，求得國民保護，往往一壇多至五六壇、十餘壇。凡義和團所在地方，首先設立神壇，組織國民和民衆。每一壇至少二十五人稱爲一團，每團推舉一人爲團首，指揮全團。各國劃定管轄地區，住戶必須聽從號令。國民白晝巡街，夜間巡更，盤查奸細及形跡可疑的人。凡屬國民而有「菜色」，每日所得止夠不致餓死的食物。正月對各國宣戰後獎勵義和團上諭承認：「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槍砲相迎，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替給童子，亦復執干戈以衛社稷」。這樣英勇刻苦的義民，出死力反抗侵略軍。但僅僅發給糧米二萬石，供義和團食用。據宣戰上諭說：「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二萬石平均分配，每人所得不過幾升米」。

義和團認出第一敵人是洋人，第二敵人是官吏，戒條規定要「滅洋人，殺賊官」。天津方面，義和團入地方官衙門示威，「開獄放囚，在總督、道、府、縣大堂設壇。途遇道、府、縣，皆叱令下與免冠、司、道、府、縣衙門皆不敢冠帶，不敢擺儀仗」。凡官必賤，就是凡官皆可殺，義和團表示欲

獲的姿勢，但並不真殺以免破壞。這些賊官自裕祿以下順從「法」令，搗送糧米，請求保護，義和團也派人護衛，防止意外事件。各城門各官署，都歸團民看守，嚴查出入。不得允許，任何官員不准送眷屬物件離津。北京方面，義和團有董福祥軍支援，威力更大。宣稱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龍指光緒帝，虎指貴族，羊指京官，「謂京官可勿殺者只十八人，餘皆可殺」。西太后不在可殺之列，因為她是頑固派首領，與義和團思想上有共同點，不過義和團並不因此服從她的命令。西太后將出逃時，光緒帝對王大臣埋怨說「義和團亦不是好百姓」。西太后立即阻止說：「皇帝與你們講的話，你們不准說出去，如有走漏以致變生意外，將惟爾等是問」。她知道自已不能控制義和團。五月底，義和團等領袖和團六十人入宮，大聲呼噪，要「殺洋鬼子徒弟」（光緒帝）。西太后是久經歷練的反動頭子，聞聲出來大罵載漪，又殺能和團首一人，居然保全了光緒帝。不過，皇宮以外她無力操縱。六月，義和團殺副都統盛恆家屬，清政府殺義和團五人，義和團殺盛恆家屬。他想教董福祥壓服所部兵士，爾祥答稱：「如斬甘軍一人，定然生變」。當時北京與天津一樣，各城門，各街路以及多數貴族、官僚住宅都歸義和團保護監守，西太后不敢積極反對義和團，怕義和團「生變」。滅洋人轉變為大規模的殺賊官。

(三) 義和團的勇 敢精神

義和團運動僅僅是一種無意識的迷信行為，那是

志願和紀律產生無比的勇敢，義和團員手執刀、矛、木棍、竹竿、石塊與帝國主義軍隊正式對敵，一方面顯示迷信愚昧，同時也顯示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這種精神的來源，主要是對外國侵略者的仇恨，迷信止能起輔助作用；因為戰場上屍骸如麻，任何愚人也會逐漸體驗到神咒不靈，如果沒有極深厚的民族仇恨作基礎，義和團首領豈能一次又一次的鼓動團員們上戰場。

義和團運動僅僅是一種無意識的迷信行為，那是

繼舉，依據下列兩個電報，可以推見一般。「拳匪遇有戰爭，楚河頓降，聯軍舉以俘擒，死者如風掃草。乃後除存區區之望，尙不說死，倏忽間亦皆中彈而倒，西人皆深憫（？）其愚」（六月初九日威海衛電）。在戰場上有進無退，有死無生，還不夠說明義和團的勇敢，它還有源源不絕從各地方奔赴戰場的堅毅氣魄。「天津接到探報云，官兵聞各國大兵前來，頗爲震動，潛逃者不少。惟團匪則日見其多，大約俱少年無知之輩也」（七月初二日德國報載烟台電）。「日見其多」正說明義和團運動是民衆人民戰爭，而不是所謂「邪教作亂」。

第四節 西太后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

如果滿清政府（后黨獨佔的政府）對帝國主義及一部份統治階級當時沒有深切的矛盾，義和團不可能發展成一大運動。從利用矛盾一點說來，「扶清」是有策略意義的口號，止有「扶清」才能進入天津、北京對「洋人」直接作戰。

帝后對立是后黨政府對外對內各種矛盾的總根源，戊戌政變後，強烈的發展起來。

戊戌變法失敗，中央政權完全被頑固派佔奪，光緒帝禁閉在宮中，止存皇帝空名，但對頑固派還是一個大威脅。因爲西太后死後，政權當然歸溥光緒帝，頑固派按叛逆治罪，是無可如何的。要預防這一個危險，除了從速謀害或廢棄光緒帝，另立帝位繼承人，再不能有其他生路，還在頑固派看來，雖是生死存亡問題，必須求得解決辦法。

頑固派起初採取謀害法，宣稱「帝病重亟」，駐京各公使到聽醫醫術，並派法醫生入宮驗看。謀害法不得行，改取廢立法，宣稱「帝久病不能看天下」，密電南省各督撫，徵取同意。曾觀察風色的張之洞首先贊成，劉坤一、岑春煊表示反對。劉富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二句，發生頗大的

效力。他這湘系軍閥首領，幕中有維新派張謇等人代爲策劃，事實上等於帝黨聯合軍閥，對后黨提出抗議，頑固派不得不予以重視。康有爲在海外鼓動美洲、日本、南洋羣島保皇黨華僑紛紛發電「請皇帝還安」並要求歸政。梁啓超在日本辦清報，揭發后黨醜態又不遺餘力，又不斷的將光緒帝歌頌「聖德」。剛毅到廣東搜刮財物，得清報報呈西太后，頑固派感到光緒帝並非孤立。這些，都阻礙了廢立計劃的實現，但是重大阻力還在各國公使館方面。

廢立計劃受阻，激成頑固派烈火般的仇恨。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榮祿向西太后獻密計，請「立大阿哥（帝位繼承人）」，徐大帥，還在頑固派確已認爲無可議的最後辦法了。西太后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儀爲大阿哥，預定明年（庚子），元且光緒帝行讓位禮，令李鴻章運動各公使入宮慶賀，不料又遭各公使拒絕，上海紳商經元善等號稱三千餘人，維新志士蔡元培、黃炎培等及海外保皇黨僑僑號稱數十萬人，紛電反對。清政府捕緝元善，元善得英教士李提摩太保護逃往澳門。頑固派的極度憤怒，從下列事實可以推見。

戊戌年十月，清政府派特務劉學詢、盧寬託名「游歷外洋，考察商務」，實際是指使刺客，謀暗殺康梁。一年以後，清政府派出大特務李鴻章爲兩廣總督，專任鎮壓保皇黨。這個大特務到了廣東，對毀康有爲祖墓，懸賞十萬兩捕拿康梁，嚴禁保皇黨報紙，懲辦閱讀者，電陸外國公使查禁保皇黨。尤其殘忍的，凡保皇黨徒的家屬，一體治罪。一個姓梁的書徒，有祖母年九十餘歲，也被捕入獄，受虐待身死。從滿洲奴才李鴻章的瘋狂行爲裏，可以看出他的主人如何仇視保皇黨，也可以看出如何仇視更有力的保皇者——駐京各公使。

義和拳在山東提出「扶清滅洋」口號，正是頑固派恨極外國人計窮力竭的時候，鎮壓對義和團壓迫（雖然是被迫的），清政府上諭（二十五年十二月）承認人民有極「習技藝以自衛身家，聯村築寨

保爾里」，却都含有利用義和拳洩忿的意圖。

清政府對義和團有四派：(一)反對派，(二)贊成派，(三)反覆派，(四)動搖派。

這一派人堅持半殖民排統治階級的穩固立場，對內嚴厲鎮壓，對外屈辱退讓，絲毫不許動搖這個傳統方針。京官以袁昶、許景澄為首，外官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為首，這些都是滿洲的也是帝國主義的領袖

——反對派

袁昶許景澄等

奴才，在反義和團運動中，充分表現他們的殘忍性。袁昶是個維新派叛徒，西太后敗，「袁昶在戊戌年會以康有為之陰謀奏予知之，此人甚好」(景

日記)。許景澄是准東洋務人員，幫助李鴻章秘密出資東三省，這顯明陰險小人，聯名上了三次奏稿

，肯定「拳匪」確是「叛逆」，比「咸豐年間之髮匪、搶匪，嘉慶年間之川陝教(白蓮教)匪」危險

甚大。他們斥責「扶清」口號說「若能扶之，即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切實指出練治

器械猶忌人民的卑劣心理。他們要求西太后調董福祥軍出城，派榮祿組織精手、刀斧手十餘隊，隨時

城門，分路搜捕「匪徒」，「凡遇頭戴紅布身繫紅帶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即欲匪首

所謂老師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擒斬該匪，賞銀五百兩，餘匪計首一級賞銀百兩」。西太后如

果採用，不是北京變成血海，便是義和團推他滾清，她到底不敢輕試，在義和團壓力下，把袁許二人

斬首，袁許是京官，雖有免死，並無實力，想殺人却殺了自己。外官李、劉、張、袁等雖有軍隊，但

勢便不同了。他們裝作「拳匪目無朝廷，枉為亂民，即不與各國開釁，亦應痛剿」。每致電駐京公

使，請求各國不開釁端，中國乃能專力剿匪。若一旦決裂，則長江一帶匪徒必致乘機響應，中國亦將

於危險」。這就是說，希望洋兵不要攻擊清宮，屠殺義和團是可以的。袁世凱正是這樣聯合德兵大殺

山東的義和團。

反對派建醮，義和團及其聲援者，獲得帝國主義的贊成。殺人最多的袁世凱被逐為李鴻章的繼承人，以至是滿清的繼承人。

(二) 贊成

派——載瀾

剛毅徐桐等

大阿哥溥儀，準備庚子年登位，被駐京公使拒絕，這使載瀾仇恨外人，經過其他頑固派，不惜尋求任何助力來反對外人。剛毅是西太后寵信之一，榮祿密計立大阿哥，剛毅不會與剛，因此竭力奉迎載瀾，與榮祿爭權第一功。榮祿反義和團，剛毅乘機反榮，董福祥本是榮祿部下，「平日對滿人感情甚惡，剛毅深恨榮」（景善日記），現在為反榮，把董福祥拉到載瀾方面來合作排外。徐桐年八十歲，號稱道學大師，每見西人，用扇掩面，西太后極尊敬他的道學，敬他做溥儀的師傅，自然，他是渴望溥儀立即登位的。這三個政府中有力人物，一致求武力解決廢立問題，對「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認為是可以利用的武力，義和團得進北京城並得到政府的獎勵，在義和團實力擁護以前，主要是這三人的力量。義和團入京後聲勢大張，載瀾曾兩次反抗，都被義和團制止。清政府任命載勛、剛毅統率義和團，企圖干涉國民行動，但重要事件載勛等「不能作主，仍請壇中大師兄焚表燒香，載勛等不能干預」（拳匪紀事）。載瀾等志在滅洋，不得不對義和團取退讓態度。

(三) 反覆

派——榮祿

奕劻等

榮祿善於陰謀，得西太后寵信，戊戌政變，他是主要策動人之一，立大阿哥又是他一人密計。他對西太后，載瀾關係極密，對光緒帝則稱「已虧臣道，永不忘皇帝之恩」。這樣，除了發動「滅洋」戰爭不能有自己的生路。他是武衛軍總統，主張開戰，首先殲滅公使館，在給董福祥信裏說：「各夷欺我國甚矣，近來尤多干預挾制，令吾辦內事（廢立）不便，尤可憤恨。義和團法術神奇，不畏刀槍，極熱心嫉惡洋人，真天助也」。後來看出「屬

被請奏」不是那麼容易，立即反對圍攻公使館，竭力勸西太后購辦義和團，與圍攻公使館對立。當時記說：「榮祿一日不贊成，則端王剛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義和團也」。榮剛二人交互影響兩太后，使她動搖不定。董福祥原是兇惡匪魁，也受榮祿影響，令「義和團爲先鋒，董軍爲接應」，因此義和團遭受嚴重的死傷。

● 奔動是另一形式的反覆派，他對贊成派表示同意「滅洋」，對反對派表示痛恨義和團。聯軍入京後，反對派得勢，奔動被派爲議和全權大臣。協助李鴻章訂辛丑條約，從此提升爲首席軍機大臣。實與從榮祿門下轉到奔動門下，得奔動庇護，發展了北洋軍閥的實力。

(四) 勸搖派 西太后等

西太后是統治階級老練的首領，在她手裏，幾千萬起義人民被以殺了。她爲對禁止人民有「聚衆滋事」的行動。義和團反抗軍閥，殺戮官吏，這超過「滋事」的範圍，然而她終於允許義和團進北京，這不是「扶清」口說迷惑了她，而是公使館洋人逼得她無路可走，幻想真有神佛來拯救她。她天天誦讀義和團秘密教誨，「每誦一週，則李蓮英（最親近的太監）在旁高呼曰：『那裏又有一洋鬼子！』（景善日記）。這種窮急求教的醜態，是她容納義和團的一面。五月上諭稱『拳匪滋擾禁城，竟敢明目張胆，沿途喊殺，持械尋仇，任意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若再不嚴行懲辦，爲禍不堪設想。着各軍會同彈壓，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勒限將首要各犯扭即嚴拿，不准再事姑息。其城內設立壇棚應盡行拆毀」。這種俯視仇視的本性，是她排斥義和團的另一面。載灃與榮祿兩派各在一面力爭，載灃派人數衆多，宮內有李蓮英，「時以義和團之神奇述於太后之前」，又告剛毅，不可輕贊義和團過甚，致啓太后之疑。這是載灃實約有利條件，載灃派亟主迅速開戰，西太后終是「遲疑不決」。五月二十四日，裕祿奏「洋人衆大

沽砲台，請開正即與宣戰」，西太后不允。載瀛僞造一個公使團照會，要求「皇太后歸政」，這才激發她的憤怒達最高點。她召集御前會議，宣稱「外國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又說「拼死一戰，強於受他們的欺侮」。又拒絕榮祿的力諫，說「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二十五日正式宣佈開戰，載瀛、阿發陪同榮祿，爭得西太后偏向贊成派。二十九日，載瀛率團民入宮捕拿光緒帝，她感到危險，下諭停止國政使館，命榮祿赴各公使館商議和局。此後忽攻忽停，忽送西瓜酒蔬果冰等禮物給使館，並命奕劻前往慰問，忽密諭各省「凡洋人無勇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對義和團屢次設法壓制，對外國預定戰敗後的辦法，說「他們（外國）雖向着皇帝，不喜歡我，我有手段教他們意思轉過來」（景善日記）。這就是準備出賣大量權利來換取外國的喜歡。天津失陷後，她非常恐慌。六月二十日，榮祿揭發載瀛僞造公使團照會的陰謀，她大罵載瀛，除了董軍，榮祿所說各軍都在等待停攻命令。顯然，她偏向到榮祿方面來了。

五月二十四日，西太后宣稱「我始終壓制義和團，不欲開釁，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團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竟敢要我歸政，始知此事不能和平解決」（景善日記）。二十九日，她「心怒端王及義和團之故，下諭停止國政使館」，再開始壓制。她所義和團神咒僅在開戰後五天以內，義和團不受壓制，也止有在五天內。但是壓制不會發展為屠殺，這不是由於她不想殺，而是義和團的反壓制，使她不敢屠殺。五月三十日上諭：「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衆不下十數萬。自民兵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爲仇，勢不兩立，剿之則立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合徐圖挽救。奏稱（李鴻章、劉坤一等請剿拳匪奏）信其邪術以保國，似不贖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又諭李鴻章等：「此種國軍京津一帶已不下十餘萬人，宮禁前後，所在多有。剿之轉恐患生不測，不若因而用之，尚可轉危爲安。此乃天時人事相迫而成」。六月初三日上諭：「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

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激成大禍，亦恐直，東甯省同時舉事」。五月二十六日樂謙復劉坤一等密電也說：「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鯨，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拯救」。這些都是當時實際情形，哀詞，許景澄稱「拳匪為賊心之疾」。在滿洲奴才看來，並不是過慮，因為義和團造成控制政府的形勢。西太后出官門時，不能不請「拳民護衛聖駕」。樂謙自稱「過後門時拳民竟敢大聲罵予為漢奸」。義和團的羣衆力量壓倒了滿清的統治力量，這就是西太后不敢公開反對義和團的真實原因。

第五節 外國的壓迫與義和團的反抗

義和團是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運動，在各種原因的促進下，爆發了庚子年戰禍。促成戰禍發生主要的原因是外國侵略者抱着這樣的一種信念：「以為在華的外人——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其解決糾紛之唯一的方法，只有多用武力，並懲罰所有關連的官員」。所謂懲罰官員，實際是強迫官員服從侵略者的意志，竭盡全力去鎮壓人民。這種信念與客觀事實發生矛盾時，就是說滿清政府因獨立問題對侵略者暫時表示不全部服從，這中外聯合鎮壓，露出空隙，庚子戰禍就從這個空隙中爆發起來。下列事實完全證明外人的「多用武力」在先，義和團的被激自衛在後，禍首是外人不是義和團。

(一) 大沽

炮台失陷以

前(庚子年

五月二十一

日以前)

帝國主義欺壓中國，激發義和團運動的事實是舉不勝舉的。這裏只從己亥(光緒二十五年)年冬季美公使康哲要求撤換毓賢交涉說起。

己亥年十月，美使館接到山東美教士的報告，說德州附近發生暴動。康哲照會總理衙門，要求保護山東境內美人的生命財產。接着，又要求「凡肇事之人，應立即拘捕，並予以科罰」。一星期後，又送照會，要求「電示地方官吏，常用強有力的方法，消滅這些惡劣的暴徒(義和團)，並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接着又要求「立即宣佈將用何種方法，保護美國人民」。十一月，康哲又要求「立即再發一電至山東省，保護外人應有的方法，應立即施行」。總理衙門接到連環式的要求，當然嚴飭毓賢鎮壓義和團。但事實上，美教士的生命財產並沒有發生過危險，只有一次，當義和團經過臨莊時，基督教徒竟無故開槍，並追逐捕捉。團民被迫反攻，焚毀教堂一所。總理衙門根據毓賢的報告咨覆康哲，康哲不顧事實，提出警告式的照會，要求撤換毓賢。兩天後，滿清政府果然撤回毓賢，選擇最大屠戶袁世凱繼任山東巡撫。毓賢被任為山西巡撫，對那些造謠生事的耶穌教士格外怨恨，庚子年他在山西不分天，主耶穌一概屠殺，他的野蠻性與康哲的驕橫性結合造成山西大慘案。

美公使麥唐納自伯魯克被殺案以後，表示強硬的態度，並不因清政府袁世凱殘殺兇手賠款贖地而滿意。十二月，各公使在英使館開會，議決要求：「中國政府頒佈諭旨一道，聲明完全禁止並取消義和拳及大刀會。又聲明凡任何會團或秘密會衆者，均係違反中國之法律」。這就是要求清政府採取袁世凱的「嚴禁拳匪暫行章程」，當作一般性法律通行到反教各省(主要是直隸省)。如果當時沒有庚子大阿哥繼位交涉，清政府當然會服從公使館的要求。可是該立問題激怒了西太后，因此頒佈的上諭

己亥年十二月庚子年五月上諭，都不能完全符合公使團的指示，交涉愈趨緊張。庚子年二月，公使團提出警告說如果不能實踐全部要求，他們將各請本國政府，採取必要的手段，保護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三月，公使團不等總理衙門答覆，英兵艦兩艘首先開到大沽口，美艦接着開來，德、意、法、俄各艦隨後陸續到達。公使團覺得海軍聯合示威還不夠嚴重，四月，又提出使館駐紮衛兵的要求，康暫說：「人人皆知海軍示威，能使中國易於順從。但設此舉失敗，而各國集兵至京，聲言保護使館，則中國政府亦必然承諾要求之事。蓋中國政府對京畿之秩序與安全常努力維護，最不願受人指摘。彼等寧願作他種犧牲而不欲京師秩序不靖也。」這種危險原來是屢試屢效的，這一次却發生了相反的結果。頑固派認公使團要用武力恢復光緒帝的政權，仇外心理提高到準備反對的程度。西太后下諭責揚詢去辦團練的官紳，這些人死了多年，忽而明諭褒揚，顯然是準備反抗的暗示。同時，西太后任命魏賢為山西巡撫，在任命前一星期，康暫會要求「魏賢將來的任用，不得在有傳教部的地方」，恰恰是山西，耶穌教事業超過天主教，這又顯然是拒絕要求的一種表示。不過，這不是說清政府對公使團不再讓步了，它承認公使團的要求對義和團的鎮壓並不放鬆，迭次諭令地方長官使用兵力，「剿、圍、民」。中國人民受外國壓迫，激起反抗的義憤，特別在直隸，義和團得羣衆響應，迅速發展起來。在「扶清」口號下，與俗練進行多次的武裝衝突，屢獲勝利，逼迫俗練逐漸屈服。在「滅洋」口號下，用匿名揭帖，謠傳等方法，鼓動民衆。康暫給美國務院報告（四月初十日），也承認「現在尚未聞拳衆攻擊美國教會之事，亦無侵犯美教士所住村鎮財產之事」，四月下旬以前，義和團行動主要是對滿清作亂，不會武裝進攻外國教堂。

● 四月二十六日，公使團提出照會約有六點：（一）嚴禁拳民練團糾黨傳布揭帖。（二）團民聚會之處無論寺廟民居，將其住持屋主，一併收監。（三）將拘辦拳民不力之員概行懲處。（四）將爲首

發發之拳衆一併正法。(五)將縱拳助拳之人盡行誅戮。(六)直隸與鄰省有拳國之虞，地方官出示嚴禁。通飭清政府承認，否則各國將自行調兵辦理。總署接受要求，允即「剿辦」並「嚴禁該會」。公使團的野蠻要求與清政府的完全屈服更激起民衆的憤怒，北京城內禁止義和拳的告示，被民衆擄去，並且斥責政府媚外。二十九日起，義和團繼續進攻長辛店、豐台等車站，驅逐洋工程師，廬保、京津鐵路被阻不能暢通，各地洋人和教民開始被殺戮。清政府派兵攻擊，直隸提督聶士成軍尤其兇暴，在蘆橋附近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見器物便毀，共焚毀村莊四處，殺人四百八十名，器物損壞無數。在落俗炮廠村莊五處，殺六百餘人。聶軍瘋狂燒殺，主要是受李鴻章的指使。他給聶士成電稱：「宜即痛剿，保全大局爲囑」。聶士成派兵沿京津路，軍殺義和團，京津一帶秩序愈益紊亂。公使團方面接連表示武裝干涉，五月初四日，英、法、美、意、日、俄、德派兵三百數十名進京，七國兵艦十六艘泊大沽口外示威。初十日，大沽口洋兵登陸到天津租界，形勢非常緊張。載漪、剛毅等害怕公使團用兵力扶助光緒帝，急於尋求助己的力量，「扶清滅洋」的拳民被注視了，剛毅以「查看」名義到涿州城接洽，初五日回京，次日奏請「太后信任義和團，用爲軍隊，以敵洋人」。他深信「這一回一定把洋人趕走了，一點也不用疑慮」。(景善日記)。何太后在洋兵威脅下，態度「遲疑不決」。初十日令「榮祿分飭重福、宋慶、馬玉崑等各率所部實力剿捕」義和團。各大臣密議，載漪、剛毅，奔騰等力主「不可剿辦匪徒」，決議「該國皆皆忠於國之人，如與以上等軍械，好爲操演，即可成爲有用勁旅，以之抵禦洋人，頗爲有用」。從此義和團被認爲合法團體，北京城內漢滿人到處公開練拳，甚至溥儀也穿拳民衣服在頤和園練習拳術，北京城內義和團世界。西太后在斥責聶士成上諭裏說：「倘因此（燒殺）激成變政，惟該提督是問」，說明他被羣衆運動壓倒了。十二日，英提督西摩兩率聯軍準備向北京出發，十三日，調重福祥軍入城。十五日重福祥死日使館書記官杉山彬，漏勢愈不可

收撫，雖不得已於十七日，默許袁美和團入城，但並不信任，要領（義和團）莫圖動。京內外拳民結合以後，搜殺教民，焚毀洋貨店，延燒市房數千間（二十一日），刺奪貴族、官吏的威權，神壇成爲政權機關，她感到『京城內外，騷亂已極』的新威脅，十九日諭：『步軍統領衙門嚴拿滋事拳匪，交刑部正法。城內壇廟盡行拆毀』。同日諭：『李鴻章迅速來京，袁世凱若酌量所部迅速來京』，企圖用洋務派的助力來對外投降，對內鎮壓。二十一日，聯軍攻陷大沽口炮台。二十二日，任李鴻章爲直隸總督，『若迅速北上，毋稍遲延』。二十四日，收報到北京，她還是『遲疑不決』。載灃猶選公使團照會，勸令『太后歸政』，這才狂怒起來，宣稱『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二十五日頒發宣戰上諭，令義和團充先鋒進攻使館。從上述經過看來，清政府與義和團結合，主要是公使團促成的。它慣用威嚇方法命令清政府鎮壓人民，這一次却因底立問題發生誤會，不完全服從命令，給義和團號召羣衆的機會，大沽炮台失陷完成了這種結合，而這種結合又是極免強的。

(二) 天津 失陷以前

六月十八日

以前

五月中旬，義和團入天津城。在此以前，義和團已與洋兵發生戰鬥，初六日，獨流鎮團民向俄國著名的哥薩克馬隊格鬥，團民死二三十人。初十日，團民與俄法日登陸水兵在天津城外開仗，團民死二十餘人。裕祿在民衆及外兵雙重壓迫下，異常驚駭，迭次奏請罷免又不得允准，只好禮請張德成、曹福田入城，求暫時安寧。十四日，西摩爾率聯軍二千餘人，攜帶大砲機關槍向北京進發。團民破壞鐵路，隨處劫殺，聯軍第一天走了三十英里，第二天止走了十英里，在廊坊地方『突有團匪等蜂擁而至，胆量甚壯，其中尤以小孩居多。』英美兵開始進攻，團民死六十餘人。第三天止走了三英里，第四天，團民開始總攻擊，死傷極大，但聯軍已不能向前進展，鐵軌的前後兩端都被拆毀，即天津交通完全阻絕。二十二日，聯軍軍官們認爲除逃退以

旁，別無他法了。他們幾乎食盡，又受傷病兵的拖累與繼續不斷的激戰，且拒且退，二十六日，退至西沽，又被國民圍攻，勢極危急，直到五月三十日，得大隊援兵才解圍回天津。聯軍兵士陣亡六十二名，受傷三百二十二人。義和團用刀矛殺傷外兵數百人，可見這次戰鬥異常激烈。聯軍將鐵路旁村莊縱火焚燒，「所有華人可以埋伏及藏躲所在，均經西兵收拾一空」，國民方面死傷損失是無法計算的，但始終阻擊，死不退却，西軍隨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勇敢，說「義和團所用設法西式槍砲，則所率聯軍必全體覆沒」。

五月十七日，義和團前往天津火車站，俄兵開放大砲十五門，國民死三四百人，這當然激起國民的憤怒，即時出動大隊進攻租界，天津攻租界戰鬥從此開始。二十一日，大沽砲台失陷，國民及一般民衆愈益激昂，天津武備學堂學生向租界開砲，英德兵回擊，學堂起火，國民死傷頗多。二十四日，清政府頒發宣戰上諭，聶士成奉命攻擊租界。聶軍是當時唯一能戰的新式軍隊，與租界守軍惡戰十餘日，前後相持凡八日。甲午戰爭中，聶軍勇敢善戰，這一次又表現了聶軍的勇敢，「四人謂自與中國交戰以來，從未遇此勇悍之兵」。天津城得暫時保存，聶士成軍是有功績的，但是，天津城的過早失陷，聶士成也應負責任。他和義和團結成深仇，民國自動給聶軍頒先鋒，聶軍却在後面槍殺國民。國民見勢不佳，不敢出戰，聶軍強令上陣送死。例如某次夜戰，「華兵在後，義和團在前，合攻租界，洋兵開排槍擊之，天明而止，計斃義和團二千餘名，華兵傷者寥寥。事後探訪，知官兵因義和團妄言滋擾，恨之切齒，往往莊搜捕圍匪實令先鋒當前敵，否則殺死。團匪持刀前行，洋兵在前開槍轟擊，官兵在後用槍擊死，故是夕圍匪死者如此之多，並非皆洋兵打死」（粵人某遇難日記）。此後國民避新軍搜捕，隱蔽在村莊中，聶士成痛恨不止。某次戰罷歸營，遽下令曰：「今日盡力攻匪，國民避新軍搜捕，隱蔽在村莊中，聶士成如此殘暴，激起義和團的報復，「乃乘其與洋兵苦戰時，

以多人擄其家屬而去，老母年八十三，亦被擄去」。聶士成「聞信，急引兵追之。練軍見聶軍追匪急，欲救之，遲咤曰：『聶軍反矣！共開槍橫擊之，聶軍收散』（聶軍門死事紀略）。聶軍兵士不少同情聶和團，收散後不再歸營，聶士成僅收集數營，六月十三日與洋兵戰敗死，多年訓練的精銳部隊，就這樣消滅了。

聶士成屠殺義和團，但也抗擊洋兵。繼任的宋慶，專殺義和團，見洋兵就逃避，因此士成死後五天，天津城失陷。當時城外駐宋慶軍，馬玉崑軍，練軍約七八十營，城內駐兵極少。官紳們以為「城上不用砲擊洋人，洋人必不用砲擊城內」，拒絕軍隊入城防守。十五日，馬玉崑軍與聯軍大戰，將士死傷甚重，官紳們得知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奔走相告且相慶曰：『津人有生機矣』」。這些腐敗已極的官紳，「止希聖及早」，絲毫不作戰準備。十七日，聯軍砲擊天津城，宋慶大殺義和團，城內外神壇多被搗毀。本來團民盤查奸細嚴，經宋軍懷疑，無人守城巡衛，夜間教民浸入城中，四更登城，引上教民數十人，遍插洋旗，亂放槍砲，大呼「洋兵來了」。居民夢中驚醒，倉皇向城門奔逃，城中大亂。十八日清晨，洋兵大隊進城，率教民登城中心地鼓樓，向人發連放排槍，每一排必倒斃數十人，又連放開花砲，死人更多。據「天津一月記」所說：「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閣，積尸數里，高數尺，洋人入城後，清街三日尚未淨」。據「通離日記」所說：「城內俱見死人滿地，繁華街道均被焚燒，西門死屍山積，房屋十存一二」。城內殘存團民半為洋人殺死，逃出城外又遭宋軍槍殺。宋慶等七八十營大軍，不圍攻天津，又不乘虛攻擊租界，却幫助洋兵殺人。宋慶大殺義和團以後，晚間保護裕祿及官員封樁村，離天津六十里，馬玉崑逃到北倉，離天津二十里。天津近郊不見一兵，全被洋兵佔領。

(三) 北京失

陷以前(十月

廿四日以前)

會攻入附近一廟中，拳民聞風退走，

五月十七日，京外義和團開始進城，神壇到處設立，形勢確甚緊張，但並無攻使館舉動。使館衛兵却超出自衛範圍，先取攻勢，「或有時上城放槍，或有時四出巡街，以致屢有放槍傷人之事，甚或任意遊行，幾欲闖入軍機門，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憤，異口同聲。匪徒(義和團)乘隙橫行，槍殺教民益無忌憚」(六月三日上諭)。按照外人記載，也說「德意兵

曾攻入附近一廟中，拳民聞風退走」，又說「德國水兵在城頭上向南城內集會拳眾開槍」。廣哲承認「使館衛兵已殺戮拳眾至百人之多」。德兵毀殺董軍三人，廣哲相信「外國軍隊之技術與勇敢之表示，實爲一良好之實物教訓」。這都說明廿四日以前，義和團先受外兵的攻擊，死傷至少在百人以上。

五月二十五日西太后宣戰上諭，有「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棧伐，一決雌雄」等語，表示排外決心。同日諭各督撫「招集義民成團，藉禦外侮」。二十六日發放粳米二萬石給義和團。二十七日，令各督撫「將舊槍砲刀矛各種軍械，趕緊修理，以備民團領用」。二十九日「賞神機營、虎神營、義和團民銀十萬兩，甘軍、武衛軍賞銀六萬兩」(前曾賞四萬兩)。在這五六天內，她是堅決主戰者，相信「洋人命運該絕，如魚在釜中……現在全國一心，必能戰勝無疑矣」。二十九日起她開始動搖，對義和團也不再接濟，此後戰鬥由義和團、董軍在戰線，剛毅主持下，半自主進行。她實際傾向媾和，形勢又不許停戰，因此，把「約束」拳民看作第一事，攻使館看成第二事。

與宣戰同時，清政府懸賞購洋人頭，「殺一男勇賞銀五十兩，女勇四十兩，幼勇廿兩」。恰巧德公使克林德坐轎往總署，路上被虎神營滿洲兵丁槍殺，企圖領賞銀。這一野蠻的槍殺案，揭開了大戰的序幕。接着義和團、董軍、武衛中軍(榮祿直屬)及其他京營旗兵奉命攻擊使館。使館方面有衛兵四百四十名，教民二千三百人，教士及眷屬數百人，各館男女人員約五六百人，天主教「北堂」方

時有衛兵四十人，洋教士七十人，教民一千人，婦孺二千二百人。兩個被攻地點門力都極有限，進攻軍民不下十萬，使館被圍攻五十六天（五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日），北教堂被圍攻六十三天（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二日），結果止是教民不少人死亡，義和團手執刀、矛、木棒、石塊日夜布火約上圍先鋒，死傷尤極慘重。造成這一大慘殺的帝國主義與滿清兩團派，罪惡最止上通於天而已。五月二十九日以前，西太后曾想一戰攻破公使館，二十九日以後她有寬發密議和國，心計非常險惡。

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正式開戰，武衛中軍及其他旗兵發空砲擊擊，並不進攻，實際進攻的是義和團及董軍中一部份兵士。武衛中軍及另一部份董軍於二十六日大肆屠殺，搶劫孫家廟、練桐等大官僚住宅。西太后原想幾天內戰勝，軍隊的暴行，使她感到戰事延長的危險。

二十九日載灃率義和團入宮謀殺光緒帝，她更感到危險，「下諭停止圍攻使館，並命榮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恰巧裕祿謊報斷軍戰敗，她又令各軍進攻。六月初四日董福祥借武衛中軍大砲，被榮祿拒絕，並入宮請求，又被她大罵拒絕。如果要破使館不應拒絕借砲，如果不要破使館，便應下令停戰。這種戰不求勝的怪異行爲，正是故意借刀殺害議和國。同日，她「斥責載灃不能約束軍民，任令橫行」，足見她對國民的憎惡。十一日，「天津戰敗的消息到京，太后甚爲憂慮」。十五日，任命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準備乞和。

十七日天津失陷，西太后極爲恐慌，十八日，正式派榮祿向使館求和。二十日，榮祿揭曉載灃爲逃空使館照會，開戰的原因消失了，從此更積極求和。數次送公使館西瓜酒梨果冰等物，又派奕劻前往慰問，表示好意。奕劻、榮祿連日紅信商議和事，不能得公使館信任。六月二十七日，電催李鴻章「即刻起程來京」。七月十三日，任命李鴻章爲議和全權大臣，總署通知使館，請求聯軍停戰。二十日，聯軍入城。義和團、董軍攻使館直到聯軍入城才停止。她一頓急切求和，一面催促義和團進攻，

雖然要國民大量死亡才有利於和議的進行。

北軍守兵僅洋槍四十挺，大炮一尊。義和團以擲彈道，投石塊，擲地雷，擲火藥罐放火等方法轟攻，死傷極重。二十二日，聯軍陷北京，義和團才散。

義和團攻使館和北堂兩處，前後死傷不可計數，至少在萬人以上，這真是殺戮的愚昧行動。但愛生惡死任何愚昧人不特敏而知，義和團獨違常情，還止有一種解釋，就是帝國主義與滿清政府的極度壓迫，迫使人民願死不願活。

(四) 八國聯軍的「文明」行為

正當義和團運動高漲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大肆叫囂，宣稱「費種仇視白種」。「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與文明」。其實，中國人僅僅仇視外國侵略者及作爲侵略工具的「文化與文明」。試看聯軍表現的「文明」，就證明義和團仇視的那「種外國人」，絲毫不會錯誤，錯誤止在方法太陳舊，也就免不了失敗。

七月初八日，六國聯軍（奧意兩軍尙未到），約四萬人，自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發。左岸英、美、日三國，右岸俄德法三國，行至北倉，被馬玉福軍，義和團阻擊，血戰多時，馬軍無功收。是役聯軍死傷日四百餘人，英一百二十人，俄六百餘人，足見戰鬥非常激烈。十四日，聯軍攻佔楊村，美軍先鋒，死七十四人，傷二百六十五人，英軍死傷三十二人，俄軍死傷二十六人，宋慶軍大敗逃。李秉衡勸王兵，及義和團駐河西務，一戰即潰散。李秉衡臨死時被宋馬等砍軍情形說：「定遠營萬，充塞道路，村莊巨鎮如河西務，張家灣俱焚掠無遺，小村亦然。獨見賊即退去，長起請張賊事，則又北去矣。宋則總未得見，聞已在通州。兵將如此豈旦夕之故」。宋、馬等軍沿路焚掠，等於聯軍沿清道。通州本是義和團中心之一，聯軍到時已成空城。聯軍進北京後，義和團軍隊兵在官門

外國人民。
外聯合抵抗，「華六死傷甚多，街上屍骸枕藉」，聯軍所獲得的勝利，實際止是戰勝了手執刀矛的中國人民。

聯軍在京津及所到地區燒毀、總殺、搶劫、姦淫，不僅義和團毫無類似行爲，就是滿清軍隊程慶上也還相差頗遠，下斷略舉實例，可以推見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奴隸所施行的「文明」。

燒毀例：

通州倉米搶掠一空（日軍得米二十五萬包）。城內房屋都被燒毀，較之天津遭禍更烈。

北京城內地安門及西四牌樓一帶均成焦土，前門北至珠市口及崇文門內東交民巷無不被焚。

總殺例：

津兵至青縣，知縣沈某被殺，分割其肉，屍無完膚。

河東某甲於日昨迎娶，正行拜堂之際，某洋兵姦女爲紅燈照，男爲「拳匪」，用槍一併擊斃。

各村居民在地檢拾柴禾，被洋兵擊斃者不知凡幾。

搶劫例：

津城失守之日，西人皆牽車往返六七遭，前之不名一錢者，今或數十萬金。西兵出京，每人皆載大袋，大抵皆珍異之物。

自七月間有大將家財重寶藏匿棺中掩埋。被人暗誦消息，洋兵大得利市。於是四郊之人及各營會館、義團，幾於無不不破，拋屍道左。

聯軍三五成羣，向河東及城廂內外一帶舖戶及民屋竊劫倒載，盡其所欲而去。

聯軍赴保時，沿途鄉村皆已搜掠一空。

姦淫例：

崇公爵諭省城並為軍所擄，歸還天壇內，次第輪姦，以爲戲樂；無少長老幼無得免者。

倭仁妻年已九十餘，爲某國兵所獲，挫辱備至而死。

聯軍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歸諸表背胡同，作爲官妓，任驛軍人等入內遊玩，隨意姦宿（以上各條均見拳匪紀事）。

當時從公使、統兵、將官、兵士、普通外人（少數教士除外）以至翻譯、漢奸、一部份教民都參加了這個「文明」運動，並且影響那些無恥的上流士紳，重價購用洋貨，甚至「西人破帽舊靴巧衣窮袴，必表出之。矮燈白板，好裹布文士；用以自附於洋、昂頭自喜」。梁啟超在辛丑年清譯報描述當時士大夫風氣的轉變說：「吾聞數月以來，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人士咸歛而慕之，昔之無望科第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焉」。滿奴教育的八股科第轉變爲洋奴教育的翻譯通事。這表示洋務派、實辦、一切洋奴從此大抬頭。頑固派力求洋務化，滿清統治階級全部被外國「文明」征服了。

第六節 人民的繼續反抗

聯軍佔領北京，派兵四出攻掠。西太后，光緒帝逃到太原，八月十四日宣布「剿匪」上諭，把一切責任都推給錢和國，說「此案初起，錢和國實爲巨禍之由」，接着說「今欲根本肅清，非痛加剷除不可。直隸錢和國蔓延尤甚，著該地方文武嚴行查辦，務絕根株」。統治階級真是這樣殘忍反覆的。當它要利用義和團攻戰時，稱爲「我義民以血肉之軀，與槍炮相薄」。現在却要「責成帶兵官，實力剿辦以清亂源」，作爲向外人乞憐的禮物了。這道上諭頒佈以後，西太后調各軍「會剿拳匪」。聯軍路過清軍，隨意搶殺擄掠，或據充奴役，例如九月十一日，「洋兵入涇安縣城，搜掠一空，城內所駐攻

打拳匪之武備軍，俱被洋兵捉獲，充當苦力，陸續運回京。又如九月二十日，聯軍由保定府歸者，途遇華軍，誤傷直督提督，聞該提督嘗呼「窮命」。這些奴隸軍除不怕當牛馬，却怕就誤「會剿」。政府竟向聯軍請求「功剿團匪」。李鴻章「傳諭各軍，如與聯軍抗拒，徒增國家之害，因此不准華軍接戰」。亦南至直隸中部，西至阜平及西山一帶，東至大沽、山海關，北至赤峯、長城、張家口，方圓數百里內清兵不得准許，不敢私進駐紮，這算是劃分了雙方責任的屠場，事實上清軍、聯軍逐漸實行互助來以殺共同的敵人——中國人民。

京津失陷後，那些混入義和團的不良份子都逃散了，各地義和團退入鄉村，不再是幾萬人的大集團而是通常結合數十、數百人的小部隊（有時集合至萬餘人）。對清軍一般採取自衛態度，對聯軍則仍採取進攻姿勢。關於清軍聯合聯軍的無恥鎮壓時局事件事例：

日前有四川來之拳匪甚多，行至黔州與駐防該處之津永師營砲船相遇，拳匪以官兵甚少，互相拒捕，所有砲船均被拳匪打散，兵勇受傷者不計其數。拳匪勢甚猖獗。刻聞各國聯軍已派洋兵三四百名前往該州剿辦（拳匪紀事載天津來函）。

四川義和團走數千里來作戰，除了為高度的民族精神所驅使，再沒有其他目的，這樣可敬的愛國行動，却被稱為「匪勢猖獗」。歡迎聯軍代為報復，足證統治階級是毫無心肝的匪賊。

署理天津鎮徐總戎日前在安肅地方率隊與拳匪接仗時，適陝西勦土匪道經是處，拳匪疑係後路，乘其不備，兩下混戰，致統領嚴觀鑿槍傷左腿，並傷亡馬隊親管帶一員，各營正副哨官十三員，兵丁共傷七百六十三名。

初三日，該統領帶傷親率所部赴安肅西鄉方勝橋地方與匪復戰，該處防軍亦來助戰，約三時許，匪黨不支，概向保定大道遁去。陣斬匪黨四百餘人。德國馬步軍約數千名，分水陸二路開往

保定一清剿聯軍匪（天津來函）。
這裏是清兵戰敗，聯軍助「剿」的實例。

河間板家窩地方，拳匪猖獗異常，經聯軍前往剿辦，未能得手。昨又會同呂道生軍門統帶馬步等隊，攻打三四日乃得將匪首拿獲，送至河間梟示，餘黨盡行誅滅。而呂道生軍門領下受有槍傷一處，現經法軍延醫療治（天津來函）。

這一例是清軍替聯軍當獵狗有功，得法軍的憐憫，比其他清軍確遭遇了特殊的榮幸。與呂道生同樣著名兇惡的提督梅東益，某次在滄州「爲聯軍所攻，梅軍門行李（掠得的贓物）悉爲失去，梅軍死於四十三人」。又聯軍途遇某軍統領范廷桂，「范策馬獨前，告以此次偶爾相值，並非對敵云云。英軍不解其語，當將范廷桂槍斃」。又「意大利兵一大隊，在固安縣隣近某處遇中國步兵三隊，意兵斷之，華兵知抗禦無濟，因不開一槍交呈兵器而降」。這些例證說明清軍在聯軍面前何等卑賤怯懦，但仍竭誠助聯軍殺人，例如「涿州尚有拳匪，法兵到後，若輩即悉行向南退去。次日，涿州有拳匪明目首級八具發掛各處示敵。據云，此係華兵所爲。德軍見有華軍若干人，當由德兵殺其一人，餘者悉降」。法兵殺不到一人，清兵却殺了頭目八人，德兵殺清兵一人，清兵立即投降，這是什麼軍隊呢？這就是適合半殖民地統治階級需要的軍隊。

義和團對聯軍一面自衛一面仍取攻勢，在庚子一整年中，不曾停止過戰鬥，生命財產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但也教訓了帝國主義者認識到「瓜分一事實爲下策」（瓦德西語）。

下列事實若干條，證明義和團不撓不屈的反抗精神沒有被侵略者壓倒。與清政府出資東三省、發糧、賠款向聯軍插尾乞憐的醜惡對照來看，不管義和團在思想上如何愚昧陳舊，它的氣魄總是值得贊歎的。

抗擊例：

有潰兵以黑布纏頭，自稱黑霧和團。當聯軍赴保定時，互相奮勇，向半途迎擊，互相傷死。團匪死者八九百人，聯軍至保定，官吏出城迎接無一逃者（八月天津來信）。

九月初二日，聯軍在保定西北一處與匪開仗，西兵傷損四十六名之多（北京來函）。

十月初，聯軍約克倫督帶前往張家口。西人得津電云，德國統兵官約伯克爵在張家口陣亡。德軍說是被煤氣薰死，是役聯軍前往他處者亦不甚利（字林西報）。

離天津三十里之某村，有義和團與某國兵開仗，某國兵幾大敗。後幸法兵救之，始獲勝（十月天津來信）。

匪擊例：

刻下圍匪來攻者日多，前數日曾攻山海關、塘沽鐵路，天津至通州陸軍所行之道，亦常為匪所擾（九月北京來電）。

十月二十五日夜間，該處圍匪除糾集多人，襲擊津沽間俄國鐵路兵隊，後由天津派隊往剿（北京來信）。

案匪多人進攻楊村德人，並經擊退，死傷頗多（十月天津電）。

行營馬公使多人前來電報城攻擊俄國護路兵，並經聯軍一隊由天津前往擊退（十月德文報）。

謀攻京津例：

聯軍將內地行軍並不據預期那樣便利，十月初，它宣稱，京津一帶拳匪將次肅清，因此不復遣兵前往各處，鎮壓義和團的任務主要交付清軍，自己着重守鐵路及京津兩城。義和團襲擊鐵路並謀攻北京津，當然，攻取京津是空想，但聯軍也頗感不安，不敢輕視這個攻勢。

鄉下等處，羣兵（潰軍）潛行入城者甚多，深恐封日後或有變端（天津專電）。

天津城內刻有團匪之人練習拳技，城中居民因恐為所刺，不敢報明（京津七日報）。

大青縣（譯音）匪五六百名，聲言不日即將復攻天津。法德兩國已遣兵往剿（德文報）。

保定府法團兵官報稱，鄰近某處拳匪何多，聲言將克服京津一帶各處（文匯報）。

北京四面刻亦不甚安靜，常有團拳匪告示黏貼城牆（天津久信）。

有匪人二人，欲炸發東局火藥庫，當火藥庫炸時二人亦亦逃竄（天津電）。

天津華人某君請願軍宜預備一切，以防冬間或有變動（天津電）。

義和團是一種落後團體，當然不能有明確的政治思想。十一月初，清政府接受各國的條件——空前嚴重的條件，義和團被各方面譏議攻擊，肯定為一切災禍的主要負責者，羣衆逐漸離散，義和團運動也就逐漸停止。

直隸省以外，各省義和團或其他團體進行各種規模的反抗鬥爭，除自立會，與中會屬於新式起義，庚子一年內，所有舊式起義團體幾乎全部起來有所表現。庚子以後，新式起義團體數量增加，舊式團體不再有號召力，這也是義和團運動給人民的一種教訓。

各省反教反清情況簡述如下：

山東省——袁世凱聯合清軍竭力鎮壓義和團，大刀會，但仍到處起事，攻破高密、陽信等縣城。北京失陷後，德州地方義和團糾合潰兵共萬餘人，謀攻入山東境，被袁世凱擊散。義和團分數路入，山東省各縣皆有之，直至江蘇徐州宿遷一帶尚有該匪蹤跡，袁世凱的瘋狂屠殺，事實上並不成功。

東三省——沙俄軍隊藉口保護鐵路，侵佔東三省。義和團聯合潰軍，焚毀鐵路、教堂，如牛莊漢

等處，教堂一律被毀無存。清軍潰散後，「拳匪」、「馬賊」繼續反抗。

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唐才常自立軍的集會地起義。

浙江——有白旗黨、百姓攻、帝教起事，攻破江山、常山、開化三城。

江西——各屬會匪、疍匪、土匪起事，江西的王兵忽移江撫急電，飭令折回赴省防。

福建——漳州百姓聚眾拆毀教堂，欲與各洋教士為難，勢甚洶洶。

四川——四川武備學堂肄業生為會黨率涉者三十餘人，該省當道密派文武員弁帶兵將學堂圍住，悉行抽斬，脫逃者僅有一名。其湖北調往之領班學生數人亦在其例。

廣東——駐滬總領事得九月十五日駐粵美教士來電云，廣東三合會匪九千人歸二人統帶，一為孫文（譯音），一為楊某（譯音）。其宗旨與清人為難，已敗，官兵刻下佔據沙灣。

雲南——雲南府回匪起事後，凡該處之內地會，聖書會等教堂均被拆毀。法兵現已調至蒙自，

亂匪聲言於某日抗拒法兵。聞省法團官民暨教士等均已離開矣。

陝北——延安府屬境，突來蒙古人之習拳者則教為難。

義和團運動確把全中國震動起來，各省新舊起義團體到處發動，連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上海租界

也「謠言繁興，人心惶惑，無識之徒，紛紛遷徙，自相驚擾」（上海各國總領事告示）。這是說，租

界中商民不信租界當局能保護生命財產了。逃亡到陝西的清政府，依然荒淫搜括，陝西人民飢餓「致

有食人之事」（西安電）。十月，「甘肅省回匪四萬五千人揭竿起事，以逐滿為宗旨」（字林西報）

。西安回匪業已作亂」（德文報）。這個極度可憎的滿清政府，一面由各省「勤王兵」深譴，一頭

催促李鴻章急速簽訂條約，延緩了卑污恥辱的殘命。

第七節 英帝國主義指使下的分裂運動

鴉片戰爭以來，英俄兩大國相持不下。甲午戰爭後，德日兩國勢力伸入華國，英日為一夥，俄法德為一夥，英俄對立形勢愈益尖銳。政治上西太后李鴻章親俄，光緒帝親英，前佔優勢。經濟上俄在北方雖也不弱，但在全國則居劣勢，貿易上尤處劣勢，舉一八九九年海關貿易為例，是年海關所收稅銀按百分比，英商佔四十，美、德各佔十三，日商佔二十五，華商佔九，瑞典、挪威各佔八，鴉片稅佔四，俄商只佔一分。按東三省地區說，牛莊貿易總數四千八百萬兩，各國商船進口共五百七十二艘，內日船一百九十六，英船一百八十五，華船一百十二，其餘各國八十九，俄船止十三艘。俄對華貿易總數二千二百萬兩，還不及各國對東三省貿易總數的一半，俄處絕對的劣勢。除了商業部份，下表可略見各國在華勢力的比較。

鐵路	財源	練兵	租借地及勢力範圍
(一) 東三省鐵路	(一) 全國海關	(一) 江南洋操場	(一) 威海衛
路	俄	德	英
(二) 唐漢鐵路	(二) 沿江六省	(二) 湖北洋操場	(二) 九龍
	俄	德	德
	釐金		
(三) 山西鐵路	(三) 山東全省	(三) 膠州旅土	(三) 長江流域
	俄	英	英
	國稅	德	
(四) 山海關至	(四) 東三省礦	(四) 東三省洋	(四) 旅順、大
	德	德	

牛莊鐵路 英

營口 俄

遼 俄

遼 俄

(五) 濟南鐵路 英

(五) 華俄銀行 俄

(五) 直隸軍隊 俄

(五) 長城以北 俄

(六) 津浦鐵路 英

(六) 德華銀行 德

(六) 五院軍訓 德

(六) 膠州 德

(七) 山東鐵路 德

華俄道勝銀行 德

(七) 威海練土 英

(七) 廣州 英

(八) 滬甯鐵路 法

華俄道勝銀行 德

(八) 福州船政 法

(八) 兩廣 法

(九) 北海南寧 法

納租課，鑄造 貨幣類似肉庫 的特權。德華 銀行也有同樣 企圖。

(九) 福建 日

(九) 兩廣 法

(十) 粵漢鐵路 美(未定)

鐵路 法

全國海關按條約永遠請英人任總稅務司，沿江六省(包括浙江)完全也歸總稅務司管理，御史鄭炳麟奏所謂「我中華財賦全視海關出入，若一失歡心，則財源立竭」。就是說立即制清政府的死命。

英人掌握財政權，及鈔與沙俄各補優勢相對抗。英和國爭起，沙俄攻佔東三省，英國計劃知佔長江地

廣，再與各國爭華北權利。庚子以前，英國報紙會登載所謂「瓜分中國和平會」章程，主要條件有：

(一) 每國派會員兩名，全權處理會事；(二) 各國佔領之地，均各國管轄。應根據此項商辦所辦

...

之多少，及該國權力的優劣，後隨國分界限，(三)所有中國土地，既為英國管轄，任出(國通商)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庚子年英國進行分界運動大體按照這個「和平台」的預定計劃。

(一)長

江方面

五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對外宣戰，兩江人劉坤一、兩湖(張之洞)與廣(李鴻章)五約「凡二十四日以後之上諭概不奉行」，事實上等於以上各省對清政府宣告獨立。西太后要「各省召集義民成團」，劉張說「沿江一帶會匪、鹽梟、安慶(清)道友甚多，與拳台各自為營，名號皆悖逆之語，並無奉命之黨可招」。西太后要「暫行停辦洋款」，李劉說「洋款若停，京餉及北上諸軍餉項無從接濟」。西太后要李鴻章迅速來京，李鴻章謂望不行。西太后要劉坤一帶兵援助，劉坤一拒編北上。李劉放於還抗西太后，這些阻量的來源當然是英國。

六月初，胡劉坤一出面，約請張之洞參加東南「自保」。大買辦盛宣懷，代表劉張與外國交涉，以「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為主旨，與各國領事訂立「東南保護九條」，完成了英國的初步計劃。

七月，英國計劃被法國揭發，巴黎報紙表示「法人甚恐中國從此分裂，再越一二月各國必因此爭，自相殘害。法人謂英國之意，甚願南北分裂，似有容以南京為東南敵省之都城。如果實有其事，法國為自保起見，亦不能不有事於漢粵」。英法兩國想通過康有為使自立軍起事，宣布東南「獨立」，選擇張劉中一人為東南「獨立」的政府首領。經法德(德國所擬和條款，其中一條是「仍宜以北京為都，南京過於近海不可用」)等國反對，故與東南「獨立」的計劃，借給張之洞英金七萬五千磅(合銀五十萬兩)，專供湖北軍費，唐才常自立軍總部失去英租界的保護，被張之洞破滅。自立軍失敗，表示長江分裂運動的中止。

(二) 粵東方面

英政府對於在廣東設一「獨立」政府，香港政局自英租界人何啓事先取得港督卜氏的同意，與香港與中會員陸少白密商，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聯合救國，由李首向政府宣告願讓自主，而總理（孫中山）率黨員佐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陳少白使人約請「李鴻章幕下」的要人劉學詢（特務兼買辦的洋務派）從中力助。他甚以為然，答應相助（陳少白與中會革命史要）。何啓擬定上香港約督英文稿，由與中會全體會員署名，送給總督，當然港督「極表同情，因向李鴻章再三接洽」。李鴻章「對卜氏提議，頗表示好感」。劉學詢寫信給孫中山說：「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校同進行」。孫中山借端辭謝，日入宮崎等到香港，劉學詢派安南兵輪在港等候，專送孫揚二首領過船開會。這是特務們的毒計，不管兩廣是否「獨立」，先捕獲革命黨首領總是一件「奇功」；孫中山得與中會員報告，拒絕往廣州。李鴻章深信沙俄定能保護四太后，在一度動搖以後，決心北上。七月初，離粵到上海，觀望形勢。路過香港時，能督竭力勸告，「使與民黨合作，謀粵自主」。李鴻章「意志堅決，無法勸阻」。英國分發計劃圖遭受挫折。英對與中會似乎興趣更淺，因為與中會提供的條件比自立會優厚。摘要比較如下：

與中會平治章程六則

自立會對外宣言

(何啓起草)

(容闈起草)

(一) 遷都於適中之地（如南京

漢口）

(二) 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各

省立一自治政府。設立臨時

復光緒帝，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憲
治國體，以立憲自由之政體繼與之

會，以法京公使爲中央...

會當時顧問局員，以目前

各國之總領事爲各省總長

暫時顧問局員。

(三) 公使制於天下。

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財產，保護租界。
勿驚動教堂。

(四) 增添文武官俸。

(五) 平其政刑。

所有清國專制法律，建設文明政府後
一律廢除。

(六) 變科舉爲專門之學。

英國分鑿計劃遭各國反對，俾德政府又不易成立。它改變政策，主張「保全中國」，恢復光緒帝大權，力行新政，令西太后退位，不再預國政。沙俄主張「恢復舊政府而略加改革」，這就是支持西太后政權，取東三省作報酬。英故在這不同主張上對立起來。北京失陷以前，英俄都主張分割中國，北京失陷以後，英倡「保全」，俄倡分割。美日助英，法德助俄，八月英德又聯合反俄，才取得安協，成立辛丑條約。

第八節 帝國主義間分贓鬥爭

甲午戰爭的經驗，列強相信只要近代軍隊一萬，就可橫行於整個的中國，中國民衆在不可忍受的

滿清統治下依然馴服不動，這又使強相自信信其所爲，決不致引起反抗或仇恨的事情出來。他們以爲瓜分一個「東方病夫」的財產，是不會引起反抗的。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瓜分中國論在國際間特別盛行，強盜們止感到一點困難，即如何分贖物，英國其大臣在議院宣佈：「我歐洲諸國，對東方之事，常互相猜忌，如此則徒就誤時日，坐失事機。爲今日之計，必歐洲人各泯猜嫌，各商善法，然後亞洲乃可以落吾手」。『瓜分中國和平會』章程的發表，顯示英政府企圖用「和平協商」的方法來瓜分中國。這自然是一種空想，因爲英國想從「和平協商」中取得中國三分之二的利權。

義和團運動爆發了，強盜們認爲機會到來，藉口「援助中國政府鎮壓叛徒」，實行軍事進攻，從準備進攻大沽口到攻陷北京，英國利用「討伐叛徒名義，組織了各國在直隸省的共同行動，同時在中國中、南部利用「反滿」（南部），「反舊政府」（中部）名義，進行着分裂陰謀。別有企圖的沙俄也不得不參加西寧兩統率的聯軍。這一時期，英國儼然是瓜分中國的領導者。北京失陷以後，軍事、外交方面，各國間都表現出意見的分歧和利益的不同。那短時期的共同行動已經過去，暫時隱伏的敵對現象又復重現，每個國家都想用自己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法國外交部長宣言「如欲中國兵事早息，各大口必須各無猜，會同辦理，無論各國所懷之意如何，總不可向中國有所他求（割地），如是則歐洲和局可保」（八月初六日巴黎電）。分贖小均有引起各國間戰爭的危險，阻礙了瓜分計劃的實現。不過這只是次要的原因，侵略者並不畏懼戰爭，瓜分殖民地本來是用戰爭方法解決的。阻止瓜分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人民的反抗，侵略者從來不會預想到會有這樣的反抗。

各國不可解決的矛盾歸納於下：

英國——確實保持既得的權利並增進政治和商業的地位，不讓沙俄在中國北部擴充勢力，也不願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滿洲。對清政府主張帝后。它要壟斷長江流域，遭各國全體反對，「認

爲時難坐視」(瓦德西語)。

沙俄——企圖獨佔東三省。暗中允許援助西太后，而暗地實行大政策，「溫和手段」，來減輕英德對清政府的壓力，它不願西方列強利用條約限制中國的財政管理權或增加通商的特權或改變獨斷的政治制度。它的獨佔東三省，避各國全體反對，認爲必須「退還中國」。

德國——德國利用克林德事件，主張極端的強硬政策，就是說，要瓜分中國。駐軍統帥瓦德西在起程東來前兩個星期，常到柏林外交部參閱有關中國的文件，並以瞭解中國的形勢。他在筆記中會說：「我國對華政策，除無德華人外，並無預定之目標。德國祇有瓜分中國之渺茫的觀念，然其主要的，實欲在世界政治舞臺上一顯身手，初不計其結果如何」。因爲它的野心被事實阻止，閏八月二十三日，英德簽訂協定。相約不在中國獲得領土利益，維持中國領土不變更。英德協定成立後，英、法、俄、日、俄、美六國先後表示贊同，列強間衝突才開始和緩起來。

法國——法國雖然是沙俄的聯盟，但只對於反對英國擴大商業利益及反對改變中國政治組織兩點，贊助俄國。至於德俄稱首及要求担保等事，沙俄相反，主張俄國的地位。

日本——日本早想乘機派多數軍隊，在聯軍中爭取重要地位，西摩爾聯軍被圍擊退，北京形勢形勢迫切，英國請日本出兵，並願「爲財政上之補助」，日本出兵二萬五千人，任聯軍主力，戰鬥十分出力。它是後起的強國，有吞併中國的野心，不願德佔山東，認爲「各領其分」，也不願俄佔東三省，認爲必須武力排除。因此反對瓜分，對清政府表示和協態度，藉以換取清政府的好感。

美國——庚子以後，美國成爲對華主要侵略國之一。原因是，美國在東亞與商業軍閥很發達，美國與西班牙開戰中奪得西殖民地菲律賓羣島。它在遠東第一次獲得領土，基礎不同，參加瓜分中國運動，對本身不利，因此它反對瓜分。一八九九年，國務卿海約翰宣佈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就

政策一兩要列強謀取在華租借地及所謂「勢力範圍」，使美國享有均等的利益與機會。另一方面，中國內地全部開放，使外國人享有投資權利。中國是喪失治外法權的半殖民地國家，凡外人所到的地方，侵略勢力隨之到來，如果「門戶開放」政策徹底實現，中國就完全變成殖民地。英國首先贊同，德、俄、法、日、美五國先後隨聲接受，美國從此成爲以經濟侵略作主要手段的對華侵略者。

對德壓緩和圖，美國特別積極，當然它正在瘋狂屠殺菲島「叛亂者」，引起一部分輿論界的批評。它利用故意誇大的關於義和團方面接人的報告，在報紙上大事宣傳，指以說明美國對於菲律賓的「叛亂」應嚴加壓制，否則菲律賓也將產生可怕的義和團。因爲它對中國抱着「門戶開放」的野心，堅決反對瓜分，希望締結「種和約」，能擴充商業企圖能機會及改進中國對「交涉的公案」(即改互商推委的總理衙門爲部長負責的外交部)，關於懲辦禍首，賠款，保證等問題，它贊成俄日的「寬大政策」，「溫和手段」，就是說，不反對西太后的頑固政府。

奧、德、西、荷、比五國——奧地利、義大利兩國追隨德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三國追隨法國，在聯軍中不起什麼作用。

以英俄爲首的兩個侵略集團，借義和團事件，各謀實現自己的野心。但各國對義和團的複雜，不可能求得一致，從「瓜分中國」轉到「保全中國」，中間經過三次「門戶爭執期」：(一)英俄主張瓜分，雙方爭奪清政府；(二)英俄爭領國，英德商量協定；(三)英德日在庚子後扶帝開局上對俄美交涉

(一) 英俄

主張瓜分

庚子年三月

初至八月初

旬

三月初，德總統和國聲勢漸盛，英美聯合德法俄要求清政府「一律驅除」。五月初，各國派兵進京保護使館，英俄各調大兵準備行動。俄調兵便利，聲稱準備保護蘆漢鐵路，又通知清政府「貴國願藉客兵以平亂，俄國願承斯乏」，這都是反對英國的表示。日公使照會清政府「如欲俄國調大隊兵士進京，則日本調兵進京之數自必照加一倍」。俄對佔據北計劃被阻止。大沽口失陷後，英俄兩集兩矛盾更顯著。俄國允許暗中阻止聯軍進京，清政府允許增進俄國在北方的地位，聯軍攻天津，俄軍借口英軍供給不足，餉，宜允許增進俄國在北方的地位，聯軍攻天津，俄軍借口英軍供給不足，餉，宜聯軍進攻北京，俄法德軍自走一路，北倉大戰，俄法兵戰後才到，說是路被水淹，不使行走。俄國計劃關內主線進，使聯軍停嗎在京津路上，關外主急進，用最殘暴的屠殺手段奪取東三省。同時英國在中部、南部製造獨立政府，對京津戰事主急進，以便成立光緒帝當權的親英政府。北京失陷後，英俄德繼續增調海陸大軍，日本調德精兵四萬五千人聲援英國，軍事上英國較佔優勢。

(二) 英俄

爭與國(八

月中旬至四

八月底)

八月初，俄法承認德將瓦德西為聯軍統帥，俄法德聯合，撤退原來的統帥英將西摩爾。八月中旬，俄國通告美國說「中國皇太后已願保護各國商務利益，並設法平定土匪，使地方永遠平靜」。又聲明「本國並無向中國索地之意」。美國同意俄國撤退北京駐軍及承認李鴻章為聯軍和大臣提議，法國也聲稱同意撤兵，外交上俄國獲得優勢。英國反對撤兵，宣言「即使他國退兵，吾英必須留兵北京」。瓦德西率陸軍二萬二千人，戰艦九萬噸來華，原想大有所獲，當然反對撤兵，這樣，英德意見接近了。當時各國爭執的問題，形式上是先撤兵後議和。

俄美主張)與先請和後徵兵(英德主張)；實際是選擇自己合意的傀儡——西太后或光緒帝。潤八月下旬，英德訂協定。俄德與前加派「頭等鐵甲戰艦三十艘來華防禦」，說明外交上英國獲得勝利。

(三) 英德日

對俄美法讓步

(九月初至十

月底)

李鴻章自上海到天津，清政府指定乘俄國兵船，到京後，寓所由俄兵保衛。當時所謂議和，實際是該慈節禍首西太后的問題。其他條件次要各國提出，清政府一律接受，決無異議。英德日主張「須俟中國立有合例政府方可開議」。就是說，不承認禍首西太后的政府及其所派議和大臣為合法。俄美法「認皇太后為合例」。資國賊李鴻章秘密出賣東三省，請俄國主張「兩宮仍復臨朝」。英日決心準備另一戰爭去解決東三省問題(英日同盟與日俄戰爭)，對西太后問題讓步，藉以換取絕意開列的條件，即所謂「不能換回的條件」。十一月初一日公使國提出議和大概十二條，西太后接到這個免罪救書，立即「全行照允」，她的統治地位，重新得到保證，從此一意安心充當「足適諸國之意安辦」的奴隸總管。

第九節 辛丑條約與東三省交涉

西太后依然執政，引起全國維新派人士(包括保皇黨)大憤恨。這一派人原想英德日主張獲勝，「光緒皇上復辟」，中國再行新政。議和大概發表以後，這一派人失望了，西太后要和緩這種不滿情緒，(也是對外國表示態度)二月初十日，下了一道預約變法的上諭。她首先肯定變法的性質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絃」。這就是專制制度風古不變，不抵觸專制制度的舊法可以變通。其次她叫奴才們備變法，「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

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發當待，道內外交官各舉所知，各行所見。戊戌新政最重要的「民權」。她却說是「康逆之談新法，乃其法也；其禍更甚於紅拳」。其道醜惡的上諭確也誘惑了不少維新派。廿六日又下一道所謂罪己詔，對洋務派「新政」予以斥責，說「各省平時無不日以自強為辭，究之臨事張皇，一無可恃。近二十年來，每一有變端，必申一番詰議。臥薪嘗胆，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以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洋務派「新政」久被維新人士攻擊，公認爲羈縻民衆的弊政，怪罪已昭明白斥責，又誘起不少維新派的幻想，以爲這次變法，總在戊戌變法與洋務派「新政」之間，不滿情緒漸變爲善意的盼望。西太后對外賣國，對內欺騙雙方成功，頤利的恢復了總攝地位。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月李鴻章代表滿清政府與德、奧、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國公使簽訂辛丑條約十二條。依據這四條約，中國半殖民地程度又大進一步。第一、財政經濟大破壞。賠款按中國人口數每人銀一兩，計四萬萬五千萬兩，四釐起息，分三十九年本息還清（一九四〇年）。共計九萬萬八千餘萬兩。鎊虧（銀兩換外幣的虧折）平均每年約三百萬兩。當時海關稅每年約收二千數百萬兩，除海關稅、鹽稅三項充實金來源，遠不足應籌銀數。清政府強迫各省每年撥派二千數百萬兩（最貧瘠的貴州省也撥派二十萬兩），才勉強足敷（不足時借外債彌補）。國內所有重要稅收（除田賦）全被外人管理，清政府不得不另立捐稅來填補已失的財源。這樣巨大的負擔，全部加在從業生產的工農層上，自然人民生活愈益窮困，社會經濟愈益凋敝。第二、確定中國政府的性質與任務。條約規定「永禁創設或入與諸國仇敵之會，若有者斬。諸國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文武大小各官，倘遇有傷害外人之事，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官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明白一點說，就是中國人民被認爲奴隸，永遠不得反抗侵略者，中國政府及其官吏被用作大小奴隸管理員，負完全責任侵略者殘虐人民的反抗行爲。第三、國家主權的喪失。使館界內由使館自行防守管理，從北京到山連湖，沿鐵路重要地區，外國派兵駐守。拆毀大沽砲台。北京城內由外兵駐紮監視，這還像一個國家不做呢？沒有人民努力反抗，中國早被那些奴隸管理員斷送乾淨了。

七月，辛丑條約簽字，列強完全滿意。八月，聯軍自直隸境內撤退。流亡在西安的西太后也完全滿意，又回到北京來繼續其腐敗的統治。

庚子七月，她挾着光緒帝，帶領一次皇室、官員、太監、軍隊逃出北京，經山西逃入陝西。凡是這一羣所到的地方，人民無不遭殃，比任何盜匪都兇惡，因爲他們都是「合法」的盜匪，用各種方法向人民掠奪。

軍隊——西太后帶京兵，馬玉琛兵二千餘人出逃。沿路掠奪，「各舖戶均閉門逃避，到處均無從購物」（兩宮西狩記）。後來軍隊增加，作惡更大，「官軍任意剽掠，沿途搶奪婦女，披隊時隨處留道至數百人之多」（十一月上諭）。「兵勇佔住民房，諸多騷擾，以至商旅裹足，糧食日昂」（十月上諭）。僅據這些自供，人民受禍程度可以想見。

官員——大批官員到西安當差，沿途勒索酒食錢財。例如河南地方，「餉差、貢差以及官眷出境，類皆勒索酒食，車馬舍館供應之外，又折價銀，甚且毆打勒索家人」（九月上諭）。

貴族——王爵每日給津貼銀六十兩，依次遞減。這些人毫無所事，政府大修戲園，召北京名角演劇，讓貴族官員「娛樂如太平時」。

太監——西安傳聞異常混亂，賞罰無準之權，太監李英實主之（字林西報）。各省貢物仍循舊案取規費，多達三千餘百兩（如浙江貢費），少或一千六百兩（如湖北貢費），否則惡懲貢物。

商店「最相太監買貨，不肯給錢」。孔與西太后有關的大小事件，承辦人必須送太監「宮門費」，例如西太后每餐要吃燕菜一籠，地方官每天送宮門費三百兩，才收受這碗燕菜。

這一大羣盜匪的總幫首自然是西太后。她沿途看戲作樂，到西安每天看戲，令各省進貢名貴食物，每天膳費仍開支二百餘兩，還是「可謂奢用」。養乳牛六頭，每月飼養費二百餘兩。一大羣盜匪獨得陝西「人相食」，甘肅回民起義「逐漸」，他們才感到不安，密電鄂督張之洞：「陝西奇荒，兩宮萬難駐蹕，擬暫幸湖北」。這個專橫「三綱五常」教人的張之洞，居然表示拒絕。他們想到四川去，又被川督奎萊拒絕。慈禧電李鴻章「兩宮月下所處之境甚苦，務須抑體上意，早安大局」。西太后盼望李鴻章賣國成功，如飢如渴。她說「我一日不見京電，便覺無措，然每見一電，喜少驚多，心實隱怯」。公使團提出議和大概，這才使一羣盜匪大喜，專等聯軍撤退後回據老巢。

辛丑年八月，西太后帶行李車三千輛，出灑關經河南、直隸回北京。到開封辦了一次「萬壽盛典」，又收得無數貢品。她經過的道路，全用發光的黃土鋪平，使其細軟，大隊人馬走走不聞脚步声。鋪路費每一英里需一千英鎊，地方官勒令沿路人民用毛帚刷路，不許黃土中有一小石塊。大路兩旁結綠掛燈，設立香案，陳列糖果細餅，供盜匪們任意取食。她進宮第一件事就是發掘逃走前埋藏的金玉寶器，果然並未喪失，奴才們跪下磕頭對他賀喜。她的統治地位因辛丑條約得到保證，「大修頤和園，窮舞奢盛，日費四萬兩，歌舞無休日」。凡外人有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不時入宮聚會，與聞內政」。半殖民地政府應如何替侵略國服務，她現在完全學會了。

與聯軍侵略同時，沙俄佔領東三省。庚子八月黑龍江、吉林失陷。前八月，俄軍入瀋陽。中俄進行交涉，商談賣出東東三省的條約。各國阻止清政府簽約，日本尤堅決反對。劉坤一、張之洞聯名勸政府與英日拒俄。李鴻章力主簽約，說「各國強敵，全係日本從中唆弄，國匪乘隙發難，易為其誘」。

所動（辛丑正月電奏）。他公然攻擊劉張是英日派，是見賣國情急，不惜揭發敵敵的面目來達到親俄派的目的。二月，俄提出最後約稿，限期畫押，不准更改一字。日、英、德、美及劉張極力阻簽，四太后電令駐俄公使楊儒「全權定計，朝廷不爲違制」。李鴻章電令楊儒「即酌量畫押，勿誤」。『即畫押勿誤』是西太后李鴻章的真意，『全權定計』、『酌量』是日後推卸責任的詭謀。楊儒不敢負責，國重責，堅持非奉確旨不畫押。清政府在北京公使團壓力下，通知各公使『中國不敢違允俄約畫押，請先議公約』（辛丑條約）。俄約拒簽後，李鴻章仍許俄公使『俄公約定後再畫押』，決心出賣東三省。但各公使是不允許的。政敵張之洞大肆攻擊，說『若仍允畫押，則是貽笑外人，前功盡棄，各國必怒，起而效尤』，盡揭楊儒他的罪惡。這個七十八歲的老賣國賊『憂鬱焦急，肝疾增劇，時有盛怒，或如病狂』。九月，吐血斃命。臨死時，他向西太后保薦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說『環顧宇內人才，無用袁世凱右者』，賣國衣鉢傳授有人，老賊死了等於不死。

第十節 帝國主義者認識了中國人民

義和團運動是落後的中國社會產物，它不能提出進步口號，是很自然的。但是同樣的運動不產生於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產生於中國，表現出華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使高談瓜分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認識『中國羣衆含有無限蓬勃生氣』。『近年以來，瓜分中國之事，爲世界各國報紙最喜討論之題目』（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運動以後，各國報紙再不喜討論這個『題目』，爲什麼呢？因爲『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爲下策』（瓦德西對海軍特務員談話）。義和團『滅洋』戰鬥是慘敗了，義和團運動却阻止了各國階級的瓜分運動，這一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該行不法的教士、教民，受了護照國邊界的保護，改其惡劣的態度，從此就安清少，民教逐漸相安。英外相在英國傳教會演說：『外務省深不願意於傳教之入。此次中國之事，確係傳教者所致。我勸諸君以後傳教，不必過於喧嘩，總以安靜為主』。印度總督古爾遜也說：『按一八九〇年傳教之男女共一千三百人，而華人之從教者僅三萬七千三百人。計一教士得三十徒耳。以中國戶口總計之，僅一萬人得一人，經營五十年而所得止此數。事之無益，從可知矣』（教士論）。他勸英美教會『慎選教士』，勸教士『自愛以防後患』，說明侵略者不再利用傳教作明目張胆的工具，教堂也不敢濫收教徒，向平民故意尋釁。

各國統治人士對中國人民有了新認識，因之改變舊的侵略方法，提出各種新法來。

英外部副大臣在議院演說：『中國此後仍須以華人治華地，凡有意開通中國之人，應須小心謹慎，團體之事即可取以爲鑒。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國也』。

奧京某報說：『近日中國北方之事，實因歐洲各國往往無理干預。惟恐害洋人身家性命，理應各國合力剿捕，所慮者今日平之，明日復起，則又將奈何。計惟有以西學教華人，與我洋人無異，然後可望太平耳。各國其慎思所以待華人之法，勿仍蹈前四十年之所爲』。

法蘭西國會演說：『中國地土廣闊，民氣強勁，殊非印度、南洋各處可比。華人久受政府壓抑，故智力羸弱，若從而獎勵之，誰敢謂亞洲堂堂之大國，無事虛煩其人者起。吾故謂瓜分之說，不啻夢也。爲吾西人計，莫若於廣索領土及開通口岸兩端』。

以上三說，一致放棄舊的武力壓迫，改爲以華治華、文化、經濟侵略等新法。英國變態的重要代理人赫德著『中國實測論』，發揮以華治華說尤爲透澈。摘錄於下：

今次中國之問題，當以何者爲其鍵而成和議乎？大率不外三類：一曰分割其國土，二曰變更

其皇統，三巨扶樞爲洪政府是也。然變更皇統之策，終難實行，因今日中國無一人肯背離皇國之寶望，若強由此策，則皇室相續，迄無寧歲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栽植滿清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則亦不能銷後來之禍根。故論中國最終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所逃避，而無奈瓜分政策，不可遽行於今日。蓋中國人數十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共和國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爲目的者也。雖此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塗地，然其始羽檄一飛，四方響應，非無故矣。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滲透全國。他日必有共和國之子孫，軍格林之砲，肩毛瑟之槍，以行今日義和團未完之志者。故爲今之計，列國當以瓜分爲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時當一面設法，順中國人之感情，使之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軋於我歐人。如是則所謂『黃禍』者，可以烟消燼滅矣（飲冰室辛丑集）。

胡適居留中國數十年，精通中國國情。他看出我中國反抗精神的危險，但又看出中國人正統思想（情性）的弱點大可利用，因此選定『栽植滿洲政府』爲治華上策。別一深通中國國情的美教士丁德良（北京同文館總教習），擬策陳五條，送公使國核議：（一）使皇上復辟，歸各國協同照料；（二）廢除皇太后之政令及其所用人員；（三）皇上復辟後所有新政，須各國許可，然後可行；（四）各國可將其分界分別清夢（勢力範圍），每國應派一人管理各省政府所爲之事；（五）各國宜設一公會，凡與各國利益有礙者可調詮之。他在說明中指出『中國不可使一概自主，以上數節可使中國不亂而便利新政，且得智慧強人之助。否則惟有廢去大清政府而瓜分之耳。此事一辦，則後來戰爭之日無已時矣。如按照吾言行之，各國則得以時使其政策合用，而中國之法亦可漸變，其所得者較瓜分爲多也。再治中國須以華人，無他術也』（登載京華七日報）。公使國探納德、丁德良的意見，技巧的

選用判決和條約裏，第一，保存一般人認為正統朝代的滿洲政府，第二，恢復封建專制制度，第三，公使團充任實際的各國「公使」。英德日放棄「光復復辟」的主張，同意俄美法的「兩宮仍舊臨朝」，因為前者認識到西太后比光緒帝更適合於外國的運用，光緒帝多少是傾向「民權」的。

最瞭解中國情況的要推瓦德西，他在給德皇書裏很明白的解答了瓜分問題。他說：

「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直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當然還有奴顏婢膝的兩外部份）。至於官吏人員，則為衛教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之可言。」

其在皇室方面，則又似乎不能再行產出振作有為之人也。」

整個統治階級腐敗不堪，侵略者看得如此真切，瓜分論的根據就在於此。但在義和團運動中，他們又發見了另一方面，他說：

「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能忘者，即中國領土之內，除開西北兩面之屬國不計外，共有八口四萬萬，均係屬於一個種族，並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

此外更有一事亦復不能忘去者，即吾人對於中國羣衆，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運動空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動機可惡諸性，以及守法易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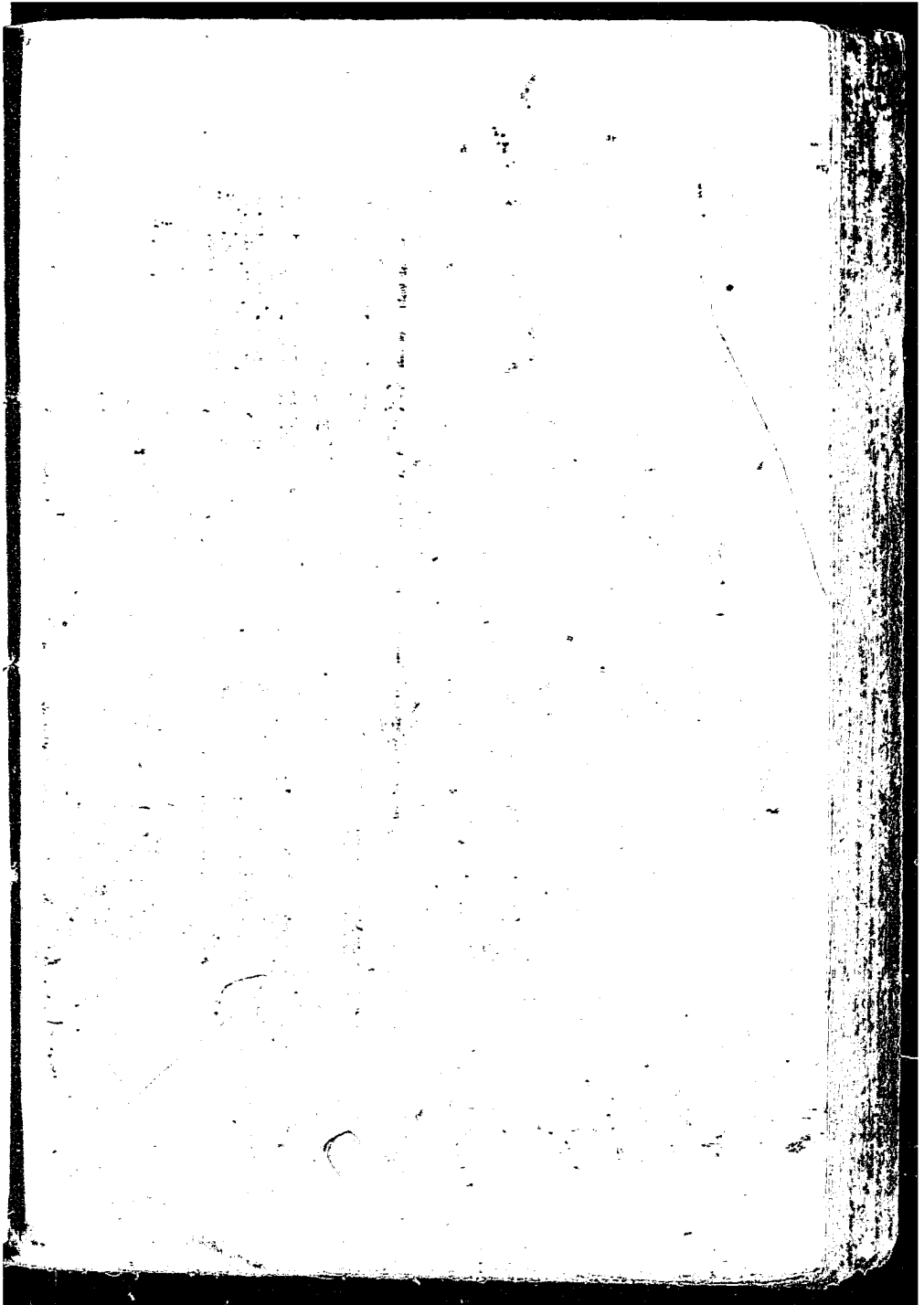
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尙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常有十萬人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戰，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大部份甚至於並火器而無之」。（義和團失敗之由於愚昧落後，武器不是主要原因。）

偉大團結的民族思想，生氣勃勃的羣衆，勇敢堅切的反抗精神，這些，他們以前都不曾仔細考慮過，瓜分論必須停止的原因就在於此。那末，帝國主義者怎樣進行侵略呢？瓦德西這種兩種方法：

第一、重慶經濟侵略。理由是「扶助中國，使其經濟發展，國力增強，而吾人商業競爭，當益亦將隨之而進步。至於併吞土地一事，與其謂爲促進商業，則毋寧謂爲阻礙商業」。所謂所謂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當然是發展侵略者的經濟，增強侵略者的國力，到一定時期，經濟帝國主義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

第二、阻止中國進步。利用中國人民覺悟程度低下，適行反動統治之法，甘受專制政府之治，永久沉溺在奴隸生活中。他引證一個中國老人的宣言說：「我們自四百年以來，皆在睡夢之中，但其間我們深覺安適無已。你們白人，必須從我們醒覺，則將來終有一日，你們對於此舉，深爲扼腕。」他同意常聞老人的話，斷言「助中國進步是完全錯誤之政策」。

外國侵略的深、與人民覺悟的提高是不可解決的矛盾，中國歷史在這個矛盾中繼續演下去，轉和圖懣教訓了中國人民，拋棄舊式的起義，轉向自覺的民主運動。



附錄 漢奸創子手曾國藩的一生

滿清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滿漢不分，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權——各省督撫滿員常佔十之六七。總之，滿員掌握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是龔彰阿，沿海各省，直隸總督琦善、山東巡撫託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福州）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就中除林鄧二人，全是滿員。帶兵大員奕山、李經，驍和大員習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昏庸貪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又爲滿員所壓迫，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會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會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三個漢人，因爲他以血脈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337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爲首的滿族統治集團驚惶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命儒臣獻上朱熹大原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篇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滿漢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尙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從這些講義看來，他也知道致治太不「中和」，太無「德」「惠」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才們求助，大罵軍臣道：「試問諸臣半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爾等甘爲大清國不忠之臣，不

「俱應行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甄鍾榮主考拍發（滿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頗深，並不能「爲士於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閱奏章，幾百嬪嬙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病死了。

會國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清統治者壓迫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肅順公然宣佈「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四五年（咸豐四年）會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圖會國藩一書生，乃能健此殊勳。」漢軍機師萬藻深媚道：「會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倅驟起，從者萬人，豈非國家之福。」咸豐帝被他提醒，臉色變了，半天轉不過氣來。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信任會國藩，專指望向榮（江南大營）、琦善、托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北兩大營）這些滿族將領的勝利。雖然他們的所謂大營也是專靠漢將漢人支持。會國藩這時候還得掌握一部分兵權，這就全靠肅順極力保薦。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棟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在會國藩爲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後，那拉氏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會國藩兩江總督節制蘇浙閩省的重要地位，經過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會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種澆滅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會國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爲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殘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會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富農家的子弟，這一家人都有殺人的癖性。他和會國榮、會國華帶兵

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大發財團」爲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會黨深研程朱道學，熟悉清朝政制，當革命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啻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方面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却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聚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奉這個會「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動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痺青年的經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們不懂得會黨那套反革命本領，止能暫時摧殘太平天國一類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拿到今天來破壞久經鍛鍊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民主事業，就決無成功的可能了。

會黨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爲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 辦團練

（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廣西永安時不超過一萬人（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因湖南天地會員的加入，人數大增，首領衡山人洪大全，會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死後，天地會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響本地會黨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還說給當地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的機會。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的財產，一方面也便他們藉以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轉轉

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說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時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漢奸——却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勁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

會黨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為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人關係親密，善講滿清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這些條件也幫助了他。咸豐二年，會黨潘雲母在家，咸豐帝叫他幫助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止是「搜查土匪」。次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說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低等的紳士）當團紳，在本地清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分子）；他所說的練則是訓練鄉兵，集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辦團，不重在對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發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有約束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却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募勇訓練，不讓地方官辦訓練錢，既免分他的兵權，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說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時招募）代官兵（綠營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衛，藉以減輕、避免各方面的阻礙（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視、排斥，鄰省的求援，咸豐帝的嚴令出戰，新兵的不願離鄉土），並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會黨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網，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發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他那種瘋狂的屠殺，連巡撫司道等大官也看得太無人理，

與他爲難（主要是反對他越職侵權）；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會剿頭」，形容他殺人像剃頭髮那樣多。他感覺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個奏章，說「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嚴勤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豐帝大加褒獎，發勅他「務期根株淨盡」，巡撫們也就不敢公然對立了。這樣，會匪遂成爲湖南土豪劣紳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成他的對練計劃。

會國器訓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總之即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落後的農民充當以便制馭。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這些人多是羅澤南（與會國器同學，也講程朱道學）的學徒，平時講究所謂「忠誠」，聲稱願爲保衛「聖道」「倫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的主要目的還是爲了求富貴，會國器也不願意羅澤南勢力獨盛，採用收門生的方式，使羅氏學徒等着拜會氏做老師。湘軍大將王珍（即王鑫）不服，說「我的老師是有羅山（澤南）一人」，大起怨的嫉忌，終被排去，其舊部後來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軍。會國器引同鄉、同學、親友、師生四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爲唯一的獨裁領袖。在左系湘軍成立以前，整個湘軍止服從會統領一人，每個營止服從營官一人。各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會國器，不受其他任何人節制。近代死國軍隊從會國器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軍閥軍隊，也繼承到現在。

太平軍佔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會國器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砲，要求咸豐帝向附州縣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砲不封，決不出敵。雖崇拜洋砲，但裝備至，認爲戰勝的決定因素。

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爲一大營，非湘鄉人設官所統

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目、練力、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嚴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交鋒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

湘軍出境，會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池峯白旗照四千張，內指盧、許、許、照、捐延生、孫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反動分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補官，以民殺賊，佐兵力之不足」。（參參江西巡撫陳寶箴）

會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其於爭取湖南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殺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為滿人塔齊布。他練總勇，選練營將領（多是滿人），擬想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欲總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發審局出身的軍官，使絲絲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京，張塔齊布向忠義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崇多隆阿，會一度向他敬禮，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上成軍」。會國藩力求取得滿族統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殺漢族人民，這是小軍閥口上之也弊免引起猜忌。

二 與太平軍相持

（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咸豐四年二月，會國藩率水師軍統帥出戰，首先頒布一道討伐封建離叛的文字。這篇論文充分表

張海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崇天主教。謂田皆天主之田也。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蕩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穌與宣傳原始共產主義，意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衛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份當時還散佈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彬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闕帝岳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之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佈的民族大義，會國澤却一字不敢提到，止說幾句「今天子憂勸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地，盡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會國澤率領若干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反助黑暗勢力，又以投降主義的方法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佔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却不是因為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

們，而是因爲太平軍一部分領袖的短見——他們一到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驕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太平軍到達南京，即採取保守主義。不願勝以主力北上，發動北方民衆，直搗反革命的甚本巢穴——北京（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該黨人得以從容重新調度力量，這是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後來失敗的惡本。不僅如此，太平軍在下游不取上海、江、浙，滿清仍得享受漕米（北京滿人及官員的生命）、地丁、關稅、鴉片捐、外交權等利益，上游不發動，領頭將軍及其他起義軍，空耗兵力與漕漕爭武漢三鎮，旋得旋失，終不能守，在這些方面，戰略上也已處失敗地位。湘軍作戰計劃，先取漢、漢，扼上游形勢，掃胡林翼（也講程朱道學，與左宗棠同學）坐鎮調度，他的反動才能至少同會國藩一樣，有時還要高些，湘軍後方鞏固了。第二步入江西攻取九江，第三步進安徽取安慶，最後取南京。會國藩固守這個方針，即使在危急關頭，也死不放恣（如在江西曾子貽與安徽壽門縣誓死不移營）。太平軍石達開攻江西，陳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總不能牽動他的主力（會國藩部爲甚幹）變換方向，甚至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也不會動搖他的這個反革命戰略步驟。

正當湘軍初次出發的時候，太平軍攻入湖南，進軍長沙附近。會國藩自率一部分水陸軍攻時港，湘勇潰散，會國藩三次投水尋死，都被隨從人撈起。陸軍主力塔齊布，水軍主力楊載勳，彭玉麟攻湘潭大勝，挽救了他的湘軍。他描寫這次戰功說：

「水勇開放大礮，專意射火焚船。是時北風甚勁，順風縱火，酒船則着，自卯至未，燒賊船六七百隻。長髮（老兄弟）、短髮（新兄弟），逐浪飄流，江中、黃巾（太平軍服裝），隨波上下，岸轉水溜，同歸浩劫。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會奏湘潭並港水陸勝負情形摺）

他把慘殺當作痛快，後來每次戰勝，總是用痛快的表情，繪聲繪色的寫出屠場慘景，宛然一幅一

情的地獄圖，向滿清皇帝報功請賞。他的漢奸劍子手立場的堅決，真像頑石一般。

粵、粵港、湘戰後，太平軍退回岳州，會國藩三機軍整水陸軍，裁去潰勇五千，補進羅澤南等營。羅營軍容全是強門硬徒，戰鬥力很強。陸軍有塔、羅，水軍有彭、楊，湘軍進一步堅強了。咸豐四年七月湘軍攻陷岳州，九月攻陷武昌，濟陽，十二月進圍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

會國藩再境作戰，感到三個困難：

第一，太平軍作戰凶敢，「愈剿愈多，愈擊愈悍」，湘軍死傷極重，銳氣摧損。會國藩乃提倡獸性來報仇洩忿，「振作士氣」。例如興國、大冶戰鬥，獲得虜一百三十四名，「概擱月凌遲」，九江城外獲俘虜十二人，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肉凌遲」，武昌城外太平軍新兵戰敗，「帶回七百餘人，全數斬決」。崇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殺死祭陣亡將士，祭畢，令兵刃割去肉生吞。在會國藩性示範下，湘軍的殘忍是從古少有的。例如同治元年七月，湘軍攻破寧國府，「大呼直入，一律斬絕無遺」。過了兩個月，還是「城內外骸狼藉，無人收埋」。（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賊匪逃湘軍的殘暴，野獸派湘軍的貪婪，賊匪逃野獸，才共湘軍的貪婪。三廟同捕這句真話說：「……湘軍以戡民為名，城邑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為名，無分良莠皆資於鋒刃，乘勢淫掠搶掠，無所不至，掃東南數省之精隨，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憊者也。」（仁學卷下）事實上湘軍攻破一城，就是屠城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謂「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批示徐州知府劉傳祚稟）就是全城生命財物，頓是化為烏有。

第二，人民擁護太平軍，敵視滿清。許多記載都說「民賊合一」，「民不恨賊而恨兵」，「賊如虎，沒收富貴人財產」，兵如蛇（無所不取）。「會國藩自己也說：「自岳州至南京數千里，小民盡要餉資，野為窟窟，雖經諭令薙髮，鄉民無髮觀望。官軍稍有趨避，則四野皆賊，剽道易斷。」（水

師攔擊襄河綏軍大勝摺」又說：「官兵有受擾之名，賊匪有要領之禍，百姓不苦怨賊，不苦懼賊，苦心從軍。官兵邊境，無物可供賞給，無人可爲犒師。」（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剿辦摺）。派出探兵，多襲鄉民擄殺，（陳明鄂省援兵擄餉片，會國華確詳三河鎮摺）。於是會國華的款性發洩到人民身上，縱兵擄殺搶掠，殘留的人民，強迫錢錢，作爲投順的標記。英人冷利揚子江日記稱太平軍紀律嚴明，沿途破壞大多爲清軍所爲，救英國援助清軍爲不義，容國內學更痛記對太平軍，「官軍」會作公平的記載，他說：「人民對太平軍較有信用，商不假讓，農不轉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對人民，亦未聞有虐待事，相處甚得。」又說：「涇河（江南運河）兩傍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滿目蒼涼，絕不見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真象（指清軍擄殺破壞），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實由於官軍之殘暴，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努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就是會國華有同治二年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裏也承認太平軍「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民間耕種，公私各半，傍江人民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後，太平軍還是「民心未去」。（劉陳述前李秀成止法片）他爲要取得勝利，乃大燒女殺，做到「男婦逃避，烟火斷絕，耕者無顧稅之收，租率極重」，使太平軍「行無民之境，猶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用」。（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他是長髮人便殺，實際就是見人便殺，從前滿清入關，「留髮不留頭」，殺死中國人民無數，會國華又大殺蓄髮人民，強令中國人民當滿洲貴族的奴役。如果他還有絲毫漢人氣味的話，二百年前雞髮變髮史，總不能無助於心的呵！

第三，湘軍是賊匪訓練，目的在搶掠，搶飽了就叫「患爾」，就是說想逃竄。咸豐四年，會國華對咸豐帝報告攻破武漢以後的情形說：「水師搶船太多，私匿咸貨，破城以後，水陸奔身各獲財物，願有飽得想之憂。」（水師搜剿襄河統籌大勝摺）田家鎮戰鬥「各身應獲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彭在

憐惡絕，太多，爭奪貽誤，又恐衆勇飽則思歸，遂將奪回之船一一並燒毀。」（官軍攻賊兩家運糧處遊船糧）這還不是強盜爭贖的圖畫？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震怒以衛吾（孔、孟）道』？（討粵糧）會國藩要鞏固軍隊，乃用一暗一明兩個辦法。暗的辦法是騷兵殃民。例如湘軍駐紮石壕城，紳士們間接向他訴苦說：『兵勇拆毀房屋，以作柴薪，捉去歸民，爲伊搬運，所有店舖，被兵勇輩佔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竄攫取室中器物，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騷歸民有官兵亦如長毛之狀。』（石壕紳耆致在省諸紳書）這是平時駐軍的情況，戰時沒掠算作軍功，誰敢向他訴苦呢？他在事情無可掩蔽的時候，訓斥軍官一頓，表示維持『紀律』和『榮譽』。明的辦法是虛報戰功。憑他善於做文章，把湘軍戰得戰無不勝，一方面取得滿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籠絡他周圍的軍心。湘軍保至三品以上的軍官，不下數萬人，（陸軍指補小缺請飭部核議片），專賞上湘軍幾乎全部是軍官。兵勇變軍官，小官變大官，使這些人貪利又貪官，升官無止境，貪利也無止境，繼續留在軍營當賊匪。也有整營的官和勇，搶飽了不願打仗，會國藩只好全營解散，另招一營『深山窮谷，苦之民』來補充。湘軍始終依靠『食』『錢』維持它的『戰鬥力』。

咸豐四年十二月湘軍圍九江，至八年四月陷九江，九年六月陷景德鎮，江西入湘軍手，前後凡四年半。中間經無數次大戰，陸軍主將塔齊布、羅澤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時斃命）都被太平軍擊斃，水軍戰敗被分爲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在危急中。會國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從浙江方面獲得閩浙的餉銀、食鹽及上海的關稅、盤金，湘軍不斷潰敗，終得免於散滅。太平軍不出兵取江浙，却在江西與湘軍苦戰，是極大的失策。石達開主持江西軍事，會國藩最怕他，說他『狡猾爲諸賊之冠』。六年八月，洪、楊、韋內訌，石達開馳回南京，咸豐帝喜出意外，令會國藩準備石達開來投降。會國藩到底是老練的，他答應咸豐帝，深怕石達開執朝政，說：『若其石逆勝而洪軍

取，則該逆挾詭詐以馭衆，假仁義以導民（結民心），方且乘機自恣，未必遽有投誠之心。」（江西近日軍情雜報要摺）他又知道即使石版也不會投降，說他會勸太平軍為江守將林啓容歸順，偽造文件騙瑞州守將賴裕新降防地，均無成效，還是切實備戰要緊，果然，石達開出南京後，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會國藩大恐慌，急令大將曾國荃、李元度率湘軍主力攻石軍後路，大將李續賓（羅澤南部統將）出全力攻陷九江，石達開是孤軍，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國的內訌當然是此後太平軍失敗和會國藩成功的一個決定原因，但太平軍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兩個健將，並未使會國藩得到順利的成功。咸豐九年十月會國藩定四路攻安徽計劃，會國藩、曾國荃任第一路攻安慶。太平軍安慶主將陳玉成臨勇善戰，臨陣搃軍，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戰，玉成擊斃李續賓、會國華，羅澤南舊部全軍殲滅，會國藩畏懼陳玉成，呼為「四眼狗」，出全力對抗，才能支持。十年潤三月，李秀成、陳玉成合攻江南大營，和春、國樞被殺，大營潰散。秀成軍攻取蘇州，直入浙江境。滿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險，發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亂，第一次給會國藩地方政權，叫他署兩江總督，帶兵親往援救，「保全東南大局」。滬南大營圍了自廣西尾隨太平軍到南京，駐兵孝陵衛，號江南大營（統帥一向是滿人（從向荣到和春），軍隊是綠營兵，駐地在南京附近。照咸豐帝的看法，滿洲統帥與漢人會國藩對立，綠營兵與湘勇對立，湘軍在外圍戰勝太平軍，滿洲統帥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滿洲統治者的威信。大營潰散，咸豐帝的計劃失敗了，會國藩取得兩江總督，表示湘軍勢力大進了一步。不過會國藩並未應命赴援。他認為安慶城圍一撤，全局收場，不可收拾，堅決不離開安徽，當時滿清的形勢確是異常危急，江浙迫於李秀成，鄂豫皖困於陳玉成、張洛行，江西又為李世賢、黃文金所攻入，這種局面，迫使會國藩也不得不壓抑一下會系湘軍獨佔戰功的思想，保衛左宗棠督辦軍務，當自己的助手（實際是胡林翼保薦，咸豐帝重用左，分會軍權），保衛沈葆楨（

林開森女婿，不滿其移居歸漢的會黨，一守江西，俟李鴻章對准軍。他對李鴻章特別重視，說「該員勁氣尚餘，才大小綽綽」，挑選長江水師打仗力將弁，交李鴻章使用，從此出現了左系湘軍和李系淮軍。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變動全國的大事，使清清的統治更見危殆，也使會黨們的毫無民族立場的演好本質更見發展。這就是英法聯軍之佔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脅到清室與整個中國的生存。照常理說，這是滿清立國以來的空前巨變，忠於皇室、忠於聖道、忠於藩邸該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實却完全相反。會黨們仍舊堅持他的軍事計劃，自己專攻安徽，江西交給左宗棠，準備從江西入浙江，對英法的侵略者方面要預定投降，應酬悉所不計。他在奏明慈禧請派召外撥糧餉說：「俟該夷就撫」。勝保的所謂外撥自然是指湘軍，但湘軍外撥這詞却不是咸豐對外撥，而是英法的內應了！形式上他是說要英法就咸豐之難，但這個問題只是要咸豐說英法之悔而歸。式的說法罷了！當時咸豐帝調湘軍上諭說：「情形萬分危急……勿得輕言議和，坐視君國之危」。會黨們却想調兵，直「提出一撫」的對法，他知道對英法侵略者投降，坐視失兵力，破壞革命的內戰計劃，不如投降至博較為便宜。清清骨憤責曰，會黨藩邸買賣國，舉的才幹擔任革命的內戰首魁，因之他也勝任賣國能手。

當英法反動派聯合的軍隊火燒關的國，咸豐帝逃往熱河，清政府訂城下之盟北京條約的時候，會黨正在江西、安徽等地作反革命的內戰，並打敗仗。中、英、法和俄的成功，法、俄的反動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軍，美國反動派要求從海道運糧到天津，會黨認贊成「目前資襄力以助剿清運，得舒一時之憂」。法因剛北他的一皇上「旨遂出北京，照不會回來，也要「獎而充之，許其來助」以反對太平天國（勸導洋人助剿及捐米運津捐）。他的頭腦裏，確是除了反對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思想。北京條約後，英法與清清的勾結進了一步。咸豐十一年五月，幫助清清的英人勸德魯督

中國海關)建議進口鴉片每箱加課新稅，用稅款買外國小火輪及槍炮，法國也願出資槍炮並派人傳授製造法，咸豐帝很滿意，徵詢會國藩意見。會國藩完全贊成，認為「我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覆陳購買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豐帝在訂購洋船未到前，馬上先發給軍費從美國租來的改舊輪船使用。在利用外國人力物力以屠殺人民時，會國藩就全然不管什麼中國文明與外國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國侵略者當做親老子，把本國人民當做唯一的仇敵，假安內攘外之名，行安外攘內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會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鉢！

會國藩堅決圍攻安慶，十一年八月終於被他攻破，屠殺城中太平軍二萬餘人(老弱婦女在外)。鮑水圍逃的又被水師截殺，「實無一人得脫」。他自穩大扶「人」(獸)心，向咸豐帝報功，不料這個滿洲主子七月委因貪色過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號絕」，說是不得趁主子活著的時候博他一笑。

三 戰勝太平軍

(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豐帝死去，西太后那拉氏當權，她知道要滅太平軍必須依仗會國藩，而會國藩的漢奸忠實性又確信可以保險，立即大膽給他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大權(十一年十月)。他獲得漢員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權力，在這一時期中，高慶發揮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對外關係上，他善於把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相配合，依仗外國來取得反革命內戰的勝利。

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爲反動

分子的集中點。咸豐十年，上海反動分子組織「愛國會」，出資僱美國的一個在本國犯罪逃亡到上海的傭僕華爵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會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關稅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餉源」，從取得江蘇洋炮洋兵「助剿逆寇」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徑。他看到上海是決定反革命與太平軍內戰勝敗的關鍵，他就奏請「聯絡洋人，協力守禦」上海。同治元年正月署理借洋兵劉斌片裏說，「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後面的「不可」却是一時的裝腔作勢，隨後他就派軍隊與四兵「會剿」內地了。初時，英法美駐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政，江浙紳商向清政府請願借洋兵，清政府動搖不定。同治元年三月會國藩派李鴻章帶淮勇往上海，準備「會剿」。四月，「常勝軍」聯合英法反動派的軍隊攻入嘉定、青浦兩城，太平軍圍城猛擊，外國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說：「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李鴻章也說：「滬中官民向恃洋人為安危，乃援賊未來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會國藩看出止有左李軍加上洋兵，才能對抗江浙境內太平軍，因此，更堅決的主張「會剿」，藉以牽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軍與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財物（搶掠），清軍得土地（當然也搶掠），會國藩主張的所謂「會剿」辦法，就是這樣無恥的鼠竊狗偷行爲。

會國藩本人駐安慶，同治元年五月會國藩率湖軍主力進至雨花台，八月，李秀成猛攻湖軍，血戰四十六日，秀成軍敗退，南京合圍。二年十二月李鴻章、戈登陷蘇州。三年三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催會國藩進進攻下南京，令李鴻章帶兵來助。會國藩拒絕李鴻章，說最好教他帶餉銀來，李鴻章也說託故不敢來。這是會國藩在顯著的「一次內部矛盾」表現，像他那樣老奸巨滑，爲什麼不能掩蔽這個矛盾呢？湖軍起初利用餉銀招誘客歲進出吳常練勇（餉比總兵多三倍），出境作戰以後，官兵主要

被入是搶掠財物，將從金幣珍寶不可勝計，流行痞軍與不乏財」的謠言。會黨黨在咸豐七年論天恩
 奏摺裏也說「湘中勇夫，以投營爲名（官爵）利（搶掠）兩全之場，以戰陣爲日用常行之務，赴江西
 、湖北投効者，絡繹不絕，父隸子代，此往彼歸」，造成湖南省紳士流氓痞棍大發賊匪財的熱鬧場面
 。搶掠，鼓舞了湘軍的「戰鬥勇氣」，也強固了湘軍的戰鬥目標——南京。當時「中外紛傳，洪逆之
 富，金銀如海，百貨交盈」。（賊酋分別處治租善後事宜摺）這就是湘軍拒絕淮軍來助，各營輪流
 苦攻，不惜任何嚴重損傷，圍城二年以上，病死二萬人，戰死八九千人，而作戰竟始終不懈的原因。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攻破南京，「分段燒殺，秦淮河屍骨如麻，三日夜火熄不息，殺十餘
 萬人」。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的勇敢。他說：「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
 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滅摺）從敵人的口中，正顯出了太平天國的將領士兵，乃是中國民族偉大
 的英雄的戰士。他們爲了反對滿清統治者、外國侵略者和漢奸的聯合反革命勢力，爲了爭取中國人民
 的民族自由和社會改革，忠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激昂，可歌可泣。曾國藩並無情地殺戮這樣大量
 的民族精英，不是窮兇極惡罪該萬死的民族是什麼？他大報殺人功，對財物却說「僞善、賊窟，一炬
 成灰，並無所謂賊庫，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與微臣意料之外，亦爲從來罕聞之事」。（賊酋分別
 處治租善後事宜摺）「金銀如海」的南京，爲什麼忽而變爲「全無貨物」的空城呢？原來南京的一
 切財物，特別是江南民間的財物，已都完全被湘軍洗劫一空，會賊正誇說一句「爲從來罕聞之事」來
 掩飾。曾國藩看到李秀成自傳，揭露出湘軍歷來虛報戰功、誣毀爲勝、燒殺搶掠等等的内幕，深以爲
 忌，所以決定違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處置。很顯然的，如果遵照滿清皇帝命令，送李秀成
 到北京「獻俘」，會國藩和湘軍的「名利兩全」，在滿洲皇帝一怒之下，可以變爲名利兩空。他這時

再也顧不得他一生聲名，一個「誠」字的假面具了，至少兩次地亂改了李秀成的自傳，忽促地毀了他以漢口（秀成受凌遲極刑，死訊傳出，南京居民拋市哀悼這位偉大的英雄）。曾國荃搶得寶物金銀最多，湘軍老將如多隆阿、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心懷嫉妬，借不同意擡殺李秀成爲由，紛紛向曾國藩告退，曾系湘軍幾乎到等燬火件的局面。反對派左宗棠、沈葆楨又向清帝攻擊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事載湘軍志會軍行篇）。清政府本想從審問中查出金銀所在，但在曾國藩提議撤湘軍三四萬人，交換條件下，又看到將領爭奪贖物，形勢緊張，也就追認拒絕繳俘，擡殺李秀成爲「合法」，把心腹和緩下去。曾國荃給李鴻章信裏說：「李秀成擒獲後，弟徧刺以錐，流血如注，隨即傳置醫車，囚獄中。」曾國荃對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簡單的爲了洩忿，更不是強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鴻章給友人信說：「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難始何。後賢難竟厥施（後來的地方官難於完成恢復的工作），但需百年方冀復舊也。」湘軍燒殺搶掠的慘酷，一羣匪魁自己供得夠清楚了。曾國藩殺李秀成，大戕湘軍，令曾國荃稱病歸家（託辭回家治病，而曾國藩長着極重的瘡，不會回家醫治過），都是爲了掩護湘軍賊匪的暴行。但國荃在家鄉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畝，不納租稅，聲名仍是惡劣不堪。

曾國藩的湘軍始終是如此兇惡的一幫殺人放火的匪賊，但是他們却始終口口聲聲稱太平軍爲匪賊，爲殺人放火。但是究竟誰是匪賊，誰是殺人放火，不是明明白白的嗎？現在中國也沒有這種殺人放火的匪幫，這就是那些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亞細亞法西斯分子，但是他們不也在師會國藩的教習，反而宣傳中國共產黨爲殺人放火的「共匪」，「赤匪」，「奸匪」嗎？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比太平軍不知進步了多少倍，而亞細亞法西斯分子，又比曾國藩不知兇惡了多少倍，而他們猶欲隻手掩蓋天下人耳目，則他們比曾國藩又不知惡毒了多少倍，不也是明明白白的嗎？

會國藩入南京，急辦三件大事：首先是盡遣真偽，當年舉行鄉試，提拔江南士人（地主紳商的小弟）；其次建築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開散旗兵中來駐防，發給全餉；同時強力裁撤漕功人（不納欠餉或納餉欠餉），一部分交會國藩押解回籍，一部分流落南京，因欠餉及其他非法行動，又被會國藩用懲辦游勇名義殺死無數。會國藩不僅消滅了農民起義的太平軍，而且也消滅了農民從逆的大部，分漕功，食戰勝之果的只是滿清統治者及一批護護封建舊制度的士大夫，大買辦，大地主。

四 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八六四年——一八七二年）

會國藩正在江南鞏固他的勝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滿清的農民軍捻軍勢力又已大張，滿清兩個大帥——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與漕廣總督官文束手無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軍，同治三年十月令會國藩帶兵到皖鄂交界處督「剿」。會國藩深知滿清想在攻捻戰爭中造成滿蒙將帥的威望，對抗湘軍將帥，自己再出「立功」，將更招滿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繼續裁撤湘軍，一面推薦後起的進軍並湘軍一部分，勸僧格林沁、官文調遣，保證各軍服從命令。這正合滿清的願望，令會國藩仍回兩江總督原任。

僧格林沁怕黑湘進軍，說他們都不能作戰，囑使安徽地主武裝首領苗沛霖殺湘軍糧草，又令都察院國瑞與湘軍互鬥，奏劾湘軍爭功。湘進軍方面，會國藩軍止服從會氏兄弟（國藩、國荃），左宗湘軍止服從左宗棠一人，進軍止服從李氏兄弟（鴻章、鶴章、昭遠），會國藩地位高，指揮進軍，仍需通過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疑，更不能就會系湘軍。僧格林沁、官文統率湘進軍，結果引起滿漢兩系

明顯的分裂。價格極低收死，滿清只好又叫會國藩出來統軍，維持北方的危局。

會系湘軍大部分經會國藩強力裁撤，又因長官封扣軍餉，兵勇和下級軍官非常憤恨，兵變到處發生。例如同治四年，鮑超部（川勇，在湘軍中作戰最悍，搶掠也最兇）在湖北、江西、福建兵變，李、蔣、成三軍在湖北，訓、義兩軍在皖北，金、唐、朱各軍在皖南，相繼嘩變。以後，再加被捻軍擊破（攻捻中湘軍止殘留會系張詩日，左系劉松山兩部），湘軍基本上消滅了。湘軍失意官勇，深抱不滿，用率加入秘密反滿團體哥老會，彭發在營官勇也秘密入會，會國藩嚴令「查獲哥匪，立予正法」，與湘軍士兵形成嚴重的對立。從此哥老會代天地會轉興，成爲有力的反滿團體之一。湘軍紀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長毛」的定評。淮軍同樣「與民爲仇」（批准軍提督吳長慶覽），會國藩無法約束，指揮不靈，屢戰屢敗，只好讓位給李鴻章，使淮軍享滅捻的軍功（劉松山部戰功最大，招滿清及李鴻章的感念，抑功不賞）。攻捻戰爭中，湘軍本身分裂，實力保存無幾，湘淮軍又分裂，於是李鴻章政治地位上會國藩。

捻軍敗後，滿清認湘軍爲「賊患」。淮軍後起，戰功較小，兵勇很少參加哥老會，滿清扶植淮軍，使與湘軍對壘，定計消滅湘軍，令左宗棠帶劉松山部與西北回族起義軍戰鬥。開始八年，劉松山部在綏遠，高連陞部在宜君兵變，起因都是查拿哥老會員。將領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實，跟左宗棠到新領的湘軍，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滅湘軍，滿清與會國藩意見一致，起初利用落後的一部分農民，消滅革命的一部分，轉過來又消滅被利用者，所謂冤死狗彘，統治階級是慣用這套計策鞏固自己的權位的。滿清在人民起義反抗中得轉危爲安，會國藩得享受富貴珍榮，自然獲利極大。羣就湘軍一聯說，二品以上文武官將近一千家，他們都是豪紳大地主，佔地不繳租稅，官吏強迫貧民代繳，造成普遍破產的現象。會國藩就有

保衛聖道，維持傳統文化而戰，結果止是少數人富貴，多數人死亡和破產。

會同洋匪內戰中獲得勝利以後，總力煽動外來保守個人的反動成果。他特請清製悉半殖民地政府的外國論來鞏固國內統治，認為「洋人之患，此天所爲，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我輩分內之事」專重在反對革命人民的內戰（批候選訓導計畫案），「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敵和好，共保人財。」（遊官通委全局摺）但如洋人並不與敵和好，共保人財，如英法聯軍之役，那又該怎麼辦呢？他認爲這裏應該「從大處着想：咸豐十年八月洋人入京，不傷毀我紫朝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把外國侵略者看作天神一般，侵略是「有德於我」，要聯絡他「共保人財」，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媚外心理，以會國藩爲代表而理論化了。英法聯軍納藉口之一就是廣西人民的仇教案；同治九年，天津又發生一起教案，因民間誦傳教堂迷拐人口，挖眼製藥，有人與教徒在教堂口角鬥毆，法國領事豐大葉洵來見直隸總督崇厚，向崇厚開放手槍，又向天津知縣劉傑放槍，擊死僕從一人，人民遂激動義憤，毆死豐大葉，焚燒教堂，殺傷教民數千人。這一類的仇教事件，本質上是人民原始的自發的反侵略運動。法國藉口仇教，又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滿清令會國藩往天津查辦。在反對太平軍時口聲聲大罵天主教的會國藩，這時却力主「和平」辦理了，對法使預先保證殺人數目，求其滿意，以至連政府中人（包括李鴻章）也不能忍受，還起桿擊，說「辦案當以供證爲據，豈能預爲懸擬，強人就案」。這個人頭販子會國藩堅持自己的主張，終於重辦「游擊人犯」，斬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也辦充軍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國謝罪。經過大屈辱外交，會國藩的漢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國朝野呼爲賣國賊，人人欲得而誅，連他的湖南同鄉也把他湖南會館的總功名的匾額，摘下來打碎成灰了。他自己也覺得沒臉，說是一外濤清議，內疾神明，爲一生憾事。同治十

一年，這個漢奸劊子手在國人皆可殺的呼聲中死了。

被後來直到現在的一切反動派所譏笑的「會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這樣的。這些本都是公開的在當時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但是統治階級却不敢宣佈它們，便要製造另外一套「歷史」，竟然把會國藩說成「聖賢」了。這個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正是和會國藩一模一樣的人物，他們不也在裝模作樣要羣衆承認他們是「聖賢」嗎？世界一天被虎狼所統治，誰能禁止虎狼們互稱並自稱爲「聖賢」的自由呢？

會國藩是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兩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又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綫的第一個大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他精通極端專制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爲「痛快」。他被「天朝田畝制度」廢倒了，要挽救封建統治者的權利，犧牲數千萬人生命，說是「衛吾道」，所謂「道」，只是少數大地主官僚的「道」，從人民看來，恰恰是逆道不道。

會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羣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和反革命的洋人不減滿清，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爲「有德於我」，不必再計較「關稅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壓人民一類「小處」（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有意識的認清了要維持國內統治，必需依賴外力，必需不惜喪失主權的條件去交換外力。他規定這箇對外公式，也就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規定半殖民地之依附關係。對國內弱小民族，左宗棠殺回民數百萬，席寶田殺苗民一百萬，這羣人把殺人當做專業，他們殺漢民數千萬，當然不會放

對於時局的看法。當時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文學大海賊，給會黨派一類人下了定評，就是「斯賊賊矣，角逐於天下」（汪仲伊握奇閣解序），這是一點不錯。

會黨派是少數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為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軍自身的錯誤，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國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練長江水師，洋槍不到決不出戰，「湖廣、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砲之力」，因此得出「必需洋砲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的結論（請借廣東鎮解洋砲片）。駐軍江西、安徽，逐步進逼南京，軍餉來源多數是上海關卡的稅銀，主要是鴉片捐稅。保衛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參戰。沒有外國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戰勝太平天國。會黨派以後，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會黨派捨這些能手啓示了實例。

鴉片戰爭逼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會黨派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文化方面，堅守舊文化的黑暗面，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却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鎮壓民衆，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保存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中國一天不解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反動統治者一天不放棄這個典型的繼承。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無疑地已經極大、極重地打擊了滿清的統治，動搖了它整個統治的基礎，滿清朝廷的聲威，從此一落千丈了。對根到底，會黨派之流究竟還是沒有救活了滿清朝廷，只讓它多延長了幾天的殘喘，而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精神也並沒有死亡，這種革命精神的種子，經過太平天國英雄的戰士們是更深地種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種在由滿清發軔的哥老會的心中了。孫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國的繼承者自許，並終於完成了太平天國推翻滿清的未竟之業，這正如他的叛徒們以會黨派的繼承者自許，並幻想完成會黨派消滅中國革命的未竟之業一樣，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反動方面說，會國藩創湘軍，主觀上雖是爲了挽救滿清，客觀上却也有些削弱滿清的作用：

滿清侵入中國，軍隊主力是八旗兵，平吳三桂到鴉片戰爭，主力是綠營兵，兩種軍隊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揮權。湘軍、淮軍是近代漢族軍閥軍隊，清政府要通過漢族軍閥才能使用。這樣，滿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軍起時，地方軍政長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極大多數是滿洲人。咸同兩朝，湘軍轉戰全國，督、撫、鎮（總兵）不得不用湘淮軍中人。這樣，滿清對地方的統治也削弱了。

鴉片戰爭時，滿清獨攬外交權。咸同以來，會、左、李與上海紳商、買辦、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吳煦劣跡昭著，被人參劾，會國藩奏稱吳煦聯絡洋人，廣交洋商，厚結洋將，吳煦的進退，關係英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換吳煦。左宗棠經買辦胡雪巖介紹，以一分二釐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萬兩，作爲出兵新疆的經費。李鴻章身兼官僚軍閥買辦三種性質，與反革命的洋人關係尤密，滿清不得軍閥同意，不能單獨進行外交。這樣，滿清對外關係也削弱了。

會國藩爲首的湘軍，挽救了滿清，同時客觀上也削弱了滿清，滿漢統治者之間，勢力起着顯著的變化，從此滿清政權，逐漸向漢族軍閥轉移。但這種變化，當然是出乎會國藩這批反革命黨人意料之外的，其結果倒不是加強反革命，而是成爲有利於新的革命火種爆發的因素之一了。歷史發展規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於此。

